世界史精览

火山口上的分赃

——脆弱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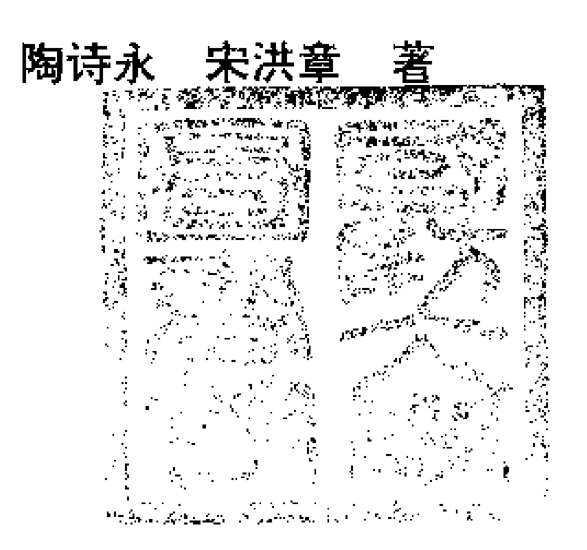
长春出版社

世界史精览

火山口上的分赃

——脆弱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陶诗永　宋洪章　著



长春出版社

(吉)新登字10号

世界史精览
火山口上的分赃
陶诗永　宋洪章　著

责任编辑：张耀民　封面设计：王国擎

长春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长春市建设街43号）　建平书刊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1995年2月第1版
印张:10.875　插页:4　1995年2月第1次印刷
字数:153 000　印数:1－5000册

ISBN　7－80604－220－2/K・16

定价:13.00元　(全32册)388.00元

《世界史精览》编委会

序

人，无不憧憬明天，也频频回顾昨天。从总结昨天得到启发，汲取教益，变得聪明。个人如此，群体亦如此。作为类，人类也是如此。这个昨天，就是历史，是不可追回的客观存在的历史。历史家去研究它，表述它，写出来的，人们也称之为历史。

历史家的历史不是百分之百的绝对“客观”的历史。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试想，你逛过一个商店归来能把万种商品千人顾客百般陈列一一状写得“客观”无疑吗！何况人类历史的复杂性那是商店的琳琅满目无法比拟的。而且，他也完全没有必要去追求这一点，个中道理不言自明。每个历史家都从不同的时代视野、不同的方位视角去审视客观的历史，写出不雷同的历史，得出不同的见解：或灼见、或偏见，或深邃，或表象。

今天不是历史，而是现状，一旦到了明天，今天的现状就成了昨天，成了历史。于是二次世界大战、冷战时代、文化大革命，海湾战争等等便相继进入了历史家的视野，历史不断增添新的、需要从头研究的领域。今

天的历史家写出一部最成功的史著，明天的历史家也会感到不足。因为总会有新资料的发现，新研究手段的出现，更重要的是认识的前进。比如，一个阔别几十年的游子重新回到家乡，村边小溪所引发的思绪，必然与他儿时同小朋友戏水时的感受迥异。那么，一代代历史家之间对历史长河的理解又怎能一致。难道还会有哪位现代历史家以“宗周”“据鲁”的原则去写春秋么！不唯如此，在历史家的历史中还有历史的伪造，尽管历史伪造者在史学史上极少（不能把或由于疏忽，或由于资料不足研究手段落后造成的失误列人此类）。且说那部曾被推崇备至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罢，如不论其历史观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多少共同点，仅就史实而言，这部大作中充满了大量伪造，并开了一代谤史的先河。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一批批列宁时代的老战士被污为“帝国主义走狗”、“奸细”、“间谍”。谎言即使由钢铸就那也是脆弱的，如今那些污陷阴谋已真相大白。历史家当然要重写这段历史。

正是由于存在上述种种因素，从孔丘、司马迁、希罗多德到今天，古老的历史学还在开拓前进。人类只要拥有明天，就不会忘怀昨天，历史之树常青。

历史学的功能，因写史人的眼界不同而不同。司马光把他主编的那部名著题名《资治通鉴》，目的了然：“资治”，为君王提供统治术，达到一家天下长治久安。封建社会的“正史”大抵都奉行这一最高宗旨。随着近代

民主政治的推进，以维护专制统治的统治术为中心内容的封建史学逐渐被抛弃。本世纪20年代末兴起于法国而后波及全世界的新史学学派一反传统，冷漠政治史，热心“长时段”的、普通人参与的历史问题，社会史、人口史、家庭史、心态史备受青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极为重视。他们稔熟古代史，他们对古代农村公社、国家起源、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研究巩固了哲学唯物史观，确证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确证现存制度的历史暂时性。现实的阶级斗争史更受到他们的重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篇幅不大，但却不能不列为马克思的重要著作。它成书于1851年底至1852年初，却预报了下一次法国革命即近20年后的巴黎公社革命的主题：打碎官僚国家机器，代之以社会公仆的政府。这个主题至今光辉不减。

垂范史坛的大家大手笔毕竟是少数。以一般的教化功能为主的史著则是大量的。这其中有的明确限定主题，如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英雄主义，等等；有的则是一般历史知识。我国向有重视历史通俗读物的传统。《三字经》从“自羲农，至黄帝”开始，用了大量篇幅讲述历史。宋元时人陈栎的《历代蒙求》、黄继善的《史学提要》等以历史普及读物常传不衰。世界进入信息时代，国家走向改革开放，普及现代科技常识，加强外语学习，都十分重要，今人的知识结构也不应照搬古人。但是具备一般历史常识还是十分必要的。

近年来中国历史普及读物编写和出版都有可喜成绩，有的工程浩大，有的富有新意。世界史方面的同类读物相比之下略嫌不足。长春出版社的同志非常关心这方面的工作，倡议、组织编写这套丛书。倡议得到一批同仁响应，有学有造诣的师友鼎力合作，有在读学位的青年朋友热情参与。历时近二年，丛书即将付锌，如果它能在普及世界历史知识方面能起一定作用，将是几十同道的极大欣慰。

编写这样一套通俗历史读物，在我们是初尝，没有设计成规，只提出一般原则：科学性与可读性。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具体处理，则由每册作者自夺、文责自负。至于风格，更没有追求划一。倘如常言所道文如其人，那末，30 余人本就各异，何必一律严肃、一律微笑呢。从几千年的世界历史长河中，选出 30 个左右题目，当然只是举起算算大者。但也有些重要题目因有关通俗著述较多，本套丛书就没有再重写，好在读者也不是把它作为教材来谈。

全体同事虽付出很多劳动，但纰漏在所难免，敬希方家和读者指正。

申晨星

一九九四年六月

目　　录

第一章 匆忙拼凑的世界地图

人，作为万物之尊和宇宙的精灵，从洪荒的远古到现代文明的今天，从茹毛饮血到太空探险，悠悠岁月，以自身的智慧和能量对大千世界进行着永不停息的探索和改造。一方面，他们竭尽心力地创造一个祥瑞平和的太平世界，另一方面，他们很多时候又显得极其乖张暴戾，自觉或不自觉地用武力互相杀伐，轻易毁掉来之不易的和平。因而，战争，自从人类成为宇宙的主宰者以来，它总是像一个神秘的幽灵，紧紧尾随着这些宇宙的主人，召之即来，挥之不去。

翻开人类文明史的书页，上下几万年，悠悠数千载，人类由于战争这个恶魔的附身，演出了多少血腥的惨剧！如果说最初的部落争战还主要是由于原始的血亲复仇的荷尔蒙的刺激，带有极大愚莽蒙昧的冲动因素，仅仅限于地球这

个太空巨物上那些极不引人注目的山谷和原野的一隅一角，那么，20 世纪初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人类史上最大的互相杀戮，它不仅在五洲四洋扬起了血雨腥风，更重要的是，它是在人类自身迈进了现代工业文明门槛之后的第一次规模空前的厮杀。

人之初，性本善。人类在每一次拼杀过后，总会在人类最基本的人性导引下而平息干戈，握手言和。从一战结束到二战爆发前的 20 年间，也许正是由于这场空前浩劫太令人类心有余悸、触目惊心了，因而人性中最基本的“性善”因素得到了最高层次的发挥和褒扬。从西伯利亚到大洋洲，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人类不约而同地发出了共同心声：“长久和平”、“永不再战”。从牧师神父到村夫村妇，从政治巨枭到平民百姓，为了重构和平，有多少人奔走呼号、上下求索！尤为难得的是，战时怒目相向的政治家们也坐到了谈判桌旁。20 年间，条约一个接着一个，会议一次接着一次，他们似乎在用空前的耐心和坦诚去殚精竭虑地重构世界新秩序、重建人类新和平。然而，令人遗憾和困惑的是，仅仅过了 20 年，战争的达摩克斯利剑却再一次架

上了人类的颈项。如果说在史前的部落战争之余，人们尚能表现出一定的原始共产主义的兄弟情谊，那么，在现代文明熏陶中的人们，为什么反而越来越变得恣睢暴戾、唯我独尊了呢？人类从那时起到现在，在经历和面对战争与和平的反复轮回的怪圈之余，情不自禁地问：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是文明的进展与人性的兴灭之间有一条二律背反的规律存在吗？人性善耶？恶耶？是耶？非耶？……

1919 年 1 月，战火余烟未散，然而另一场没有硝烟的 32 国大搏斗又在凡尔赛宫开始了

1 月的巴黎，寒风呼啸，冷气袭人，严冬的身影仍在徘徊，看不到一丝春天的气息。然而，一进入市内的主要大街，人们却分明感受到一种热气腾腾、暖意融融的气氛：大街上人流如潮，熙熙攘攘。大小商店门庭若市，生意空前的火。从市政府大楼到高级宾馆，从邮局到普遍商店，除了法国国旗外，还有许多花花绿绿的外国国旗并排挂起，迎风飘扬。莫非巴黎又要举行万

国博览会？可是，细心的人士又发现，与历来博览会不同的是，巴黎的标语横幅却空前多起来，而商品广告牌并未增加多少。“胜利万岁”、“永久和平”、“巴黎热爱和平”、“让正义之光洒遍全世界”……诸如此类的条幅比比皆是，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这又使市民们不禁有些困惑了：这些标语可与订货展览会没有多大关系啊！更让人猜不透的是，豪华宾馆不仅客人空前爆满，而且停车场上豪华轿车格外的多，并不时有一些保镖模样的人转来转去。大街小巷，到处是记者，一个个来去匆匆、神神秘秘；各大报纸号外大增，发行量直线上场。在热烈、嘈杂的气氛中，到处荷枪实弹的警察、呜呜作响的警车又给这灼热的空气平添了几许神秘和紧张。巴黎发生了什么事了？法国政府又有什么重大国际活动？……人们三五成群地议论、猜测，甚至给巴黎电台和国家新闻署频频打电话，要求给予解释和答复。

地处巴黎西南郊的凡尔赛宫，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它完全没有市中心那种喧嚣和闹哄哄的气氛，显得宁静得多了。从外表上看，这座金碧辉煌的宫殿跟平常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之

处。但是有一点则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周围增加了不少全副武装的法国军人，他们或站岗，或巡逻。大门内仍然有进进出出的人员，可是似乎没有一个人像观光的游人，倒像政府中的各级公务员。进入凡尔赛大厅，则又是一幅格外引人注目的画面：昔日宽阔的供游人休息的大厅，此时却显得比较拥挤。顺着大厅的四面墙下，一字排开了许多名贵厚重、闪闪发光的橡木雕花桌椅，许多桌子上摆着红、白色的电话机以及打字机等办公用具。在大厅正中，有一个临时搭起的主席台，前面立着几架麦克风，似乎是有什么显赫人物要作重要发言或演说。总之，整个大厅就像是一个大型会议的新闻发布中心。

顺着走廊朝前走，在里面一间相对小一些，但装饰极为典雅豪华的大厅内，坐着约五、六十个服装各异，但气质非凡、派头十足的人物，他们正在三三两两地低声交谈着，因为语言各异，所以根本听不清楚他们在谈什么。但每个人的脸上却带着微笑，并不时有人笑出声来。整个大厅内的气氛是轻松明快、暖意融融的。

原来，就在两个月前，轰鸣了4年之久的欧洲大陆上的枪炮声终于沉寂下来了，同盟国集

团中最后一位战败国德国，于1918年11月11日，在法国东北部贡比涅森林中的一列火车上向法国元帅福煦将军递上了投降书。至此，延续了4年零5个月的人类历史上空前恐怖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划上了句号。随后，协约国集团中的英、美、法、意、日五大国，认为战争既已结束，应该开始善后了。4年的大战不仅搞得欧洲血肉横飞，也使得世界秩序一片混乱。旧的秩序既然被打乱了，那么重新确立世界新秩序则是理所当然、刻不容缓的事了。还有，这场战争简直就像一场恶梦，不仅使几百万人暴尸荒野，而且使全世界大部分地区都恐惧震颤，似乎面临着世界的末日了。鉴于这些考虑，五大国一致认为，应该立即召开一次有关各国参加的国际多边会议，以尽快商讨善后和重建世界秩序与和平事宜，从而拨乱反正，尽快结束这乱糟糟的局面。因此，由五大国出面组织，给与这次大战有关的大小各国、政治实体等发出邀请函，要它们立即派代表到法国巴黎来召开战后和平会议。这样，总共有32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家元首、军政要人、外交代表等，先后来到了巴黎。但苏俄和所有的战败国不在邀请之列。

在大厅内，英、美、法、意、日五大国因是会议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故它们的代表坐在中间靠前的独立的席位上。从左到右分别是：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美国总统威尔逊、法国总理克里孟梭、意大利首相奥兰多和日本前首相西园寺公望。

在这5个人之中，威尔逊是格外引人注目的，他不仅西装笔挺，穿戴整齐，有十足的绅士风度，坐在人群中给人以玉树临风、鹤立鸡群的感觉，更主要的是，他透露出了一种大智大慧、修为极高的儒雅气质，并且毫无给人做作的感觉。当然，这是极其自然的。因为威尔逊是到1972年为止由自己读得博士学位的唯一美国总统，他曾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8年，为美国学术地位最高的总统。威尔逊以书生从政，遭逢世界大变。他因为是从学者起家，加之在政治学、法律和历史等方面都造诣极高，因而他理性主义色彩太浓，甚至透出一股书生气，与典型的职业政客截然不同。他在政治上讲求道德，在外交上坚持原则。他主攻政治学，有许多不朽的名著，对于总统职位、国会权能、政党制度，以及美国对世界所负的责任，均有真知灼见，被公认为美

国历史上最有学问的总统。与他那卓立不群的高雅气质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他那沉稳庄重、坚毅刚强的自信心和洞察力。这也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他自幼便具有政治雄心，他在普林斯顿念书时，常以弗吉尼亚州的参议员自命，这是因为参议院为美国政治家的养成所，乃走向白宫的必要途径。他不仅说说而已，且真的练习起弗吉尼亚州参议员伍德罗·威尔逊的签名来，同学们都笑他异想天开，他却毫不理会，练习如故，足见其对政治热衷之一斑。不过他最后虽然如愿以偿地做了总统，却没有经过参议员的阶段，这是他始料所不及的。在他这种自信刚毅背后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强大的国力可做后盾。

美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暴发户。它直到1917年4月才参战，在战争中损失最小，但收获却最大。它利用各交战国特别是协约国迫切需要军火、粮食及其他物资的机会而大发横财，牟取暴利。1914～1918年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大幅度增长，对外贸易几乎增加了3倍，资本输出高达132亿美元，借给17个欧洲国家外债约100亿美元，全世界有20个国家欠美国的

债。美国从战前的债务国（1914 年以前外债约 55 亿美元）一跃而为世界头号债权国。美国的国民财富已超过了整个欧洲的总和。而且，战争结束时，全世界 40%以上（近 45 亿美元）的黄金储备也为美国所控制，从而取代英国成了世界的经济和金融中心。这样，原来的欧洲列强此时不得不在经济上甘拜下风，仰仗美国的鼻息。此外，美国的军事力量也是令人生畏的，军队由战前的 30 万人增加到战争结束时的 450 万，舰队和海军力量也大大增强。

美国认为，在战争中军火是我供应的、钱是我出的，要说你们欧洲诸国有什么贡献的话，无非是多出了一点人力而已。美国不仅劳苦功高，而且既然已成了世界头号实力大国，当然顺理成章地应成为世界的领导者了。因此美国这时的企图就是：首先夺取战后欧洲的领导权，然后再称霸世界。这时，美国的霸权计划有 3 个组成部分：加强和巩固在拉丁美洲的地位；夺取战后在欧洲的领导权；谋取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优势。

怎样来达到这些目标呢？威尔逊从他那精巧的公文包中掏出了一份文件，这就是早已闻

名于世、妇孺皆知的“世界和平十四点计划”和“国际联盟倡议书”。其中心内容就是：必须实行公开外交，任何将美国排除在外，由欧洲大国主宰国际事务的作法都将不会再为美国所容忍和接受了；欧洲列强既然已将世界瓜分得一干二净了，美国对此可以既往不咎，但必须实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有钱大家赚，有好处大家都要沾，不准吃独食，要让美国的军舰和商船在世界上的每一个港口都能畅行无阻，自由出入；要成立一个管理世界的新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这个组织要在美国的绝对领导之下，对世界作出让美国满意的安排。

总之，美国认为，与这些穷困潦倒的欧洲诸国相比，美国不仅一枝独秀、蒸蒸日上，而且与昏聩老朽的欧洲相比，美利坚民族无疑已成为最优秀的民族，美国已是世界的太阳和希望的明星，欧洲力量有限却穷装大亨的日子应该结束了。要让全世界都以美国为圆心，以美国的意志为半径画圈，要让美国的思想主宰整个地球，让美利坚民族的声音充满宇宙。

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则没有威尔逊那样自信和从容了，尽管左边脸上仍露出不可一世、踌

踌满志的高傲神态，但右边面孔却早已暴露出了底气不足，心中无数的虚弱和忧虑状。这样，劳合—乔治给人的印象就像是一个长着阴阳脸的马戏团中的小丑。当然，这并非英国首相得了神经麻痹症，而是他确有难言之隐。

英国虽然仍披着世界霸主、日不落帝国那件富丽堂皇的外衣，但在这件外衣下的躯体却不是一个身壮力强、血气方刚的青年，而是一个风烛残年，且还受了内伤的老人了。在大战中，英国不仅有约75万人丧命，而且国库中的钱水一般地流走了，军费开支约100亿英镑，占国民财富约1/3，70%的商船被击沉而落入了大洋的万顷波涛之下。从此，自从16世纪击败荷兰而获得的"海上马车夫"头衔变得虚有其表了，盘踞了250年之久的海运垄断地位也随风而去、拱手送人了。战前，美国欠它30亿美元；战后，它倒欠美国47亿美元，不仅成了美国的债务国，而且还丧失了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昔日门庭若市的英国伦敦金融中心和国际银行，如今冷冷清清、门可罗雀，金库中的金条银锭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流到了大洋对岸纽约曼哈顿区那无数的摩天大厦之中。一想到这种凄凉景象，

劳合—乔治怎么能不忧心忡忡、眉头紧锁呢?不过,要争取世界霸权、尤其是要与头号大国美国放手一搏,英国虽无绝对把握,但仍有力量放胆一试。因为,英国还是世界最大的殖民帝国,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从加拿大到印度,大英帝国不仅牢牢地掌握着散布于东西半球的殖民王国,而且黄金、钻石、粮食等财富,仍每天滚滚流向英国女王的金库。对美国而言,它是穷光蛋;对欧洲盟国来说,英国则仍是大亨,是债权人。尤其重要的是,它打败了主要的对手德国,不仅消除了国际市场上一个有实力的竞争对手,而且趁机将德国的许多海外殖民地(德属非洲领地全部落入英国手中,约260万平方公里,1300万人口)和土耳其帝国的美索不达米亚、阿拉伯和巴勒斯坦地区纳入了大英帝国的版图,换上了醒目的英国米字旗。英国虽有大量船舰在战时葬身鱼腹,但英国海军在战后相比之下,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劲旅和令人不可小视的打击力量。因此,英国称霸世界的欲望仍是强烈的。正如当时外交大臣寇松在上议院的演说所宣称的那样:“目前,不列颠的旗帜,已飘扬在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帝国领土之上!我们的意见,对于各

国人民的意志，或是对于决定人类的命运，有着极大的影响，这都是前所未有的。”

一战后，虽然大英帝国的太阳已从初升的旭日变成了西坠的残阳，虽然不列颠王国已无法再保持身手矫健的青年英姿而被迫退到老态龙钟的老人的步履蹒跚，但一想到大英帝国的百年风流和荣耀，劳合—乔治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这残酷的现实而将世界帝国那璀璨的王冠拱手送与他人。念及至此，向来以深谙国际事务、果敢英明而著称的劳合—乔治又将腰板挺得笔直了，又作出一副大无畏的殉道者和以死相拼的武士的神态了。他认为，即使英帝国的太阳已渐渐西坠，但他也要让这轮曾照耀全球几百年的亮盘在落入地平线的最后一瞬间放出耀眼的光芒；虽然大英帝国已从风光一世的绅士变得穷困潦倒、弱不禁风了，但他一定要使它永远保持绅士那雍容大度的优雅气慨，要使尽浑身解数给它补血打气，尽量做到潦而不倒，而不能因为这位昔日的巨人今天已经衰老便可任人欺负、任人指手划脚。一想到美国从此将会对这位昔日的老人颐指气使，一想到美国要将插着星条旗的船只驶入大英帝国的领地，要让美国

的商品充斥于从伦敦到印度的大小商场，要听任法国在欧洲称王称霸、将英国挤出大陆并与美国串通一气，虎视眈眈地盯着英帝国的海外殖民地，劳合—乔治就感到恶心，就觉得怒火上窜。单凭这一点，他就不会容忍，咽不下这口气，更何况英国并非已不堪一击，而是宝刀未老，雄风犹存呢？如果在还能拼死一战、能挽狂澜于不倒的情况下，因他劳合—乔治的窝囊软弱而使几十万英国战士流血换来的利益沦于敌手，他将怎样去向愤怒的英国人民解释呢？又有何面目去向昔日开疆拓土、纵横天下的列祖列宗交待呢？作了这一长串的回忆与思考后，劳合—乔治不仅清醒了许多，而且下定了最后的决心：有什么好怕的呢？从世界范围看，只有美国才可能对英国构成威胁；从欧洲着眼，也只有一个法国可与英国一比高下。这样，天下大势已成鼎足三分。因此，在欧洲，英国继续玩弄“均势”政策，一方面主张摧毁德国的舰队，限制德国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它又反对肢解德国，以便用德国来牵制法国。英国处处阻挠法国称霸欧洲的意图，但为了对付已向世界张开血盆大口的美国，它又与法国合作，共同抵制美国的“航海自

由”、“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等不怀好意、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别有用心的叫喊。

克里孟梭与他们前两人完全不一样。这位法国总理正襟危坐，但满脸露出一股慑人的霸气，并且显得成竹在胸、志在必得地自信，偶尔还挤出几丝神秘的、带着嘲弄的微笑。这是因为，一方面，法国在大战期间一直是欧洲的主要战场，经济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元气大伤。战争期间全国所受的物质损失高达2000亿法郎。1919年的工业产量只及战前的57%，农业生产也只达到战前的66%。由于工农业生产的下降及大量的军事借款，这个几十年来以放高利贷闻名于世，靠收取利息过活的大债主，如今却破天荒地第一次负债累累，欠美国38亿美元，欠英国6.5亿英镑。但是另一方面，法国的世仇和劲敌德国的失败，使法国在欧洲拥有最为强大的陆军，并占领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带。此外，法国在世界上仍占领着广大的殖民地，是除英国而外的第二大殖民帝国。克里孟梭认为，在战争中，美国无非是拿了几个钱，况且这钱还拿得并不让人痛快，不但要还本付息，而且倍受美国的奚落和白眼；英国远处英伦三岛，

虽也派了一点兵到欧洲大陆作战，但那不过是仪仗队性质的装饰品，毫不管用，起主要作用的还是法国。设想没有200万锐不可挡的法国陆军，要战胜同盟国，简直是做梦。并且，4年的大战使法国倍受战火的蹂躏，如今面对残破的屋舍、荒芜的田野以及饥馑的人群，法国真是感到怒火中烧，因为这并不全是同盟国的过错，在战火中趁火打劫、到处骚扰的协约国军队也脱不了干系。如今它们倒好，不但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而且居然还想打法国的主意，简直是打错了算盘，岂有此理！想到这里，克里孟梭决定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克里孟梭宣称，美国虽然出了钱，但别人并未白拿，而是连本带息地偿还，因此谁也不欠谁的。况且美国并无多少军功，有什么资格要当世界领袖呢？还有，美国一向在拉丁美洲大搞“门罗主义”，将拉美变成了它的后院，谁也不准插手，可如今它却想将它的黑手从北美伸过大西洋而插手欧洲事务，这不但是典型的蛮横霸道，而且太狂妄了，不知自忌；至于那个已年迈体衰的大英帝国，几百年来一直在欧洲大陆事务中上下其手，处处与法国作对，法国早就不想受这个窝囊气了，正憋着一肚子火

没处发泄。如今法国新胜，挟战胜之余威，不对英国的殖民地作非分之想，已是很给英国面子了。可这个老家伙却毫不知趣，竟然还想赖在欧洲大陆不撤身，仍处处跟法国过不去。克里孟梭暗骂，对不起，我早就受够了，你不仁，我也不义，如有什么过火行为，那是你自作自受，怨不得我。如果说对战后法国重新确立和巩固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地位有威胁的国家的话，英、美只是肢体之患，且鞭长莫及，最多搞一些外围骚扰，打一些擦边球，不足为虑。真正让法国担心的还是它的老冤家德国。就是这个该死的德国，不但羽毛刚丰满就向法国进攻，迫使法国订立了割地赔款的城下之盟，并抢占了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公然霸占至今，使法国含羞受辱达47年之久，而且，这个野心勃勃的家伙还不知足，公然挑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将战火再次烧到法兰西国土之上，并搞得法国焦头烂额，人去财空，从此元气大伤。想到这里，克里孟梭双眼血红，额上青筋暴露，一双手握成拳，扭得指节嘎嘎作响。哼，总算上天有眼，如今清算的日子终于来了！法国不仅要对德国进行总决算，连本带息地讨回公道，并且还要彻底打击德国的嚣

张气焰，要使它做梦都要记住法国将加在它身上的那深及骨髓的刺痛！总之，要使德国从此趴着做人，要将它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使它永世不得翻身！为此，法国主张彻底摧毁和肢解德国，将它从地图上抹去：要将法国国界向东推进到莱茵河，在莱茵河流域的德国各州建立一个受法国“保护”的莱茵共和国，在德国南部建立一个新的巴伐利亚共和国，并把德国东部的一部分领土分给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要在东欧建立一个为法国支配的国家集团，以便从外交上包围和孤立德国，以便在它背后竖立一把利剑，一旦德国图谋不轨，将从背后给它致命的一击，将它拦腰斩断。当然，阿尔萨斯和洛林应无条件地归还法国，德国的萨尔煤矿区也要交给法国，以作补偿和利息。至于法国的这么多帐单，当然也应由德国来作数倍的赔偿和支付，因为要不是德国做恶，法国怎么可能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最后，法国还希望通过对军队和武器的严格限制而从军事上削弱德国并保持战争期间从德国及其盟国夺得的殖民地和领土。

第四位是日本前首相西园寺公望。他有着

典型的东方人的特点，微微仰坐在那里，脸上浮现出一抹似笑非笑的表情，双手自然放在膝上，给人一种庄重稳健的感觉。整个神态显得莫测高深，似乎深得中国儒学和印度佛禅的精髓，不急不躁、四平八稳。正像它们的首相一样，日本在一战中也帮现得非常圆滑老练。它先是虚张声势，于 1914 年 8 月即对德绝交并宣战。可令人奇怪的是，它不是派兵到欧洲去帮助协约国集团，而是就近杀向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势力范围。它在以解放者的面孔强占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后，又立即挥师南下太平洋，将德属太平洋岛屿也夺了过去。之后，它便稳坐泰山，摆出一副隔岸观火的架势。即使在欧洲战场打得难解难分，协约国苦斗方酣之时，它也只是派出了零星舰队游弋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一带，逡巡观望，根本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助战行动，仍然是作壁上观、坐等胜利。

正因为日本消极避战，因而它在战争中根本未受任何损失，反而发了大财，成了仅次于美国的第二个暴发户，甚至一些欧洲国家也成了它的债户。同时，它乘西方列强忙于欧洲厮杀而无暇东顾之机，抢占了中国的青岛和胶州湾，夺

取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也换上了日本的太阳旗。1915年1月18日，它又迫使中国袁世凯政府接受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露出了要独吞中国的野心。

西园寺公望也深知日本的这些不良表现，特别是作战不力、见死不救的恶行，早已惹得西方诸国忿忿不平。因而他在会议上是故作高深，一言不发，尽量不抛头露面，特别是对欧洲事务和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日本表现出一种毫无兴趣的清高面孔。然而在这张冷面孔后，日本早就将它那血红的眼睛死死盯住了亚太地区，它不仅要保住大战期间夺得的一切赃物，而且还想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称王称霸。总之，日本是一个冷面杀手，它的全部心思就是：在别的地方，日本可以不管，你们西方大国愿怎么干不关日本的事，但亚太地区嘛、你们也要知趣一些，不要惹得日本不高兴。

在会上最出格、最滑稽的人物，也许就是意大利首相奥兰多了。他不仅衣冠散乱，毫无风范，而且左顾右盼、坐立不安。一会儿抓耳搔头，

一会儿又伸手动腿。在感到受了冷遇和谁对他都不感兴趣后，奥兰多干脆抹下面子，一会儿拉拉这个手，一会儿又拍拍那个肩，完全是一个哈叭狗和可怜虫的模样。

当然，身为意大利首相的奥兰多也并非自甘下贱、低人一等，他之所以举措失常，也是有苦难言。在一战中，意大利完全是一个市井无赖模样，它先是骑墙观望、首鼠两端，虽与德奥结盟，却不帮它们作战，反而向协约国暗送秋波。在得到了后者的高价许诺后，它立即倒向了协约国的怀抱。可是，它又不立即出兵助战，而仍磨磨蹭蹭、拖拖拉拉。在协约国的严厉训斥督促下，它虽硬着头皮派出军队参加了战斗，却又连吃败仗、丧师失地，搞得威信扫地。这更为列强所不齿。加之它原来实力就弱，在战争中又损失惨重，因而虽为战胜国，但按其经济和军事实力，不过是一个二流帝国主义国家，远不能与英、法、美等国相提并论，并驾齐驱。

可是，意大利虽然无德无才，但脸皮不薄，死乞白赖的勇气、软磨硬泡的技术谁也赶不上。它喋喋不休地要求协约国履行在战时许下的诺言，满足它在欧洲和非洲的领土要求，从而可以

从南斯拉夫和土耳其夺得大块土地，将亚得里亚海变成意大利的内湖，在东地中海建立霸权。奥兰多振振有词地说：虽然意大利战功不大，但那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协约国应给予理解。可是，想当初在两大集团打得死去活来、不相上下之时，正是意大利及时弃暗投明，站在了协约国一边，从而在天平上投下了决定协约国最后命运的生死悠关的一个砝码。单凭这一点，意大利就立下了不世之功。如今协约国非但不感恩戴德，反而想过河拆桥，这岂不是太薄情寡义、欺人太甚了？况且，意大利的要求也不高，它只希望得到平等对待，至少要与日本一样。

无论奥兰多怎样苦口婆心，英、法、美三国就是冷笑。它们都认为，意大利不仅国小力弱，而且毫无建树，完全没资格向它们讨价还价、邀功请赏。如果这一点还勉强让人能容忍的话，那么后一条则是始终让人恶心的：在整个战争期间，意大利都是举棋不定、观望不前、脚踏几只船，随时准备反戈，倒向另一方。对这种典型的倚门卖笑的妓女和投机取巧的小人，绝不能有什么信义可言。因而，一会儿劳合—乔治握一下奥兰多的手，阴阳怪气地说：“老兄，沉住气，稳

着点！……”一会儿克里孟梭又拍一下奥兰多的肩，神秘兮兮地说：“先生，要好处吗，表现好一点吧！……”就这样，他们完全将奥兰多当成了猴耍。结果，虽然奥兰多已颜面丢尽，招术使绝，但始终无济无事，根本说不动这些铁菩萨。奥兰多万般无奈之下，只好背地里哭丧着脸，不停地在胸前划十字，祈求上帝能让英、法这些太岁发发善心，不至于太跟意大利过不去，太让他奥兰多下不了台。

尽管与会大国的这些政治巨头们各怀鬼胎，同床异梦，但有一点他们却能臭味相投、一拍即合，那就是他们都将已发生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苏俄视为洪水猛兽，视为动乱的发源地和他们争霸世界的绊脚石，因而它们咬牙切齿、摩拳擦掌地发誓要给苏俄一点厉害瞧瞧。当然，对于他们这些伪君子而言，装腔作势是万万必须的，因而它们表现出来的是背后藏着屠刀却满脸堆着慈善的微笑。他们将正义至上、公理永存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开口必言道义，闭口也提真理，将息战、和平的招牌高高挂起，并竭力装出一副悲天悯人、普渡众生的救世主面孔。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在巴黎多塞街法国外交部大厅开场。出席会议的有27个战胜国的代表。其中有和会的组织者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有曾经站在协约国方面作战的中国、比利时、巴西、希腊、危地马拉、海地、汉志（今沙特阿拉伯）、洪都拉斯、古巴、利比里亚、巴拿马、尼加拉瓜、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暹罗（今泰国）、捷克斯洛伐克；还有同德国及其盟国断绝外交关系的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和乌拉圭。还有5个新成立的国家和“社会团体”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苏维埃俄国未被邀请，战败国及其盟国不许列席会议。

出席巴黎和会的国家虽有32个，但各国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共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级是“享有整体利益的”美、英、法、意、日五国，它们的代表可以参加一切会议。第二等级是“享有局部利益的”交战国，即上述站在协约国方面作战的大多数国家，它们只能参加讨论与它们有关问题的会议。第三等级是与德国及其盟国断交的国家，它们也只有在讨论的问题涉及自己时才能出席。第四等级是中立国和正在成立的

国家，它们必须在五大国之一的邀请下才能出席专门讨论与它们直接有关的问题的会议。由于日本所关心的是它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对欧洲问题和国际联盟不感兴趣，而意大利势单力薄，在战时又多次失败，因而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小兄弟”，所以真正操纵整个会议的只是英、法、美三国。

各国代表名额规定如下：美、英、法、意、日各派5名全权代表出席和会；比利时、巴西和塞尔维亚各派3名；中国、希腊、汉志、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泰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各派2名；英国自治领（澳大利亚、加拿大、南非）和印度各派2名，新西兰1名。所有其他国家有权各派1名代表。大会还预先声明：“俄国选派代表的条件有待讨论有关俄国问题的会议时决定。”参加会议的代表共有1000多人，还有一大批随团工作人员，其中有历史学家、法学家、统计学家、经济学家、地质学家和地理学家等学术专家，还有译员、秘书、速记员、打字员，甚至还有士兵。威尔逊和劳合—乔治都从国内带来了卫队。仅美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就达1300人，花掉的经费达150万美元。正式向大会登记

的记者就有150多人，在各代表团的旅馆附近进行采访的记者尚未统计在内。

巴黎和会上有三种类型的会议：(1)拥有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权力的“最高会议”，它最初是“十人会议”，由美国总统威尔逊和国务卿蓝辛、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外交大臣贝尔福、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和外长比松、意大利首相奥兰多和外交大臣桑理诺、日本前首相西园寺公望和前外相牧野伸显组成。由于这样人数还是太多，不便进行秘密交易，所以到1919年3月15日后，又改为仅仅由政府首脑出席，日本首席代表西园因不是现任政府首脑，被排斥在外，自此，“四人会议”成了和会的核心机构。由于意大利在战争初期脚踏两只船，参战后的作用又不大，加之在经济上又依赖于英、法、美，所以意大利总理奥兰多在会议上只是一个跑龙套的配角。实际上，真正操纵和会的是威尔逊、劳合—乔治和克里孟梭组成的“三巨头会议”。尽管奥兰多因其主张很少被采纳而在会上牢骚满腹，甚至愤然离场，但其他与会者不予理睬，他又只好悄悄回到会场。(2)审议各种专门问题的“特别委员会”，它的任务是预备草案、提供最高会议参

考，如战争责任委员会、赔款委员会、国际联盟委员会等。(3)是由与会各国的所有代表参加的“全体会议”，它的任务是履行表决程序，通过最高会议的议案，实际上仅是走走过场，并无任何实质性的作用。如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小国要求维护它们权利的企图刚一冒头，克里孟梭就赤裸裸地声称，以1200万军队为后盾的大国必须左右大会。从1919年1月18日和会开始到6月28日凡尔赛和约签字这段时间，全体会议只开过7次，而“四巨头会议”却达145次。正如克里孟梭所说：“至今我还相信，在我们之间存在着一个协议，即只有五大强国先行决定了一切重要问题，然后走进会场。”美国代表团一位专家也说：“十人隐没而不彰，五人从未露头角，在决议形成的关键时刻，四巨头控制和会。”

巴黎和会是在凡尔赛的镜厅中开场的。东道国法国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作为大会的开幕地点，是别有用心的。因为大会开幕这一天，正是48年前普鲁士战胜法国后在此地宣布德意志帝国成立的日子。法国总统彭加勒致开幕词，他以胜利者的口吻，讥讽战败了的德国：“生于不义，自当死于耻辱”。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法

国总理克里孟梭当选为会议主席，蓝辛、劳合—乔治、奥兰多和西园寺公望当选为副主席。

争吵！争吵！除了争吵，还是争吵！似乎他们是为了吵架才来到巴黎的

巴黎和会表面上的任务是战胜国对战败国制订和约，建立战后世界和平。实际上，帝国主义召开和会的目的，是要按照战后新的实力对比瓜分战争赃物，策划绞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扑灭正在蓬勃高涨的世界革命运动，以便尽快建立战后帝国主义奴役世界的“新秩序”。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因而他们在会上勾心斗角、狼狈为奸，演出了一系列既争夺又勾结的丑剧。

和会开幕的第一天，美、英、法等国就出现了分歧。美国主张首先讨论建立国际联盟的问题，威尔逊声称国际联盟同和约应是一个统一体，它对所有国家都有约束力。它的目的是想先建立国联，并争得盟主的地位，然后通过国联来操纵对战败国的殖民地及其领土的分割，以便从中牵制英、法，为自己捞上更多的好处。英、

法等国当然不肯就范，极力反对首先讨论这个问题，而主张先讨论瓜分殖民地与领土问题，因为在战争期间，德、奥和土耳其的许多殖民地和领土，事实上都已被英、法、日等国占领了。这些国家都想让会议及早讨论和确认它们夺得的领土"合法化"。

建立一个国际组织机构的动力来自各国防止再次发生世界大战的愿望。当1918年11月贡比涅停战协定签字的时候，欧洲已从战争的恶梦中清醒过来，希望战后能建立一个防止战争的国际性组织。而协约国则企图通过成立一个国际组织来实现自己的作战目的，建立有利于本国争霸的战后国际关系体系。国际联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的。

"国际联盟"一词最早出现于大战初期，1915年开始流行。它是从法国前总理布尔茹阿在战前发表的《国际联合会》一书的书名发展而来的。战争初期，欧美一些国家已自发建立了类似的团体，如英国的"国际联盟协会"，美国的"实现和平联盟"等。这些团体从重建战后的和平角度出发，提出了建立国际联盟的主张，而对未来国联的性质、作用等方面认识却是模糊和

不具体的。

美国参战后，建立国联已成为协约国，特别是美国的主要外交目的之一。英国多次希望拥有强大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的美国出面倡建国联。以总统威尔逊为首的美国政府也开始筹划建立一个由美国领导的国联，以便为美国称霸世界开辟道路。

1918 年 1 月 8 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向国会发表的演说中提出了著名的“十四点计划”，首次以官方形式明确提出：“为了大小国家都能相互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必须成立一个具有特定盟约的普遍性的国际联盟。”“十四点计划”中的许多方面都和国联计划有着密切关系，如“海上自由”，只有通过国联的行动才能加以封锁；“公开外交”、“取消贸易壁垒”和“裁减军备”等项也都是国联成员国必须承担的义务，并且要由国联机构进行监督和执行。

“十四点计划”发表之后，威尔逊俨然成了国联的首倡人，赢得了“和平缔造者”的桂冠。各国的资产阶级报刊，乃至第二国际的报纸都争相吹捧“十四点计划”的“民主”性质。但威尔逊自己却承认，他的纲领是针对苏俄和平外

交政策提出的，同时也为了使英、法“附和”美国，建立由美国控制的国联来“管理世界”的“新秩序”。

在和会开始后，尽管英、法对首先讨论国联问题表示反对，但在威尔逊的坚持下，大会最后决定将国联问题提交特别委员会研究。英国和法国的外交家们指望，国联问题提交特别委员会后，可长期将它从议事日程上抛开。此外，他们还极力把委员会搞得庞大臃肿，借以拖延会议时间。英、法提议，应让小国代表参加特别委员会。克里孟梭声称，如果向小国敞开委员会的大门，大国将表明它们有同弱小民族合作的诚意。他们坚持主张让那些一向受藐视而未能参与和会实质性工作的小国代表参加。

威尔逊看到，有人想千方百计地阻挠委员会的工作，便采取了一个外交步骤：他宣布亲自担任委员会主席。后来，因威尔逊驻地而被命名为“克利容饭店委员会”。

1 月 25 日，大会把威尔逊的建议提交给该委员会讨论。接着，参加会议的代表暂时撇开了国联问题，决定转入其他问题的讨论。劳合—乔治肯定的说，“东方问题和殖民地问题不那么复

杂"，他提议讨论从德国手中夺来的殖民地以及土耳其领地的归属问题。情况这么一转，国联问题便退居次要地位。威尔逊对此很不满意。

对威尔逊来说，在各报刊将他吹捧成一个和平战士的时候在国联问题上做出让步，势必会舆论大哗而声誉扫地。因此，他再次要求大会讨论国联问题，并假惺惺地说："如不照此办理，全世界将会说，各大国首先瓜分了世界上无力自卫的地区，然后才建立各国联盟。"英、法代表极力反对，威尔逊同他们进行了激烈的争吵，并威胁要退出会议。威尔逊的副手豪斯上校曾在日记中这样描述道："看来，一切都完了……总统很凶，劳合—乔治很凶，克里孟梭也很凶。总统同他们谈判时，第一次失去了自制……"

威尔逊要退出会议的消息，使所有的人都感到不安。看来，大会已陷入僵局，但劳合—乔治却从容自若，他力图证明：国联已被认为是和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盟约的个别条款的制定不会改变这一事实，所以，不必等到盟约最后完成，可立即着手分配委任统治权。但威尔逊再次表示反对，因为既然殖民地先行瓜分完毕，国联就将成为徒具形式的工具。应当首先确定国联

盟约。劳合—乔治反驳道："谁也无法知道，制订国联盟约这个复杂程序什么时候完成。"威尔逊回答说，委员会可在10天内解决制订盟约的程序问题。英国人只好让步。

1月底，十人会议转入了对处置德国殖民地及土耳其领地问题的讨论，威尔逊提出了建立国际联盟委任统治制度的主张。他坚持，上述土地应由国联委托一些"先进民族"代管，即建立委任统治制度。国联通过这个制度，将战败国的殖民地和领土委托给一国或数国代管。在这些委任统治地，实行"门户开放"的原则，国联会员国在关税和获得原料来源方面应该"机会均等"。但是英、法等国在战争期间早已通过秘密协定瓜分并占领了德、奥、土等国的殖民地，他们担心美国以委任统治的名义乘机插手，所以坚决反对美国的提议。双方争执不下，英国转而要求立即分配委任统治权，以此作为接受委任制度的前提。于是双方达成妥协。美国妄图通过建立委任统治制度扩张领土的计划虽然没有实现，但英、法也对美国作了一定的让步，同意在委任统治地内实行"门户开放"原则。

在如何看待国际联盟的性质和任务的问题

上，美、英、法之间也存在尖锐的分歧。法国希望国联成为一个矛头针对德国的同盟，为此，它主张建立一支受国联控制的国际部队，至少建立一个隶属于国联的国际参谋部，借以加强法国对德国的军事优势。这一设想因遭到英、美的反对而失败。英国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以维护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现状为己任的大国集团，从而使大英帝国的殖民利益得到保障。因而，英国仅仅希望把国联作为一个国际咨询机构，一个旧式的“欧洲邦联”的延伸。它认为国联的作用，只限于对国际上所发生的问题实行大国“仲裁”，英国妄图在“仲裁”中居主导地位以操纵国际事务，借此保持其在欧洲和世界的霸权利益。美国则又是一番心思。它企图通过国联在欧洲和世界扩张自己的势力。威尔逊说：“国际联盟本身就是一个同盟，它不需要任何其他的同盟”。这里所谓其他的同盟主要是指英日同盟和英法协约，威尔逊想拆散旧有的同盟，用国联取而代之，从而为美国建立世界霸权扫清道路。

经过长时间的争论，最后，在英国和美国提出的两个方案的基础上，特别委员会在2月中旬拟就了国联盟约的草案。1919年2月14日，

威尔逊在庄严的气氛中向和会报告了国联盟约草案。他在结束自己的发言时哗众取宠地说："不信任和阴谋的迷雾消散了。人们将面对面地说：我们是兄弟，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过去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现在我们明白了，请看，这就是我们兄弟情谊和友谊的条约。"各国代表相继发言。大家都庆祝人类创造了一个"和平工具"。而那个法国代表莱昂·布尔茹阿（他的方案遭到否决）却说，国联盟约应作某些修改和补充。汉志代表也说，盟约中有若干辞句"不大清楚"。他问道，"委任统治"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和会全体会议批准了威尔逊提出的方案。第二天，他在一阵礼炮声中离开欧洲回美国将盟约提交给国会。1919年4月28日，和会全体会议通过了国联盟约。1920年1月国际联盟正式成立。

在国联盟约确定之后，和会便着手集中讨论对德和约。如同国联问题一样，在巴黎和会上德国问题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这个争执在战胜国与德国之间虽然不可避免地发生，但更主要的还是表现在协约国帝国主义列强之间。

对德和约和条款是在没有德国代表参加的

情况下拟定的。列强的外交战基本上围绕着德国的疆界和赔款问题而展开。

关于德国的西部疆界，法国除了要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还要取得德国产煤丰富的萨尔区。克里孟梭以保障安全为理由，要求把法国边界向东推移到莱茵河，而且在莱茵河以东建立一个自治的莱茵共和国，它不得建立武装部队，也不准与德国重新合并。克里孟梭自我解嘲地说："我是如此喜欢德国，所以我希望有两个德国。"威尔逊代表美国断然拒绝这项要求。于是法国人又提议建立一个为期有限的莱茵共和国，期限以后，可允许该地居民自行决定其归属。即使这样一个建议，美国也没有接受。关于德国的东部疆界，法国喋喋不休地谈论"赤色危险"在威胁着波兰，要求建立一个包括波兹南和但泽在内的"大波兰"。当然，法国绝不是想要保护波兰利益，而只不过企图制造德国同苏俄的对立。在激烈辩论中，克里孟梭直接了当地宣称："提出建立波兰国家的问题，是要……在德国和俄国之间建立一个屏障。"

但是，如果法国这些要求得到满足，它在欧洲大陆的经济和战略地位就会得到大大加强。

因为萨尔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产煤区之一，如果同盛产铁矿的洛林结合起来，可以构成强大的煤铁工业基地，从而为法国称霸欧洲大陆打下雄厚的物质基础。

法国的计划一提出，就遭到英、美的坚决反对，因为他们想继续保持大陆的“均势”，不愿过分削弱德国和让法国过于强大。劳合—乔治说：“不要再建立一个新的阿尔萨斯—洛林了。”至于以莱茵河划界问题，劳合—乔治和威尔逊也不同意，他们向克里孟梭建议，由英、美来保障法国东部边界的安全，一旦遭到德国侵犯，保证立即进行援助。3月17日，法国总理照会威尔逊和劳合—乔治，同意接受美、英两国保障边界的援助。至于莱茵河流域诸省问题，克里孟梭建议，应根据政治和经济的考虑，将莱茵河左岸同德国分离，由协约国军队占领，为期30年。同时他还附了一个条件，即莱茵河右岸50公里以内的地带不许德国设防。并且，作为法国在莱茵河问题上让步的补偿，他要求将萨尔交给法国。他指出，不然的话，德国控制了煤矿，实际上也将控制法国全部冶金工业。

对于法国的节外生枝、提出新要求，威尔逊

大为光火，他气恼地回答说，他至今还未听到有个什么萨尔问题。对此，克里孟梭暴跳如雷，攻击威尔逊是亲德分子，他强硬地宣称，任何一个法国总理都不会签署一项不把萨尔划归法国的条约，如得不到萨尔，法国将不在任何协定上签字。

威尔逊冷冰冰地说："这就是说，如果法国得不到它想要的东西，就会拒绝同我们合作。这样看来，您是希望我回家喽?"

克里孟梭反唇相讥地回答说："我并不希望您回家，我本人倒是想回去。"说完，他便把手一甩，气冲冲地离开了威尔逊的办公室。

1919年3月25日，劳合—乔治从平时周末度假的别墅给克里孟梭和威尔逊发了一份备忘录，题目是：《草拟和约条款最后文本前对和会的几点意见》。这就是著名的《枫丹白露文件》。它叙述了英国的纲领，同时批评了法国的要求。劳合—乔治写道："你们可以夺走德国的殖民地，将它的军队裁减到只够建立一支警察部队的数量，将它的海军降到五等国家的水平。这一切终究毫无意义，如果德国认为1919年的和约不公平，那么它将会找到对战胜国进行报复的

手段。……出于这些考虑，我坚决反对为了其他民族的利益超过必要限度地把德国居民从德国分离出去。”他同意将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但是不同意“将沿莱茵河之省份与德国之其余部分分离开来”。他强调指出：“我强烈反对把更多的德国人从德国统治下交由某个其他国家统治”。萨尔区不能交给法国，但法国可以开采萨尔煤矿10年。关于德国的东部疆界，劳合—乔治认为，建立“大波兰”的设想“肯定迟早要在东欧导致一场新的战争”。法国对此强烈不满，克里孟梭亲自起草照会反唇相讥。和会又处于破裂的边缘。

在3月27日“四巨头”的谈话中，威尔逊对克里孟梭说：“我相信，在原则上，您同意劳合—乔治关于对德国要表示温和的意见。我们不想摧毁德国，而且我们也做不到。我们最大的过错莫过于给德国在将来某个时候寻求报复提供方便的理由。过分的要求肯定要播下仇恨的种子。”

在威尔逊的亲信豪斯的斡旋下，4月中旬，克里孟梭致函威尔逊，同意美国关于把门罗主义的原则列入国联盟约的主张，但作为交换条

件，美国须对法国领土要求作出让步。威尔逊答应重新考虑过去在萨尔问题和莱茵问题上所持的否定态度，并且同英国进行了磋商。英国表示支持威尔逊对法国的让步，但以美国放弃海上军备竞争为前提。美国对此作出了许诺。于是，会议在德国疆界问题上达成了妥协。

在赔款问题上，也进行了同样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赔款总额及其分配。到底向德国索取多少赔款？专家们在这个问题上绞尽了脑汁。由澳大利亚总理休斯担任主席的委员会提出的赔款总额是240亿英镑（约4800亿金马克）。劳合—乔治曾在英国竞选大会上说过要“掏尽德国人的腰包”，尽管如此，他仍然把这个数字称为“疯狂与玄妙的空想”。法国为了使德国至少在半个世纪内不能恢复元气，并弥补自己在战争中所受的巨额损失，它提出了天文数字般的、高达240亿英镑的赔款总数，仅东北各省的复兴费用一项，法国就要求赔款30亿英镑（约合600亿金马克）。但据统计，1917年法国全部国民财产总共也不过24亿英镑。劳合—乔治认为，赔款额不应超出战败国的赔偿能力，而且，“支付赔款的期限应该随着造成战争的一代

人的消失而结束。”根据这些原则，英国财政专家凯恩斯以政府名义在和会上提议赔款总数为20亿英镑（约400亿金马克）。美国人深恐克里孟梭和劳合—乔治打死这只下金蛋的母鸡。因为，如果压给德国的赔款负担过于沉重，可能导致德国经济的崩溃，赔款义务也不能正常履行，美国在欧洲的大量战债就无法索取并难以收回。此外，美国也不想加强自己的竞争对手英国和法国。并失去一支在欧洲牵制苏俄的力量。因此，它也主张适当减轻德国的赔款。美国专家戴维斯提出了250亿美元的赔款数字。

由于意见分歧，最后决定，暂不确定赔款总数，这个问题交给赔款委员会去研究解决。

在赔款的分配问题上，战胜国之间也引起了一场争吵。劳合—乔治提出的分配比例是：英国30%，法国50%，其他国家20%。但法国坚持要58%，英国25%。劳合—乔治指出，英国在战争中支出的战费同法国一样多，因此，英、法的分配比例过于悬殊是不合理的。经过激烈争论，克里孟梭宣布了法国的最后意见：法国56%，英国25%。威尔逊提出了调解方案：法国56%，英国28%。结果，没有达成协议。根

据美国的建议，将它交由一个特设委员会讨论确定。

在对德和约的讨论中引起争议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德国武装力量的处置。为了使战后的德国军队成为对付苏俄的一支重要力量，并用以牵制英、法，美国开始主张保留德国的几乎全部武装力量。英、法对此坚决反对。于是，美国代表又向大会建议保持60个师团的德国军备力量，同样为英、法等国所拒绝。但英、法两国的立场也并不一致。英国念念不忘的是摧毁德国的海上作战能力，因为德国当时虽然战败了，但它的舰队在战斗中并没有被摧毁，大部分舰只还停泊在英国的斯卡帕湾。为了促使法、德对抗，保持未来欧洲的均势，英国也不愿过度削弱德国的陆军力量，而这正是法国做梦都在惦记着的事情。法国还要求限制德国的军火生产，并为此建立国际监督。条约最后规定，德国的陆军为7个步兵师和3个骑兵师。协约国之所以让德国保存10个师的兵力（10万人），是为了使德国垄断资产阶级能有一定力量去镇压国内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和对东方的苏俄红色政权构成一定的威慑。

意大利首相奥兰多虽然名列巴黎和会上的“四巨头”之一，但由于意大利战时表现不佳，此时又国贫财弱，有求于人，因而英、法、美三国谁也不去理会这位人微言轻的小兄弟，它们认为有他不多，无他更免得碍手碍脚。奥兰多从开会以来一直屡遭白眼和受坐“冷板凳”的窝囊气，早就窝着一肚子火而准备找机会发泄。在“四人会议”上，奥兰多一直等待着审议意大利的各项要求，但意大利的意愿根本没被英、法、美放在眼里、记在心上。因而，4月中旬，正当主要问题解决就绪时，奥兰多再也按捺不住了，他打断会议的既定程序，突然发言，提醒英、法、美注意意大利的存在和他是意大利的全权代表。奥兰多不仅要求兑现1915年4月英、法在《伦敦协定》中对意大利做出的秘密许诺，并进一步要求取得从未许诺给它的处于亚得里亚海枢纽地位的阜姆港（今里耶卡）。这引起了南斯拉夫的强烈抗议。而英、法也不愿意加强意大利在南欧和地中海的地位。美国为了扩大在巴尔干的影响，也不支持野心太大的意大利的要求。威尔逊公开声明，反对意大利对阜姆港的要求。他说，这些要求和美国奋斗的原则格格不入。不

仅如此，在与意大利举行的秘密会议中，三巨头还提出了一条所谓的“威尔逊线”，将《伦敦协定》许诺给意大利的土地加入缩减。奥兰多表示，如果得不到阜姆港，他无法返回意大利。威尔逊反驳说，“我比你更能深刻地了解意大利人”。4月23日，威尔逊发表了一篇公开宣言，他说，意大利人民应该表示“他们那伟大的和慷慨的高尚品性，为正义而牺牲利益”。次日，奥兰多退出和会返国，以此进行威胁。结果不但未达到目的，反而又亏了一把。英、法、美三国首脑乘奥兰多退席的机会，决定允许希腊占领土耳其西部的最大港口城市斯麦纳（今伊兹密尔）。而按秘密协定的规定，这个城市原是许给意大利的。当时意大利又面临财政危机，正同美国进行着借款谈判，加之奥兰多担心，如果在自己缺席的条件下签订和约，意大利可能更加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他也顾不上什么面子，在5月10日又主动地一声不吭地返回和会。

趁火打劫、居心叵测的日本帝国主义，在和会讨论欧洲事务以及与日本利益不很相关的问题时，在许多时候一言不发，作壁上观，装出一副清高大度的模样，所以在和会上被称为“沉默

的伙伴”。但一牵涉到日本在远东的利益时就立即原形毕露争吵不休。日本利用西方列强的矛盾，实施它在亚洲大陆的掠夺计划，想急于使它在大战初期强占的中国的山东地区合法化。日本参加和会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求继承以前德国在中国山东所强占的一切权益，取得列强对它在中国的特殊地位的承认。在1月下旬的“十人会议”上，日本代表牧野为侵占中国山东巧言诡辩，还无耻地披露了英、法、俄、意、日五国1917年3月同它达成的关于山东问题的秘密谅解案。

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在国内广大人民群众的压力下，提出了废除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特权的合理要求。中国代表、驻美公使顾维钧据理驳斥了日本的立场，坚持“胶州租借地、胶州铁路以及其他一切权利，应直接交还中国”，呼吁和会在处理山东问题时“尊重中国政治独立、领土完整之根本权利”。他还义正词严地声明：(1) 1898年3月，德国强迫中国签订的关于租借胶州湾的条约，因中国对德宣战而自动失效。中国既是战胜国，完全有权收回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2) 日本占领青岛和胶济铁

路是军事上的强制行为，在法律及事实上均未正式取得租借权或占有权。(3)中日之间有关山东的条约，是日本以最后通牒的形式胁迫而成的，已不再有效。中国还通过两份照会提出取消日本和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以及列强在华的特权，这些要求包括：废除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警；封闭外国在中国的邮政电报机构；取消各国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归还租界；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等。

这些要求的实现，将意味着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一切特权和利益从此将被一笔勾销，中国成为一个完全的主权国家。帝国主义进行战争是为了掠夺，在谈判桌上进行争吵同样是为了掠夺，掠夺是他们的本性，他们岂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因此，他们对中国的要求根本不予重视，但在山东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日本代表牧野继续援引1917年的“密约”和“二十一条”，坚持原来的要求。他甚至厚颜无耻地说，这是日本对德国作战付出代价的应得报偿，是公平合理的。

帝国主义列强虽然借口“二十一条”是中、日两国之间的事而拒绝加以讨论，但美国十分

担忧日本在中国的势力膨胀，会威胁到自己的利益。因此，为了迫使日本放弃它战时趁机在中国所攫取的权益，美国对中国的要求给予支持，反对将山东交给日本。英、法等国为了阻止美国在远东势力的扩张，同时害怕反对日本的要求会开了废除战时密约的先例，于己不利，因而采取支持日本的立场。日本见有英、法为它撑腰打气，更加有恃无恐，气焰愈益嚣张，以拒签和约对美国进行恫吓。4月24日，即奥兰多退出和会的当天，日本利用这一对它有利的时机趁机发难。西园发出了一封措词专横的信件，要求“对这个问题……尽速作一明确的解决”，如山东问题不在“最短期间内”解决，日本将不在和约上签字，也不参加国际联盟。在次日的“三巨头”会议上，劳合—乔治和克里孟梭再度表明了准备遵守1917年的秘密谅解的决心。

此外，当时还传出了如果日本拒绝参加国联，英国也会起而仿效的消息，以及假如日本在山东问题上受挫，它将联合德国和俄国另建一个集团的流言。威尔逊考虑到意大利的退出已给和会造成裂痕，如日本再援例退出，和会就会遭到更大困难，创建国际联盟的计划无疑也会

告吹，自己的第一炮就打不响，而先前已夸下大话，今后面子上还哪里挂得住？因此，在劳合—乔治的劝说下，威尔逊也就借着台阶而下，顺水推舟地表示让步。4月30日，“三巨头会议”终于满足了日本的要求，同意把山东交给日本。尽管威尔逊在会上尽力装出一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屈打成招、爱莫能助的面孔，但在明眼人看来，纯属装腔作势、徒增笑耳。

就在各帝国主义列强制订自己的参加巴黎和会的野心勃勃的掠夺计划的前夕，苏俄爆发了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十月革命并取得了迅速的成功。第二天，列宁即起草并公布了《和平法令》，建议一切交战国都应立即停止战争并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条约。

十月革命被帝国主义视为十二级“红色地震”，沙皇俄国的土崩瓦解本已使他们惊恐和震惊，苏俄的和平外交政策无疑更是对他们掠夺计划的当头一棒。因而，他们在自己的会议计划中赶忙加上应付苏俄的内容。美国总统威尔逊早在赴法参加巴黎和会的途中，就明确提出进攻布尔什维克是和会的任务。他说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对于现世界之秩序的一种抗议。我们在

和会中应该为一种新秩序而奋斗”。

会议开幕前夕，法国的福煦元帅也在发言中公然建议组织反苏维埃俄国的远征。福煦得到了波兰首脑帕代赖夫斯基提供的关于“布尔什维克占领维尔纳（维尔纽斯）”的消息，坚决主张向但泽（格但斯克）—托伦地区派兵，（当初，在讨论延长同德国的停战协定时，福煦曾要求准许法军假道但泽，其原因就在于此。）远征军的主力部队应由美国派出。福煦解释他的建议说：“他们的部队至今士气极为旺盛。”这位元帅的建议所要达到的目的有三：(1) 可以援助法国的盟邦波兰；(2) 把美国和法国的利益联系起来；(3) 使美军撤出法国。

1919 年 1 月中旬，在巴黎和会正式召开前的几次预备会议上，根据威尔逊的提议，列强专门就“俄罗斯问题”进行了讨论。劳合—乔治忧心忡忡地说，东欧的全部将有“卷入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大漩涡”的危险，因此，“如谓和平会议对于俄国毫不加以干涉，而能单独对德媾和，这实在是徒劳无益的设想”。这样，所谓“俄罗斯问题”就成了和会讨论的重要问题。英、法、美等国都主张颠覆俄国苏维埃政权，但在究竟采

取何种形式进行干涉的问题上却意见不一。

法国寄希望于武力，主张以波兰为基地立即对苏俄实行进攻，并建议出动美国军队。而劳合—乔治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无论是列强对俄国的封锁、武装干涉，还是邓尼金、高尔察克之流白卫军将军们的叛乱都难以奏效。他主张同苏俄进行外交谈判，通过威胁和利诱，迫使苏俄就范。而且，武装干涉既不一定能达到目的，也有引起本国无产阶级的抗议和斗争的危险，远不如通过和平谈判、采用隐蔽的方式解决问题更有保障。他还劝说威尔逊不要为法国人火中取栗。这一意见得到了威尔逊的赞同。美国总统遂以和会名义于1月22日发出召开“王子岛会议”(即马尔马拉海中的普林茨岛)的呼吁，邀请俄国交战各方参加，以讨论在俄国“恢复和平”的问题。这一阴谋没有得逞。英、美继续玩弄外交伎俩。但到3月，俄国的军事形势发生了变化，新生的苏俄政权又一次陷入了白卫军的包围。这时，威尔逊和劳合—乔治撕下了自己的面纱，不仅中断了同苏俄的谈判，而且向白卫军提供大量的军火和物资支援。在5月下旬的一份给高尔察克的照会中，英、法、美、意表示了

承认他的反革命政权的意向。和会还批准了对苏俄实行经济封锁的计划；并决定建立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和芬兰等国组成的“防疫地带”，以阻止俄国革命影响的扩大。同时，他们继续在“和谈”的烟幕下，组织对苏俄的新的军事进攻。和会批准了反苏武装干涉的新计划，确立和划分了各国在俄国行动的范围。这样，和会实际上成了指挥反俄战争的司令部。

巴黎和会是世界上有史以来为数极少的几次大规模的国际会议之一。尽管事前对会议的议事规则准备得十分详尽，对记录程序和文件保管制度等也作了规定。但因为与会几个大国不断横生枝节，相互争吵，人为地打乱会议程序，因而事过不久，这些规定便有相当部分被破坏了。在外交史上未必能找到像巴黎和会这样混乱的会议，有些会议几乎没有什么记录，甚至连秘书的笔记也没有。整天忙于开会的克里孟梭听到这一情况时，毫不在意地说：“管他妈的什么鬼记录……”

经过3个多月的明争暗斗，列强就上述各项问题基本达成了协议。这时，欧洲革命运动不断发展，帝国主义各国处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的惶惶不安之中，因而，它们为了尽快脱身，要求德国政府以最快的速度在和约上签字。

战胜国口称维护和平，伸张正义，却把战败国当做一块大蛋糕切得七零八落

巴黎和会从1919年1月18日开幕到4月28日的100天里，尽管争吵不断，但各国在国际联盟的问题上还是较快地达成了协议，并制定了盟约，这成了后来和会签定的《凡尔塞条约》的第一部分。4月28日，威尔逊在全体会议上提出盟约的定稿。法国代表莱昂·布尔茹阿提议建立一个隶属于国联的军事机构；比利时代表于戈芒对布鲁塞尔没有被选为国联会议的地址表示遗憾。突然，克里孟梭打断了讨论，他宣布，既然没有别的反对意见，美国总统的建议就算全体一致通过。克里孟梭是用法语讲的，而且说得很快，致使译员来不及翻译。与会者当中，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他说了什么，还有许多人没听清楚。等到克里孟梭宣布转入下一个议程时，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大会已“全体一致通过了”国际联盟盟约。1920年1月10日，

《凡尔赛条约》正式生效，国际联盟同时宣布正式成立。

《国联盟约》共有26项条款，它主要规定了国联的组织机构、职能、原则和会员国的义务。盟约规定：美、中、英、法、意等参加对德作战的国家以及新成立的国家（汉志、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共32国均为国联创始会员国（中国虽没有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但在对奥和约上签了字，所以也是国联创始会员国）。同时，战时13个中立国荷兰、丹麦、挪威、西班牙、瑞典、瑞士、波斯、阿根廷、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巴拉圭、智利和萨尔瓦多亦被立即接受为会员国。欲加入国联的其它国家，必须经国联大会会员国2/3的票数通过，并经行政院全体一致同意，方可加入。瑞士在加入国联时，提出了一项保留条件：它将保持永久中立。为此，国联行政院承认它的“特殊情况”，并指出，在国联采取军事行动时，瑞士只提供经济援助。

截至1934年9月，先后有63国加入国联。战败国德国和社会主义苏俄最初都被排斥在国联之外；美国虽为创始会员国，因它没有批准《凡尔赛条约》，所以，实际上也不在国联之内。

国际联盟的主要机构有4个：(1) 行政院。据盟约最初章程规定，国联行政院由9国代表组成：5个常任理事国（英国、意大利、美国、法国和日本，但美国的理事位置一直空着）和四个非常任理事国，后者每年更换一次。第一届非常任理事国是希腊、西班牙、比利时和巴西。中国在国联第三届大会当选为非常任理事国。(2) 会员国全体代表大会。每年定期在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在国联的所在地日内瓦召开。每个会员国可派3名代表，但只有1票表决权。这样，英国及其自治领就拥有6票，从1923年起加上爱尔兰，则增加到7票。一般情况下，大会及行政院的决议，只有经过出席的会员国一致通过才能生效。(3) 秘书处。由秘书长一人领导，是国联的常设事务机关。(4) 常设国际法院。法院设法官11人，候补法官4人，任期9年，每年在海牙集会一次。此外，国联也成立了国际劳工组织等10多个常设机构和专门委员会，负责讨论经济和财政、运输和国际卫生等事宜。此外还有几个顾问委员会，其中最重要的除委任统治地委员会而外，就是裁减军备委员会。

《国际联盟盟约》是国联的根本法。盟约序

言宣称，国联的宗旨是“促进国际间合作，并保持其和平与安全”、“维持各国间公开、公正、荣誉之邦交”。实际上国联成立的真正作用在于：维持凡尔赛条约所造成的国际“新秩序”，保护战胜国帝国主义的既得利益；敌视和遏制苏维埃俄国势力的发展，正如劳合—乔治所说，国联是“防止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唯一办法”；适应战后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思潮的需要，欺骗世界舆论。

国联盟约声称：尊重“各会员国领土之完整及现有政治上之独立”，提出禁止利用战争作为解决争端的手段，开始区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并要求对侵略者采取集体制裁，这从历史与国际法的角度看是一个进步。盟约规定，如果会员国之间发生争端，“应将此事提交仲裁，或法律裁判，或交行政院审查，并约定无论如何，非俟仲裁员之裁决或法庭判决，或行政院报告3个月以后不得从事于战争”；会员国如有不顾上述条文而从事战争者，则应被视为“对于联盟所有其他会员国有战争行为”，其他会员国应对之实行经济、政治和军事制裁。而行政院则应建议各有关政府派遣一定数量的部队，“用以维护对国

联各项义务的尊重”。但是，这里既无关于“战争”、“战争行为”的规范性定义，又不确定实行制裁的具体措施，而且还要全体一致通过决议才能采取制裁行动。这样，所谓的制止侵略不过是一句空话。由于几个帝国主义大国把持了行政院常任理事国和苏俄被排斥在外，国联在早期只能是战胜国的俱乐部。历史已经证明，在日本侵略中国和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的事件中，国联非但不能制止侵略，反而起了包庇和纵容侵略者的作用。此外，盟约的这些条款还被列强用做发动对苏俄的集体武装干涉的依据。

国联盟约关于裁军的规定也是非常含糊不清的。它要求各会员国“为维持和平起见，必须将本国军备减至最少之限度，以足以保卫国家之安全及共同实行国际义务为限”。这种笼统的条款只能给世人造成帝国主义列强希望裁军的假象，而军备竞赛并未因此受到限制。盟约要求各会员国负有就其国内关于军备之规模、陆海空军之计划及可供战争用之工业情形，“互换最诚实及完备的通知之义务”。但行政院依据盟约拟定的裁军计划，并没有法律效力，各有关国家政府有权对此种建议不予理会。

国联盟约还规定了委任统治制度。它规定将战败国的殖民地分为甲、乙、丙三类，由国联委托“先进国”统治。盟约第二十二条规定，委任统治地依当地“人民发展的程度、领土之地势、经济之状况及其他类似之情形”而分为三类：甲类是过去属于土耳其帝国的一些属地，包括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伊拉克和外约旦，“其发展程度已达可以暂被承认为独立国之程度”，但“仍须有受任统治国予以行政之指导及帮助，至其能自立之时为止”，但是，对这一时刻到来的期限和条件，都未作明确规定。乙类是原德国的中非殖民地，包括多哥、喀麦隆、卢旺达—布隆迪区和坦噶尼喀。“依其发展之程度，受任统治国必须负地方行政之责”，应以禁止贩卖奴隶、武器和酒类，并保护当地居民的信仰和宗教自由为条件，但应保证其他国家“在交换上、商业上之机会均等”。丙类是德国过去在西南非的殖民地及太平洋上的岛屿属地，包括西南非洲、新几内亚、那卢、西萨摩亚和赤道以北的太平洋岛屿，应“受制于受任统治国法律之下，作为其领土之一部分”，实际上是长期占领。以上三类委任统治地区的面积达 125 万平方英

里，人口1900万，每年贸易额达1.6亿美元。所有地方全被英、法、日、比等国以表面上由国联给予的委任国的名义进行统治。不论委任统治是何种形式，委任统治国都必须向国联行政院提出年度报告书，国联行政院则通过一个常设委任统治地委员会对所有委任统治国实行监督。这个委员会设委员10人，代表委任统治国的3人，代表非委任统治国的3人。所以它的功能是具有一种特殊微妙性质的，显然纯粹是一个顾问机关；而且这个委员会，除去国际舆论的力量而外，不能凭靠任何制裁。然而，无论是哪类委任统治，事实上都不过是殖民掠夺的一种新的稍为隐蔽的形式。

国联盟约声称，建立委任统治制是为了履行帮助殖民地发展的“神圣任务”，然而，透过那些娓娓动人的美丽言辞，我们仍不难发现，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等国重新瓜分殖民地的一种形式，是帝国主义者维持殖民体系的一个工具和殖民统治的新形式。对此，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非常了解，人们所谓分配殖民地委任统治权，就是分配被委托去盗窃和抢劫的权利，分配地球上一小

撮人对大多数人进行剥削的权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联的首倡者威尔逊没能实现自己的如意算盘，美国既没当上国联领袖，也未获得委任统治权，落得两手空空。这使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大为不满。因此，尽管美国总统为建立国联奔走呼号，效尽犬马之劳，回国后为了争取国内对国联的认可而穿行大半个美国，作了 20 多场演说和辩论，直到声嘶力竭以至于在最后一站当场晕倒，但美国国会还是拒绝批准美国加入国联。

总之，国联从它成立的时候起就存在致命的弱点：它是建立在帝国主义列强对立与冲突的基础之上的。对国联成立有重大影响的美、英、法三个大国各有打算。英国要把国联作为自己外交政策的附属物，法国要使它成为推行凡尔赛条约的有用工具。美国原本是倡议最早的国家，但后来却置身于国联之外。美国拒绝加入国联的原因，除了前面所说的一无所获而外，还由于一部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愿受国联盟约的束缚，美国总统哈定说，参加国联将使美国“立于被动地位，一旦世界有变，不能自由决断”，这“既损美国独立之精神，又与美国百年

来外交方针相抵触。”英、法由于夺取战败国的大部分殖民地，使它们的地位大大巩固；而且在大战结束后，英国仍然是世界海上的强国，法国在欧洲大陆也拥有一支令人生畏的陆军。因此，国联一成立，就被英、法所控制。美国虽未加入国联，但后来在国联一些机构中派有“观察员”进行活动，有机会就找英、法的麻烦，拆他们的台。

列宁对国际联盟进行了深刻的揭露，指出这个“资本主义列强的联盟是一种无聊的骗局，实际上是一群你抢我夺的强盗的联盟”。“事实上这是一群互相厮杀、彼此间毫无信义可言的野兽”。尽管什么民主、正义、和平、友谊等动听的言词在国联盟约中屡见不鲜，但事实胜于雄辩。国联成立后的丑陋行径多次证明，它不过是一所帝国主义列强勾心斗角的赌场，是用来绞杀苏维埃革命政权的工具和一个新的对付各国人民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反革命神圣同盟”。对此，毛泽东同志早在1926年就指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

举着，号召全世界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

国联盟约通过的第二天，即1919年4月29日，以外交部长勃洛克道夫·伦卓为首的德国代表团被召到巴黎，接受和约文本。5月7日，各战胜国代表齐集于凡尔赛宫的明镜厅中，德国代表团被允许最后进入会场。克里孟梭在代表战胜国交付和约草案时宣称："清算的时候到了。你们向我们请求和平。我们同意给你们和平。我们现在就把这项和平的文书交给你们。"

协约国已事先通知德国代表，不允许当场进行任何口头辩解，只许在15天的期限之内提交书面意见。但德国外长还是极为不满地答复克里孟梭说："有人要求我们承认是战争的唯一祸首。如果我本人这样承认，那就是撒谎。"言下之意，战胜国也应负发动战争之责。他还认为和约的内容过于苛刻，同德国签定的停战协定的条件不相符合，并且一旦付诸执行，"会造成德国的破产和毁灭，将使有权索取赔偿的国家，丧失他们指望得到的利益，将使欧洲整个经济

生活陷入不可想象的混乱”。

为了防止德国拒绝签约，三巨头多次召开会议商量对策。5月9日，克里孟梭提出了关于占领柏林和法兰克福以对德国施加压力的提案。10日，福煦又建议对德实行军事占领，强迫德国成立一个能在和约上签字的政府。劳合—乔治担心这一计划会产生难以预料的恶果。他认为还是以恢复封锁的办法较好。克里孟梭和威尔逊则唯恐“使用封锁会招来布尔什维克主义”。

5月7日，凡尔赛和约的内容在柏林公布，引起了德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各地纷纷举行群众集会，抗议条约的苛刻条件。5月8日，德国临时政府总统艾伯特声称：“和约条款是不能实现和不能负担的。”5月9日，德国代表照会克里孟梭说，和约是任何国家所不能忍受的。面对协约国重新发动进攻的威胁，艾伯特问最高统帅部：陆军是否能抵挡得住协约国的进攻。5月29日，德国代表团向和会提出了长达400多页的修正意见书，实际上几乎推翻了和约草案的主要条款。

6月16日，克里孟梭代表协约国答复，只

同意对和约草案进行非实质性的个别改动，基本坚持原来的要求，并声称，德国要么对和约完全接受，要么完全拒绝，并限定在5天之内作出答复，否则，协约国将宣布停战期终止，而“以武力实施上述条款”。在德国代表团的一再请求之下，答复期限才放宽到一周。

6月17日，德国陆军总司令冯·兴登堡元帅答复艾伯特说，德军将抵挡不住敌人的进攻。艾伯特再次询问最高统帅部：如果军事抵抗协约国还有一点成功的可能，他将设法使议会拒绝接受和约。6月20日，协约国命令福煦将军准备率领军队向德国进发。德国在强大的军事威胁下，统治集团内部就签约问题作了反复讨论。一些人主张全盘接受和约草案，但相当一部分人试图利用战胜国之间的矛盾，使和约的条件得到修改。新成立的鲍威尔内阁于6月21日通知和会，准备签署和约，只是不承认“德国人民”应负战争罪责。魏玛国民议会通过了有条件接受和约的决议，反对把德国作为大战的唯一祸首等条款。然而协约国方面不肯让步，克里孟梭再次警告德国，协约国不接受对和约的任何修正或者保留。英、法、美、意商定，如果德国

在6月23日下午7时前拒不签约，四国军队将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配合下，再次向德国发起进攻。这样，摆在德国当局面前的，不是无条件签署和约，就是准备重新作战。这时，兴登堡元帅让格罗纳将军告诉艾伯特："武装抵抗是不可能的事"。在这种山穷水尽、无可奈何的情况下，6月23日下午5点，德国政府被迫决定无条件接受和约，同时却滑稽地声明是"屈服于优势的暴力，并不放弃认为和约条款是空前不公正的意见"。于是，和会决定在德意志帝国诞生之地即凡尔赛宫，奥皇储被刺的5周年，即1919年6月28日，签订和约。

1919年6月28日下午3时，31国（中国代表拒不出席）代表齐集凡尔赛宫的明镜大厅，然后召德国代表即新任德国外交部长米勒和司法部长贝尔进来，让他们首先签字，协约各国则依国名的法文字母次序逐一签字，到3点45分完成。这就是《协约及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因地名之原因，后世简称为《凡尔赛条约》。

法国人为这个简单而令人永志不忘的仪式所选择的地点是凡尔赛宫的镜厅，这个选择对德国来说，是极为不幸的。因为，48年前在普

法战争中得胜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就是在这个大厅里宣布了德意志帝国的成立，同时，也就是在这里，威廉一世和俾斯麦强迫法国签订了1871年割地赔款的预备和约。当时，俾斯麦以“铁和血”所缔造的德意志帝国在这里拔出了利剑。然而，他们绝对没有想到，由于时过境迁，宾主易势，德国会在48年后，在同一个地方，体验一下当年刺向别人的利剑转而加诸自身的感觉。对法国而言，它趁机羞辱了德国，一雪沉积了几十年的国耻而增加了不少快感。但德国代表在回首当年帝国的荣耀而今日沦为敌手的阶下囚之时，今昔对比之下，心头的几多酸楚，恐怕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正可谓“几家欢乐几家愁”。是作茧者自缚、玩火者自焚的因果报应，还是历史以其惊人的相似之处而有意与当事者开一个小小的玩笑？也许对这个问题，德国最有资格来回答。

《凡尔赛条约》长达432条，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国联盟约》，共26条；第二部分是《对德和约》，共406条。《对德和约》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1）德国承担发动世界大战的罪责。

（2）德国的领土问题。

关于德国的西部疆界，和约规定：德国应按1870年的德法边界把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包括莱茵河上的所有桥梁。萨尔煤矿的开采权让给法国，萨尔区的行政则由国际联盟代管15年，期满后，举行全民投票以决定其归属（后公民投票归德国）。莱茵河左岸由国际联盟占领15年，以监督德国履行和约条款。划分了三个占领区：第一占领区是科隆地区，由英军防守，满5年后撤兵。第二占领区是科布伦茨地区，由美军驻守（美军于1923年1月撤走，由法军接防），满10年后撤兵。第三占领区是美因茨地区，由法军驻守，满15年后撤兵。莱茵河左岸以及莱茵河右岸50公里范围内，德国无权设防。在上述地区内，“无论永久或暂时，均不准存留或集合军队，以及举行任何演习”。德国把莫列斯纳划给比利时，欧本和马尔梅迪按和约规定经公民投票后，结果也划给了比利时。什列斯维希北部同样采取公民投票的办法划给了丹麦。

关于德国的东部疆界，和约规定：德国承认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独立。普鲁士的西里西

亚省南部划给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德捷边界基本上按德国与奥匈边界划定。普鲁士的波兹南省全部、西普鲁士省的大部分、东普鲁士省和西里西亚省的一部分划归波兰。上西里西亚问题通过全民投票解决。但泽市（今格但斯克）及所属地区交由国联管制，被宣布为“国际自由市”，但泽市纳入波兰海关系统，波兰有权控制但泽走廊的铁路及水路。这样，重新确定后的德国本土，便被经过西普鲁士的所谓波兰走廊分隔为两部分。

此外，和约还规定，德国放弃默麦尔（克来彼达），由“主要强国”来决定该地区的归属（经过长期争论后，1923年移交给立陶宛）；战胜国又责成德国政府放弃对奥地利的要求，战胜国保证奥地利的独立。凡尔赛条约第八十条规定，德国“应照将来奥国与协约及参战各国所订之条约中规定之疆界，承认并确切尊重奥国之独立。”（这一条已为后来签订的圣日尔曼和约实现了。）

根据和约，德国的疆界经上述变动之后，它的领土减少了1/8，达7万多平方公里，人口减少了1/10，约650万人。这些地区出产的铁矿

石和锌占德国开采量的75%，煤占20%，生铁占26%。

(3) 德国放弃其全部殖民地和势力范围。

协约国"考虑到德国对前德意志帝国所属殖民地进行统治的历史，考虑到如果德国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拥有潜艇基地，必将构成对各国自由和安全的威胁，……任何一块德国殖民地决不交还德国"。因此，和约规定，德国将自己所有的殖民地以国联委任统治的形式让给战胜国。德属非洲殖民地多哥和喀麦隆由英、法两国瓜分；西南非洲划归英国自治领南非联邦；东非洲的坦噶尼喀（今坦桑尼亚的大部分）划归英国；卢旺达和布隆迪划归比利时。德属太平洋岛屿也被瓜分：赤道以北的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归日本；赤道以南的新几内亚归英国自治领澳大利亚，萨摩亚划归新西兰。

接受对这些殖民地实行委任统治的国家，应遵守"门户开放"原则。这是对美国的安慰和让步，这就为美国资本向原德国殖民地及阿拉伯国家渗透提供了条件。

按照和约，战胜国从德国手中夺走的殖民地的总面积，在非洲有270.7万平方公里，人口

1152.7 万人；在太平洋上有 24.5 万平方公里，人口 64.1 万人。和约还规定，德国放弃在中国、泰国、利比里亚、摩洛哥和埃及的特权，但竟无视中国也是战胜国的事实，公然将德国在中国山东非法获得的“一切权利所有及特权”、包括胶州湾租借地转让给日本；埃及受英国“保护”，摩洛哥受法国“保护”。

（4）关于对德国军备的限制。

凡尔赛条约的军事条款（第一百五十九至二百一十三条）规定，德国废除普遍义务兵役制，德国军队“只能以志愿服役者募集组成之”，即实行雇佣兵役制度，不许德国进行战争动员。废除普鲁士特色的军训制度，解散参谋本部、各军事院校和其他军事机关。德国的武装力量以 11.5 万人为限，其中陆军（国防军）为 10 万人，海军 1.5 万人，服役期限为 12 年，军官不得超过 4000 人，服役期限为 25 年。军队的任务是维持国内秩序和巡查边界。同时规定这支军队不能拥有空军和各种现代化武器：坦克、重炮、高射炮、化学武器等。德国军舰的最高限额为 36 艘，包括 6 艘轻型战斗舰，6 艘轻型巡洋舰，12 艘驱逐舰，12 艘鱼雷艇，不准拥有潜水艇和主

力舰（排水量1万吨以上的战列舰和排水量6000吨以上的巡洋舰）。德国领水以外的一切德国军舰均应交给战胜国。成立3个国际监督委员会，以监督和约军事条款的执行。

和约还规定，德国必须拆毁紧靠海岸地带以外的一切海防工事，以及西部边境的防御工事，但东部和南部边境上的工事，仍旧保留，军事委员会的美国代表德古特将军声称："要求拆除这些工事是不适宜的……因为它们可以用来防御布尔什维克。"可见，西方国家在解决德国的边界问题时，已经考虑到他们的反苏计划了。此外，和约四百三十三条的秘密附件规定，德国将其占领军留在东线，听候协约国的"特别布署"，再行调动。这就使德国扮演了外国武装干涉苏俄的急先锋的角色。和约的上述决议，正像凡尔赛会议的过程一样，再次证明了巴黎和会就是帝国主义列强武装干涉苏俄的一个特殊的参谋部。

（5）关于德国的赔偿问题和其他经济条款。

和约第二百三十一条规定："协约各国和与之联合的各国政府宣布，而德国承认：德国及其盟国应对由于德国及其盟国发动进攻而挑起的

战争使协约国和与之联合的各国政府及其国民所遭受的一切损失和一切损害负责。”英、法、美提出确认德国是战争唯一罪魁祸首的论点，力求借此削弱作为其竞争对手的德国，并为向德国和其他战败国索取赔款奠定法律基础，以便由这些国家尽可能全部地弥补自己的战费。和约还规定，德国应承认即将同土耳其及保加利亚签署的条约，应废除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以及布加勒斯特和约，承认并尊重1914年8月1日以前原属俄罗斯帝国的一切地区的独立，并在第一百一十六条中规定，俄国有权向德国索取相当数量的赔偿（后苏俄主动放弃了赔偿要求）。

赔款数额和交付期限后来由英、法、美、意、比的代表组成的专门的赔款委员会来确定，并在1921年5月1日以前向德国政府提出。偿付的期限和计划由该委员会确定，自1921年算起，不得超过30年。在此之前，德国必须以黄金、商品、船只和有价证券向协约国先交付200亿金马克的赔偿。德国赔款的总数定为1520亿马克，其中1320亿马克（即1921年5月1日以前付的200亿除外）应在以后的30年内付清。

1920年7月斯帕（比利时）会议规定了直接参加同德国作战的每个国家应得的德国赔款总数的百分比，即法国52%，英国22%，意大利10%，比利时8%，日本和葡萄牙各为0.75%，余下的6.5%在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希腊和其他协约国之间进行分配。

此外，德国应交出全部1600吨级以上的商船；1000吨级以上的商船交出1/2，渔船交出1/4和内河船只交出1/5。5年内，德国应每年为协约国建造20万吨商船；10年内，德国应向法国供应1.4亿吨煤，向比利时供应0.8亿吨，向意大利供应0.77亿吨。德国应将库存颜料和化学产品的半数以上以及在1925年前每年所生产上述产品的1/4交协约国。

德国的一切经济资源，都应用于被侵害地的复兴。例如，牲畜、机器、工具、装备等被毁的，德国应以实物来赔偿。而建筑材料如石、砖、瓦、钢材、木料、石灰、水泥、玻璃以及家具等等，也要德国制造供给。最紧急的是：德国应于3个月内赔法国雄马500匹、驹和马3万匹，公牛2000头，乳牛9万头，山羊1万只，绵羊10万只。同时对比利时也应同样赔偿，仅数额略少

些。德国还要退还1870年从法国夺去的旗帜、战利品、美术品等；赔偿比利时鲁文大学的史料；把奥斯曼的原始《古兰经》退还给沙特阿拉伯，那是土耳其从麦地那取去而赠给了威廉二世的。

和约还规定，德国关税不得高于他国。战胜国对德输出或从德国输入货物不受限制。易北河、维斯瓦河、奥得河、尼门河、多瑙河被宣布为国际河流。外国军舰和商船可以自由出入基尔运河。而且规定，德境占领军的全部费用都由德国负担。

凡尔赛条约使德国失去它的领土的1/8，人口650万，全部海外殖民地、投资及一切所有；商船自570万吨减至50万吨；海军原仅次于英国，今已实际上不复存在了；陆军则仅及法国的1/7。最糟的是德国签了空白赔款支票，赔偿成了一个无止境的无底洞。这个条约对德国来说，无疑是一个严厉的制裁，但对于战争魁首威廉二世、兴登堡等帝国主义头子并未加以追究。威廉二世逃往荷兰，逍遥法外，兴登堡后来还爬上了德国总统的宝座，而德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没有受到多大损害，真正深受凡尔赛条约之苦的

是德国人民，特别是巨大的赔款负担完全落在了德国广大劳动人民的肩上。

对这个骇人听闻的掠夺性和约，列宁进行了严厉的谴责，指出："凡尔赛条约不过是强盗和掠夺者的条约……是一个高利贷者的和约，刽子手的和约，屠夫的和约，他们把德、奥抢劫一空，弄得四分五裂。他们剥夺了这两个国家的全部生活资料，使孩子们挨饿，甚至饿死。这真是骇人听闻的、掠夺性的和约……它把亿万人，其中包括最文明的人，置于奴隶地位。"巴黎和会的参加者，南非自治领代表斯穆茨在和约签字前夕，怂恿英国代表、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抨击凡尔赛条约，他在信中说："和约将代表腐朽的事物，总有一天我们会对它感到羞辱。"凯恩斯在他 1919 年撰写的《和约和经济后果》一书中认为，凡尔赛条约如果付诸实施，就会进一步破坏欧洲已被战争弄得摇摇欲坠和支离破碎的、脆弱的经济结构。他说，凡尔赛条约"是一个残忍的胜利者在文明史上所干出的最凶暴的行为之一。"列宁说，凯恩斯的结论"比任何共产党人革命家的结论更有说服力，更能引人注目，令人深思"。

常言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协约国在处罚了同盟国集团中的老大德国后，自然便将打击力量移到了它的那些小兄弟们的身上。凡尔赛条约签订之后，协约国又同德国的盟国奥地利、保加利亚、匈牙利和土耳其分别签订了圣日耳曼条约、纳伊条约、特里亚农条约和色佛尔条约。根据这些条约，奥、保、匈、土等国的领土被分割，军备上受到限制，同时也必须付出巨大的战争赔款。这4个条约的内容、性质同凡尔赛条约相似，因而与凡尔赛条约及其他协定一起被合称之为“凡尔赛体系”。

对奥地利的和约于1919年9月10日在邻近巴黎的圣日耳曼宫签订，故名《圣日耳曼条约》。美国政府没有批准本和约，到1921年8月24日在维也纳单独与奥国订立和约。当时的中国北洋军阀政府为了取得国际联盟创始会员国的资格，曾在对奥和约上签字。

该条约从法律上确认了奥匈帝国的解体。它规定：禁止德、奥合并；匈牙利与奥地利完全分立，成为独立的国家；奥地利承认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1929年改称南斯拉夫王国）的独立；奥

地利把加里西亚割让给波兰；把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的一部分割让给捷克斯洛伐克；把布科维纳割让给罗马尼亚（虽然市民会议曾作过重新加入苏维埃乌克兰的决议）；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达尔马提亚沿岸等地割让给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把南提罗尔、特兰提诺、的里雅斯特、伊斯的利亚、达尔马提亚海外的若干岛屿等割让给意大利。阜姆（今里耶卡）被宣布为自由港。这样，奥地利保留的土地和人口，都只及原来的1/4，失去了主要的市场和原料基地。而且，奥地利还被迫承认放弃在欧洲以外地区的一切利益和特权。更为重要的是，原来的奥匈大帝国已被彻底打碎和割裂了，一系列民族国家建立起来了。但在这里要指出的是，奥匈境内各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绝不是巴黎和会的列强们在正义原则的引导和感召下良心发现的结果，不是他们的恩赐，而是这些被压迫民族的强烈愿望和长期坚决斗争使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承认现状的结果。

条约的军事条款规定：奥地利废除强迫征兵制；陆军不准超过3万人（包括补充部队在内）；不准拥有空军；交出所有军舰和潜艇，原

奥匈帝国的全部海军作为赔款改归战胜国处理。这样，奥地利不仅丧失了原有的海上舰队和多瑙河舰队，只有权在多瑙河保留3艘小舰，作为巡查该河之用，而且连商船和捕鱼船也同舰队一道被协约国瓜分，充做了战争赔款的一部分。

条约的经济条款规定：在经济上，由英、法、意对奥实行财政监督；奥地利要担负军事赔款；赔款数额延至1922年确定，但必须在30年内付清（赔款支付的最后总额应由赔款委员会决定，但始终没有确定，而且因1922年由于向奥地利提供国际贷款，支付期限由国际联盟延期20年。这样，奥地利虽然获得了延期付款的方便，但因没有一个确定的赔款总数，因而便与德国一样，被迫将钞票扔进一个不知何时才能填满的无底洞）。

在巴黎和会上，保加利亚曾上交了一个冗长的说帖给和会，说它的参战是前任国王之过，今王不应代为受罚；又说“依民族与历史的理由”，它应拥有广大的领土权益。但和会答复说，保加利亚是战败国，没有讨价还价的发言权。在这种情况下，保加利亚代表感到胜者为王败者

为寇，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还是温顺一些好，如果再不识进退，一旦激怒了协约国那些太上皇，恐怕会招致更严厉的惩罚，难免吃不了兜着走，因而被迫硬着头皮于1919年11月27日，在巴黎近郊的纳伊，与协约国签订了《纳伊条约》。条约规定：保加利亚承认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的独立，并交出在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得的大部分领土：将南多布罗加地区划给罗马尼亚；把马其顿的一部分和蒂莫克河下游地区划给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至于爱琴海沿岸的色雷斯地区，暂时由英、法、意、美等国控制，但在1920年转归希腊。虽然协约国“承认保加利亚在爱琴海经济出口的自由应给予保障”，但事实上保加利亚从此失去了在爱琴海上的出海口。保加利亚应取消义务兵役制，代之以志愿兵役制；陆军不得超过2万人，其他武装官吏1.3万人，即合计步枪不得超过3.33万支；取消海军，但为了水警和收税，可保留无鱼雷装置的鱼雷艇4只，小汽船6只。保加利亚还担负了沉重的赔款义务，它必须在37年内支付22.5亿金法郎（合4.45亿美元）的赔款（从1920年7月

1 日起支付)，这相当于战前保加利亚国民财富的 1/4。此外，保加利亚必须在条约生效后的 6 个月内，交给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罗马尼亚和希腊 7 万多头牲畜，相当数量的机车、车厢和其他物资；在 5 年内，每年供应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 5 万吨煤。

协约国同匈牙利的和约是在 1919 年匈牙利革命失败之后于 1920 年 6 月 4 日在凡尔赛的特里亚农宫同反革命的匈牙利政府签订的，即《特里亚农条约》。条约规定：匈牙利承认原奥匈帝国范围内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承认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同塞尔维亚的合并；特兰西瓦尼亚和巴纳特东部并入罗马尼亚；巴奇卡和巴纳特西部归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斯洛伐克和外喀尔巴阡乌克兰(不顾后者的居民具有重新并入苏维埃乌克兰的愿望)归属捷克斯洛伐克；布尔根兰省割让给奥地利。这样，匈牙利与原来相比，只剩下了 1/4 的领土和 1/3 的人口。多瑙河置于战胜国的控制之下。根据条约，取消了匈牙利的强迫征兵制，仅允许其保留陆军 3.5 万人和多瑙河上的巡逻

艇3艘。匈牙利的赔款数额于1923年最终确定为2亿金克朗，从1924年11月起，在20年内付清；此外，匈牙利应赔偿过去奥匈帝国一半的国债，即22亿金法郎。

1920年8月10日，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亚美尼亚、比利时、希腊、沙特阿拉伯、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为一方，即将在国内革命中垮台的土耳其苏丹（君主）政府为另一方，在巴黎附近的色佛尔签订了《色佛尔条约》，这是战胜国与德国的盟国签订的最后一个和约。条约规定：土耳其承认汉志（今沙特阿拉伯的大部分）和亚美尼亚独立；在国联委任统治的形式下，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划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叙利亚和黎巴嫩则划为法国的委任统治地；土耳其在欧洲的领土被意大利和希腊等国瓜分；土耳其亚洲本土的伊兹密尔割给希腊；摩苏尔石油产区让给英国；安纳托利亚的西部和西南部的广大地区则划为法国和意大利的势力范围。土耳其苏丹仍把首都定在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但是，如果土耳其“不信守”和约条款，协约国保留修改此项决定的权利。至于实际

上早已丧失而形式上仍算是土耳其的非洲属地，土耳其必须正式完全放弃。结果，土耳其丧失了4/5的领土，只剩下安卡拉至黑海之间的贫穷落后的高原地区。

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无论平时或战时，一切国家的商船和军舰均可通航。设立海峡委员会，监督通航秩序。参加委员会的有：美国（如果有此愿望的话）、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和俄国，上述国家各派1名代表，可投2票，但俄国要在加入国联后方可参加；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土耳其各派代表1名，可投1票，但后两个国家也要在加入国联后方能参加。海峡委员会不受地方当局的限制而完全自由行动，它有自己的旗帜和警察。英、法、意帝国主义者指望依靠这个委员会在海峡地区为所欲为，英国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

色佛尔条约恢复了领事裁判权，土耳其的财政、铁路、工业和资源均被置于战胜国的监督之下。此外，还完全恢复和扩大了从中世纪起延续下来的特惠权制度（即外国资本家和特许权所有人享有各种特权的制度），并把这种特权扩

大到在战争过程中加入协约国一方的那些国家，而这些国家过去并不享有这种特权。

条约还规定：土耳其陆军人数不能超过5万人（其中包括3.5万名宪兵部队），不许拥有炮兵和重型武器，空军也在禁止之列；海军只能保留6艘驱逐舰和7艘炮舰，其余舰只交给战胜国。土耳其海峡地区和各岛屿上的工事应一律拆除，其余的工事可以保留，但要全部解除武装。最后，土耳其和亚美尼亚之间的边界将由美国总统仲裁决定。

色佛尔条约是凡尔赛体系所有条约中奴役色彩最明显的一个条约，它不仅使土耳其减少了4/5的国土面积，而且在实际上取消了土耳其的独立，使之沦为英、法、意、希等协约国的半殖民地。

战胜国同德国签订的《凡尔赛条约》以及同上述的德国的4个盟国签订的一系列条约，构成了帝国主义的凡尔赛体系。这个体系在战后长期影响着欧洲国际关系的发展，但它充满着激烈的矛盾和冲突。列宁高瞻远瞩地对此评论道："靠凡尔赛条约来维系的整个国际体系、国际秩序是建立在火山上的。"

列强虽由于分赃而争吵不休，但在“俄罗斯问题”上却空前一致，要把红色苏俄“扼杀在摇篮里”

1917 年 11 月 7 日，随着涅瓦河上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诞生的苏维埃俄国，立即呈现出与沙俄帝国完全不同的崭新面貌。它不仅从国体政体、内政外交等方面宣布了旧的沙皇俄国正式土崩瓦解、烟消云散了，而且明白无误地宣称：它实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它将团结一切被压迫人民和民族，一切正义力量和民主国家，为建立一个真正和平、公正的世界新秩序而斗争！这样，苏维埃俄国的诞生，开始宣告了帝国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制度之间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的开始。

俄罗斯大地上的革命的红色风暴，使各帝国主义者又惊又惧，恼恨交加，他们将苏俄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所以，在巴黎和会上，英、美、法、意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头子，一方面高唱建立所谓“战后和平新秩序”的

滥调，一方面却急忙策划于密室，多次商讨制定对付苏维埃俄国的计划，妄图把列宁所建立的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绞杀于摇篮之中"。因此，他们在商讨"俄罗斯新情况"的名义下，立即提出了一个所谓的"俄罗斯问题"的议案，并将之列为巴黎和会上的一个重要议题。

在对付苏俄方面，美国总统威尔逊似乎"慧眼独具，具有惊人的先见之明"。早在1918年1月他提出"十四点计划"、而各国报刊又争先恐后地吹捧"十四点"的"民主"性质时，他便直言不讳地供称，他的纲领是针对苏维埃国家的各项和平建议而提出的，是为了消除苏维埃俄国公布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见不得人的秘密条约和苏俄政权采取的革命外交行动所造成的影响，是抵消苏俄的《和平法令》的"民主世界的和平纲领"。他说："布尔什维主义毒素所以如此广泛蔓延，就是因为它对当前管理世界的制度是一种对抗。现在该轮到我们了，我们应该在和平会议上坚持一种新的秩序，如果行得通，那自然很好！如果行不通，那就不客气了！"

1918年9月27日，他在纽约发表演说，进

一步说明“十四点”纲领。威尔逊在“说明”中提到了有关俄国问题的第六点，我们可以透过那些动听华丽、骗取听众廉价掌声的词藻，来看一看这种解释的实质：一切在外国帝国主义者帮助下占据俄国某一块领土的白卫政府，均应受到协约国的承认和援助；高加索属于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即脱离俄国；中亚细亚交由某一帝国主义国家保护；必须在大俄罗斯和西伯利亚成立新政府。这样，关于与俄国建立“最充分最自由的合作”这一点，被公开地解释为最充分地肢解俄国和消灭苏维埃政权！威尔逊总统亲自参加了这一“说明”的草拟工作，并在1918年10月30日给豪斯的电报中表示赞同这些“说明”。这项文件曾经分送给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政府首脑，在巴黎和会上，又摆在他们面前了。

巴黎和会没有邀请苏俄代表参加。“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封锁俄国，把苏维埃共和国看作传染病的策源地，竭力使它与资本主义世界隔绝”。但在和会召开前，苏俄政府早就向各交战国政府建议，立即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这对世界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对各帝国主义

国家实现其掠夺目的也极其不利，大有一石击水，大波轩然之势。而苏维埃俄国本身的存在，更成了协约国帝国主义者重新分割世界和召开巴黎分赃会议的一个重大障碍。因此，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对苏维埃俄国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别有用心、颠倒黑白地胡说什么“布尔什维克帝国主义不仅威胁同俄国接壤的国家，它威胁整个亚洲，同时它对于美国的威胁，正如同对法国的威胁一样迫近”。因此，尽管各帝国主义国家早在和会开始时就各怀鬼胎、同床异梦而你争我夺、吵闹不休，但为了对付苏俄这个“共同的敌人”，他们又暂时勾结起来，狼狈为奸。

和会开幕前，威尔逊就认为当时“最重要的问题是全面地讨论对俄国的态度问题”。根据威尔逊的提议，“俄罗斯问题”首先被提到巴黎和会上加以讨论。在一次会议上，法军统帅福煦认为不解决“俄罗斯问题”，“协约国就有失去战争果实的危险”，因而主张加强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在1919年1月16日的“十人会议”上，劳合—乔治认为解决“俄罗斯问题”有3种方案：武装干涉、封锁和谈判。这个精明得过头了的资产阶级生意人凭着他的政治经验，也多少预感

到公开的军事干涉不会带来好的结果。他认为派军队去俄国，“军队将发生叛变”，有阵前倒戈的危险，“用武力镇压布尔什维主义是极不明智的”，如果指望邓尼金、高尔察克之流白卫军和捷克军团的叛乱者，不仅遥遥无期，而且“等于在流沙上面建高楼”。至于采取封锁政策，也不能制服苏俄。最后，劳合—乔治建议，让苏俄派代表来巴黎，设法在谈判桌上迫使苏俄就范。威尔逊也赞同和俄国代表进行谈判，但附有一个先决条件，即俄国人必须“撤出立陶宛和波兰”。

然而，法国和意大利的代表反对同苏俄政府进行谈判。意大利外长桑理诺认为，意大利和法国正受到布尔什维克的直接威胁，如让苏俄代表参加和会，无异于引狼入室，将会更增强苏俄的影响，长他人威风。他不但不主张同苏俄进行谈判，更提议建立一支反共志愿军对付苏俄。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在会上更是极尽煽动和恫吓之能事，他诡称：“目前布尔什维克的危险性是很大的。布尔什维主义在扩展。它夺取波罗的海地区和波兰……如果布尔什维主义在德国传播，经过奥地利和匈牙利而达到意大利，那么欧洲将面临巨大的危险。”所以，他坚决主张立刻

对苏俄实行公开的武装干涉。

表面上，操纵巴黎和会的英、美、法、意等帝国主义者，在对待苏维埃俄国问题上各持己见，难于共事。然而，他们在实质性的立场问题上并没有根本的原则分歧，只是在策略上和方法上有所不同而已。劳合—乔治和威尔逊不是不想以武力对付俄国，不过他们不像克里孟梭等人那样表现得锋芒毕露。劳合—乔治和威尔逊一方面主张借他人之手对苏俄进行隐蔽的干涉；一方面玩弄外交手腕，企图通过谈判使苏俄落入协约国的圈套。他们所搞的外交谈判，实际上也是为后来大规模的武装干涉做准备的。

巴黎和会召开之际，正是苏俄红军在各条战线上凯歌前进之时。在这种情况下，巴黎和会授权威尔逊呼吁俄国一切政治团体，各派3名代表前往马尔马拉海中的王子岛，在英、美、法等国代表的参与下，进行谈判。威尔逊所说的俄国政治团体中，除苏维埃代表外，还包括当时反苏维埃政府的一些反革命组织。同时，令人注意的是，拟定这次谈判的地点不是在巴黎，而是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的一个僻静之地。巴黎和会的操纵者们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孤岛作为谈判的

地点，显然是为了缩小这次谈判的影响。威尔逊在其呼吁书中，要求苏俄红军停止攻势和缔结停战协定，假惺惺地说这是为了商讨恢复"俄国的和平问题"。但他同其他帝国主义者一样，诬蔑布尔什维克"几乎是世界上唯一侵略的帝国主义力量"，并声称这次谈判会议所面临的任务是要"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帝国主义政策作斗争。"当时，协约国集团还与高尔察克缔结了一项协定，答应给反对苏俄政府的高尔察克匪帮以大力援助。

尽管如此，苏俄政府还是愿意派出代表去王子岛进行谈判，以戳穿帝国主义者假和平、真战争的阴谋。为了给新生苏维埃政权争得一个喘息之机，苏俄政府实行灵活外交，准备在沙皇政府的战前债款问题上做出一定的让步，愿意支付这种借款的利息，并同意在苏俄境内给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以租让权，其先决条件是：从苏俄境内撤出一切外国军队。这就使劳合—乔治、威尔逊处于被动地位，因为这些帝国主义头子是不愿放弃对苏俄的武装干涉方针的；而克里孟梭等人则暗中怂恿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要他们拒绝派代表去王子岛。这样，和会导演的和谈

肥皂剧，尚未上演，就随风而去了。

本来，协约国策划王子岛会议的目的，就是企图利用外交谈判，停止红军的胜利进攻，以便让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和俄国白匪帮争得喘息时机，重新组织和加强对苏俄的武装进攻。

王子岛会议未开成，英、美代表鉴于上述目标落空，且为了表示他们“对和平的诚意”，于是又心生一计，决定组成一个以威·蒲立特为首的特别代表团前往苏俄进行活动，相机行事。蒲立特是出席巴黎和会的美国政府代表团的正式成员和主要情报官。他前往苏俄的任务，是调查俄国内部情况，试探苏维埃政权在俄国的影响和稳固程度，同时也准备同苏俄政府进行直接谈判，强迫布尔什维克接受协约国的一些要求；如谈判不成，也可以为以后的武装干涉赢得时间和寻找借口。

列宁、齐契林和李维诺夫接见了蒲立特。蒲氏向苏俄政府提出协约国的谈判条件：(1) 在各条战线上停战；(2) 原地保留所有事实上存在的政府；(3) 苏俄的通海铁路及港口应遵守国际铁路和其他欧洲港口的现行规则；(4) 保障协约国臣民有自由进入苏俄境内的权利；(5) 全部释赦

双方的政治犯和在协约国方面作战的俄国人(5). 恢复苏俄与外界的贸易关系；(7) 有关俄国对协约国的一切债务问题，应于和约签订后分别讨论；(8) 俟苏俄军队复员，交出或销毁剩余的军火后，协约国军队始撤出俄国。

为了摆脱战争，巩固苏维埃政权，从事社会主义建设，苏俄政府愿意停战议和。但对协约国代表提出的以上条款，要求作一些修改和补充。苏俄政府要求将第二条改为“俄国境内所有事实上存在的政府在其辖区内保持政权，但人民自愿更换政府的情况除外。同时，应当互相保证不使用武力来推翻任何政府。”第八条改为：“一切外国军队应一律撤出俄国。对各个反苏政府的一切军事援助应予停止……。”

通过谈判，苏俄代表与蒲立特在莫斯科签订了一项停战议和的预备性条约。可是，当蒲立特回到巴黎后，威尔逊和劳合—乔治见这个条约对英、美等国不利，竟不予承认。他们不让公布蒲立特的报告，要求“保持条约秘密”，竟说什么“没有委托他（蒲立特）签订任何条约。”但蒲立特声明，他正是根据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的指示，而与苏俄签订预备条约的。这就是向世

人揭示了威尔逊等人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的假和平伎俩。

威尔逊和劳合—乔治等人在对待苏俄的关系上做出这种拙劣的表演，正说明了帝国主义者及其政府的虚伪性。他们同克里孟梭、福煦等人是一丘之貉，同时敌视苏维埃政权，仇恨苏维埃共和国；对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尤登尼奇在俄国的复辟寄予很大的希望。事实上这些帝国主义者在巴黎和会上不仅对苏俄实行外交上的孤立和欺骗方针，而且明目张胆地进行制订封锁和武装干涉苏俄的计划；对苏俄实行经济封锁；派遣俄国战俘支援苏俄境内的白俄军队；利用波兰等国作为进攻苏俄的基地。此外，为了对付苏俄红军，还调动苏俄其他邻国的兵力，有意保存德国东部边境的军事设施和德国东线部队，"责成德国将本国军队留驻俄国领土上"。这在凡尔赛条约的军事条款和后来披露的凡尔赛条约的秘密条款中得到了证明。

可见，巴黎和会不仅是列强的分赃会议，而且是武装干涉苏俄的组织中心和大本营。操纵和会的克里孟梭、威尔逊、劳合—乔治等人就是这一武装干涉的罪魁祸首。正是在和会忙于分

赃之际，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对苏俄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进军。因为协约国帝国主义集团在打败德、奥集团后认为主要的任务是消灭世界布尔什维主义，摧毁它的主要支部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为此，他们准备筑起一道万里长城，像防止瘟疫一样来防止布尔什维主义。但心术不正，难成正果，多行不义必自毙，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后来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终于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人们不禁感慨：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凡尔赛体系将何去何从

协约国所制定的国联盟约，同战败国签订的 5 个和约及其他协定或公约，确立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构成了战后世界的国际关系制度，即所谓“凡尔赛体系”。它暂时调整了帝国主义在西方的关系，形成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新秩序。

凡尔赛体系一建立，就包含着各种矛盾的因素，潜伏着未来冲突的根源，所以它所确立的和平是暂时的、表面的和极不牢固的。当凡尔赛

体系各条约的签字墨迹未干，就已显现出这个体系的初次裂痕和势必崩溃的征兆。

帝国主义列强刚在战场上收拾了德、奥等国并在和会上将它们瓜分完毕，又立即向被压迫和弱小的民族和国家举起了屠刀，张开了它们吃人的血盆大口。

"十四点"的第一点就是主张公开外交，反对搞秘密勾当。但实际上威尔逊从参加和会之始就大搞秘密外交。据兰辛说，在美国代表团内部，威尔逊"同他所选定的工作人员和顾问之间毫不开诚布公"。这个被威尔逊当做"跟班"的国务卿写道："秘密外交、阴谋，只有通过秘密行事才有可能。在巴黎的几乎整个谈判，都被秘密外交所玷污。提交大会的最后条约文本向绝大多数国家代表团保密，简直像是发了疯似的。"在和会内外，威尔逊主张"由五强（美、英、法、日、意）统治世界的一种国际强权专制主义，小国（在和会上）只不过是橡皮图章"。这方面最突出的事例，就是威尔逊在巴黎和会所谓解决山东问题上的表现，背着中国人民与日本搞秘密交易。对中国远谈不上友好的兰辛也不得不承认，威尔逊关于山东问题的整个做法"提供

了秘密外交结果的另一例证”，而“美国舆论几乎一致谴责它，并且斥责对如此明显背离合法的正义原则及国际道义准则负有责任的人”。

和会一开始就产生了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权问题。中国被拖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把大量粮食输送到协约国，并且派遣了17.5万名劳工到法国北部和美索不达米亚，这些华工除担任战地劳役之外，在战局紧急时，还参加过战斗，死亡约2000人。而日本除了从德国手中夺占中国青岛时略有死伤外，整个大战期间，只是派出舰队在印度洋、南非、地中海和澳大利亚一带护航。但是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名额，日本同美、英、法、意一样，都是5名，中国虽然派出代表5人（陆征祥、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祖），但是只准2人同时出席会议，而中国代表出席和会的任务只是“申述他们自己的情况和理由”。中国代表团在巴黎逗留了半年，在讨论山东问题时，只被邀参加了3次，即参加1919年1月27日、28日美、英、法、意、日十人会议两次，4月22日参加美、英、法、意首席代表四人会议一次。美国《纽约论坛报》巴黎和会特派记者加拉格尔报道了威尔逊与中国代

表团之间的一幕滑稽戏，生动地刻划出威尔逊的伪善面目和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的一幅可怜相：1919年1月18日和会开幕时，威尔逊与各国代表依次握手，当他与中国代表陆征祥、王正廷握手时，问王正廷："顾博士（指顾维钧）应该来了，他没有来吗？"王正廷赶忙回答："啊，他来了，他是我们代表团的一员，但是，您看，中国只有两个席位，因此我们只得轮流参加不同的会议。"威尔逊说："好，很好！"

但是，就是这位极力装出一副彬彬有礼、深谙国际交往礼仪面孔的美国总统，在对待他的日本盟友时，却立即换了一副表情。他这种明显的势利使得和会的有些代表也忍俊不禁甚或嗤之以鼻。1919年4月25日，威尔逊在美、英、法、日四国会议上表示："日本领土的很大一部分是贫瘠的，因此它当然需要为它的人口找安身之处。他们已经在朝鲜和满洲找到了一些空间，……它现在在中国寻求更多的地方。"对于威氏这种为虎作伥、明目张胆的强盗逻辑，克里孟梭会后说："我想日本会抱住这点不放来要求它在山东的权利。"当时美国正严格限制日本向美国移民，但是却鼓励日本向中国寻求"生存空

间”。

1919年4月30日，威尔逊、劳合—乔治、克里孟梭举行“三巨头会议”，日本代表被邀出席，而把中国代表拒于门外，最后一次讨论山东问题，决定承认日本的要求，日本则承诺将所谓“政治权”归还中国，但保留经济权。兰辛对这一决定作了一个很有美国幽默风格的评语：这就比如警察拾着一个钱袋，把钱留了下来，而把空钱袋交还失主。姑且不论兰辛是否出于真心，但他总还为“当时曾参与劫取中国的合法权利而感到羞愧”。而威尔逊却对他的密友贝克说：“这是从肮脏的过去中所得到的最好的解决办法。”并认为他的“唯一希望是要保持世界在一起，使日本人参加到国际联盟之中，然后再设法使中国获得正义，这不仅是对日本而言，英国、法国、俄国它们在中国也都有租界地”。这就是“威尔逊主义”的奇妙逻辑：反正已经有了几个抢劫者闯进中国了，再多进去一个也不妨！

威尔逊对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态度，成了他自己给他津津乐道的“民族自决”所加的最好的注脚。兰辛在1918年12月30日的一个秘密备忘录中指出，威尔逊鼓吹的所谓“民族自决”是

"无法实现的希望。……它将牺牲数以千计的生命。到头来不能不弄得声名狼藉"。这在一系列问题上得到了证实。

关于菲律宾问题。这个被美国奴役了近半个世纪的国家，威尔逊在他的任内，作过无数次使菲律宾独立的诺言。在巴黎和会期间，菲律宾的一些对威尔逊存有幻想的人，把独立希望寄托在他的"民族自决"的宣言上，可是1919年2月5日巴黎和会讨论国际联盟会员国问题时，威尔逊出于维护美国糖业资本家的利益和不让这个美国在太平洋的重要基地落入日本手中的双重动机，竟声称菲律宾人民满足于它的美国殖民地地位，他坚决反对菲律宾作为一个国家获得国际联盟会员国的身分。他竟胡说什么菲律宾不过是"一些杂七杂八的小团体的居住地，而没有形成一个社会共同体。"

威尔逊对朝鲜人民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奴役的民族独立运动，同样采取了讨好日本的立场。1919年3月1日朝鲜爆发了伟大的"三·一"人民起义，历时数月之久，矛头直指日本的殖民统治，要求获得独立。美国国务院奉威尔逊之命，在1919年4月14日指示美国驻汉城总

理事莫里斯："应该避免作任何可能引起日本当局怀疑美国政府同情朝鲜民族运动的事情"。在巴黎和会期间，朝鲜的一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也抱着威尔逊将帮助朝鲜获得"独立"的幻想，要求在巴黎和会中讨论朝鲜问题。威尔逊根本拒绝考虑。这些人恳求出席巴黎和会进行申诉，也被威尔逊飨以闭门羹。1919年3月4日威尔逊指示美国国务院："朝鲜的兼并不是起因于战争。和会听取朝鲜的申诉是不可能的。在巴黎陈述关于朝鲜问题的意见……会引起其他的麻烦。"参加巴黎和会的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威利公开宣称：巴黎和会不应接受朝鲜代表，因为"美国已承认朝鲜的兼并"。

就在威尔逊支持和维护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的殖民统治的时候，埃及又爆发了民族独立革命运动的消息传到巴黎。威尔逊、豪斯、兰辛赶忙商议，决定由美国正式发表声明，承认英国"保护国"的地位，作为"美国采取的帮助稳定局势的行动"。1919年4月22日，威尔逊正式宣布承认埃及为英国的"被保护国"。

美、英、法在讨论瓜分土耳其帝国时，英、法建议美国接受对阿尔明尼亚和君士坦丁堡的

委任统治权，甚至愿意给予黑海海峡地区的委任统治权，以换取美国支持英、法在其他问题上的要求。威尔逊表示欣然接受。可是后来美国又放弃了这个打算。在威尔逊看来，美国拥有工业、金融、航运上的优势，在未来的国际联合机构中能够居于支配地位的，也只有美国。威尔逊早在 1917 年 7 月 21 日就曾经向豪斯透露了他摆弄英、法的设想："等战争结束后，我们可以迫使他们按照我们的方式考虑问题。因为那时，别的不说，财政就要依仗我们。"既然如此，与其接受一定的委任统治来直接面对被统治地民族解放斗争的锋芒，不如在门户开放、商业自由的原则下"均沾"全世界各殖民地的商业利益和原料供应更合算些。1917 年威尔逊与兰辛交换备忘录，威尔逊明确表示他的战后国际新秩序蓝图的两个基本要素，就是"商业自由和国际性门户开放。"正因为如此，劳合—乔治、克里孟梭这些老谋深算的代表人物，对威尔逊的"十四点"就始终保持嘲笑而又警惕的态度了。

克里孟梭讥讽说："上帝满足于十诫，威尔逊这位仁兄却给了我们十四点。"

劳合—乔治挖苦地说："这位充满理想主义

的总统，真把自己看做是一个传教士，他的任务是拯救欧洲困苦的异教徒……”

一个对劳合—乔治玩弄手腕、斤斤计较的特点深有了解的英国议员风趣地说：“威尔逊总统最糟糕的是他说起来像耶稣，行动起来像劳合—乔治。”

话虽尖刻了一点，倒也一下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美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虽然已经插手于国际事务中，但主要的路数是控制西半球，挤进远东，在欧洲维持均势。像西奥多·罗斯福这样一个力主手持大棒的“国际警察论”者，除了在西半球挥舞大棒之外，在世界其他地区却还暂时只能以“调停者”的身份出现。而威尔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立场，特别是通过他的“十四点”，明白无误地显示出要使美国担任世界范围的“国际警察”角色的勃勃雄心。

威尔逊毕竟是一个法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到底与那些只会砍杀的盘马弯弓之徒不同，他不是要把“世界新秩序”拉回旧殖民主义轨道，而是要纳入他精心设计的国际联盟体制中。威尔逊认为，“只要美国选择通过国际联盟尽它的一份力量来保持它在道义上和金融上

的世界领导权，支持一个经济上稳定和非革命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美国将来的商业扩张就可以确保无虑。”因此，他在巴黎和会里遵循的一条原则就是：只要把国际联盟计划作为凡尔赛和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要让美国在国际联盟中居于领导地位，其他一切都可以让步。

克里孟梭、劳合—乔治等人就利用了威尔逊的这一点，把他“当做傀儡戏弄”，使他“成了一个十足的傻瓜”。什么“公开外交”，什么“民族自决”，什么“公正的和平”，在这些老牌帝国主义者眼里都不过是笑柄和欺世盗名之谈。他们逼得威尔逊当众自打耳光，硬让他自己剥去一件又一件漂亮的“民主”、“自由”外衣。“你不是要国际联盟吗？”克里孟梭板着面孔说，“那先要满足我的合理的领土要求。”威尔逊只得点头认可。劳合—乔治又笑嘻嘻地说：“关于海上自由这一条，我们是有保留的，现在要我们支持国联，又要我支持把门罗主义的保留列入盟约，那你看这个海上自由……”威尔逊在1918年12月21日对《泰晤士报》记者的谈话只好承认，“基于英国的地理位置的事实和由于它的历史传统，在一切海军问题上，必须承认它享有特

殊利益”。日本的代表牧野又气势汹汹地喊叫：“如果不满足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一切利益，日本决不在和约上签字。”威尔逊又慨然满足了日本的要求。威尔逊为了替自己辩解，1919年4月3日他在给白宫秘书图马尔蒂的电报中称：“日本只不过是得到了一些经济上的特许权，如像其他强国那样。（日中）两国今后的关系，将由国际联盟来促证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威尔逊的这一谬论，甚至连当时美国驻北京公使芮恩施也认为，这是一个“主要错误观点”。芮恩施说：“由一个外国政府拥有一个头等港口直达中国心脏的铁路干线的所有权，是不能确切地称之为经济权利的。”

在签定凡尔赛条约时，威尔逊似乎是世界上最伟大仁慈的政治家，他没有要任何赔款和领土，只是要了一个国际俱乐部性质的国联。但是，威尔逊是要通过国际联盟使美国跨出西半球，越过大西洋，越过太平洋。用他自己的话说：“舞台已揭幕，命运已揭晓，它不是按照我们所设想的计划而演出的，而是由引导我们上帝亲手安排的。我们不能后退了。我们只能高瞻远瞩，振作精神，奋勇前进。”

大战时期的德国外交大臣齐默门咬牙切齿地诅咒，“威尔逊是一个伪君子，凡尔赛和约是历史上最卑鄙下贱的罪恶”。

比利时出席和会的代表曼斯也怒斥大国把持国际联盟理事会的做法，是“反动的神圣同盟的复活”。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那种19世纪末帝国主义者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时的纵横天下、畅通无阻的时代早已过去了，在十月革命的炮声中迎来的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时代，各国人民将斗争矛头直指帝国主义者和凡尔赛体系。因而，凡尔赛体系刚一建立，就处处受到冲击，暴露出瓦解的征兆。“……帝国主义国家对土耳其的掠夺已经引起土耳其的反抗，由于这种反抗，迫使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收回自己的魔掌。”1919年初土耳其爆发的民族解放革命，导致1922年秋废除苏丹制度，成立土耳其共和国。1923年7月24日，协约各国在瑞士洛桑被迫承认《色佛尔条约》无效，并同土耳其签订了新的标志土耳其独立的洛桑和约。在中国，由于反对《凡尔赛条约》而爆发了“五四运动”，中国代表

在人民的压力下拒绝了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这无异是对帝国主义的赤裸裸的掠夺和约的一记响亮的耳光。苏维埃俄国人民面对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而拿起武器，公开以暴抗暴，并击退了一切反动势力，解放了大片国土，这更是对凡尔赛条约的最直接、最沉重的打击。

凡尔赛条约极大地削弱了德国的外交地位，德国本身被排挤在大国之外。德国人民担负着沉重的莱茵河地带协约国占领军的供养费和天文数字般的战争赔款。所有这一切，加之战后德国经济衰落和政治动荡，都影响到国内整个思想气氛，这对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们燃起极端沙文主义、复仇主义情绪和进行军国主义的宣传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时机。德国垄断资产阶级虽然被迫在和约上签字画押，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德国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和约条件。随着力量的恢复和增长，德国必然会从要求修改和约到不履行和约、直至撕毁和约、冲破凡尔赛条约的束缚，挑起另一次世界大战，以求改变自身的处境。早在大战结束前夕，威尔逊就预感到这种危险，他断言："和平的条件不能永久地栖身于苦痛、憎恨和残酷的回忆之上，因为后者好像

流沙一样。”劳合—乔治在巴黎和会期间作了同样的预言，他说：“历史证明，一项作为外交技巧和政治家手腕的成就而受到胜利国欢呼的和约，即使从长远后果看来是适度而有节制的，也必将被证明是目光短浅的，并且对胜利者来说，也是充满危险的。”福煦将军更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是和平，这是20年的休战。”

事实上，和会刚一结束，德国复仇主义者就喊出了“打倒凡尔赛条约”的口号，大肆煽动对战胜国（特别是法国）的愤恨，使复仇主义的情绪在德国迅速滋长和蔓延开来。以斯丁涅斯为首的德国垄断资本家和鲁登道夫等军国主义分子相勾结，策划反对履行和约的运动，首先公开要求德国政府拒绝履行赔款义务。这就导致了1923年鲁尔事件的发生，给10万名法、比军队武装占领德国工业区鲁尔找到了借口。为了抗议法、比的占领行动，德国资产阶级起初采取了“消极抵抗”政策，声明在鲁尔未收复以前，德国政府不会同法国控制的赔款委员会进行谈判；同时德国的煤业辛迪加拒绝将鲁尔的煤作为赔款运往法国。

鲁尔事件是德国公开反对凡尔赛条约而吹

响的第一声号角，显示了它必将东山再起的苗头。几年之后，德国同英、法、意等国平起平坐，参加了 1925 年 10 月在瑞士举行的洛迦诺会议。在会上，德国代表以退为进，表面上恭顺地表示遵守凡尔赛和约关于莱茵区非军事化的规定，同意“维持法德边界、比德边界的领土现状”，以此换取了英、法、意、比等国对德国加入国联的同意。接着，并让德国担任国联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使德国在事实上重又挤身于欧洲强国之列。这样，在这次会议以后，德国在欧洲问题上和世界事务中取得了发言权，又走上了争霸欧洲的道路。因此，罗迦诺会议是凡尔赛和约开始破产的象征。这正如列宁所预见的那样：“德国战败了，受到凡尔赛条约的压制，但是它拥有极大的经济潜力。……它不能忍受凡尔赛条约，德国本身是个帝国主义国家，同时又是一个被征服了的国家，所以它必然寻找同盟者来反对全世界的帝国主义。”

同时，在巴黎和会上，英、法等国出于反苏俄的阴险用心，在一定程度上又呵护德国，特别是在军事条款方面。以后，英、法为了利用德国作为防止所谓来自苏联“共产主义瘟疫”威胁的

“西方文明棱堡”，在它们的默许下，军国主义在德国死灰复燃，凡尔赛条约的许多军事条款都秘密地或公开地被毁弃。同时，德国资产阶级慑于国内人民民主、革命的要求，遂于1933年1月30日将法西斯党推上台，在国内建立起“……金融资本最反动的、极端沙文主义的和极端帝国主义分子的公开的恐怖专制”。德国重新成了世界大战的纵火犯，在希特勒“要大炮不要黄油”的狂妄叫嚣中，德国挥剑最后斩断早已锈迹斑斑的凡尔赛条约的锁链，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凡尔赛条约》虽然暂时地调整了战胜国之间的关系，但无法消除它们之间的根本矛盾，战胜国美、英、法、日、意等国因分赃不均而开始了新的争夺。

英、法之间为争夺欧洲霸权，为争夺非洲、近东和中东的势力范围，继续进行激烈的斗争。1921年，英国外交大臣寇松愤忿不平地说：“不管是在西里西亚，或巴伐利亚，或巴尔干—摩洛哥，或埃及，或土耳其，或美索不达米亚，法国代表正积极地追求一种有损于英国利益的政策。”英、法之间在宰割德国和赔款分配问题上，

矛盾也很尖锐。它们在处理战后问题的各种机构中，各怀鬼胎、明争暗斗。

意大利的分赃欲望在巴黎和会上受到抑制，在地中海沿岸和巴尔干地区均被英、法排挤，因而耿耿于怀，对英、法很不满。意大利统治集团感到它在同德国及其过去的盟国签订一系列和约时所获甚少，觉得自己是劳而无功，被他人当枪使了，因而装出一副受了莫大委屈的样子，在战后不久即加强实力，整军备战，准备在将来用武力夺回它在谈判桌上未曾得到的东西。

美、英、日之间在远东的矛盾尤为突出。在巴黎和会上，威尔逊采取迂回手法，试图通过国联，建立美国的世界霸权。为此他不惜对欧洲列强和日本的要求妥协让步。结果，《凡尔赛和约》维持了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确立了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巩固了日本在中国和南太平洋的优势，而美国自己却未捞到多少实惠。并且，在战败国的殖民地和赔款的瓜分中，美国也是两手空空、一无所得。更令人气恼的是，美国既未能做到保存一个强大的德国来推行其欧洲政策和抗衡英、法的势力，威尔逊为之奋斗的国

际联盟最终也成了英、法维持既得霸权利益的工具。可以说，美国是巴黎和会上最大的失败者，它纯粹是瞎忙一场，为他人作嫁衣和火中取栗。这就引起了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吵。孤立主义者借口《凡尔赛条约》没有体现美国的战略目标，对威尔逊进行猛烈攻击。因此，尽管威尔逊在《凡尔赛条约》上签了字，并且是国际联盟的首创者，美国参议院却拒绝批准和约及参加国联，拒绝批准威尔逊代表美国与英、法缔结的三国互相保证条约。美国由积极参与、上窜下跳到愤然置身于凡尔赛体系之外，这本身即是这个体系出现大裂缝的凶兆之一。美国不甘心于巴黎和会上的失利。此后，它在欧洲大力扶持德国，不止一次地向德国提供巨额贷款。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德国恢复了军事经济潜力，从而在欧洲大陆出现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此外，它将主攻方向移向亚洲，与日本在太平洋地区和远东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夺，这是形成新的世界大战第二个危险策源地的原因之一。

由此可见，凡尔赛体系的建立并不能确保世界和平，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以分赃不均为诱因而出现不同表现形式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必然

要导致重新瓜分世界的新战争。而新的大战将会使更多的国家脱离资本主义体系。因此列宁指出："凡尔赛和约不过是高唱凯歌的帝国主义者的表面胜利，实质上它意味着整个帝国主义世界的崩溃。"

第二章　列强构建了“新秩序”

巨头们将他们的眼睛紧盯在欧洲和战败国身上并为此作了精密的谋划处置。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

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和会上本来想解决整个世界的再分割问题，但和会签订的《凡尔赛条约》及附后的一系列和约，涉及的主要是欧洲以及德国和土耳其殖民地的分割问题，因此，它基本上是欧洲问题的解决方案。和会使英、法、日所获甚丰，但却冷落了一个重要伙伴美国，特别是和会的决议没有反映出美国通过大发战争财而形成的经济大亨的地位，没有满足美国的扩张利益和要求。

本来，在这以前的世界事务，特别是关于殖

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占领与瓜分中，美国因姗姗来迟而未吃到什么主菜，只分到了一些残羹冷肴。但那时美国因自身羽翼未丰，因而只能忍让为怀，打一些擦边球，曲线救国。但一战后，美国的处境则是鸟枪换炮，今非昔比了。

战后的美国，就经济实力来说，是世界上最强的资本主义国家。1920 年，美国的石油生产占世界的 66%，铜占 60%，汽车生产占 85%。1922 年，英、法、意三国欠美国 160 多亿美元的债务。美国的商船吨位，由战前的 106 万多吨猛增到 1919 年的 1157 万多吨，在世界贸易的主要航线上，悬挂星条旗的船只穿梭来往，格外醒目。因而，美国的扩张吹鼓手公开宣称："在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必然要取代英国在拿破仑战争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那个位置。"

钱包鼓起来了，肚皮挺起来了，财大气粗的山姆大叔岂肯再甘心在巴黎和会上被人耍弄、一无所获的地位？于是，美国马上就做出了要改变巴黎和会的结果，特别是要修改《凡尔赛条约》关于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一些不利于美国的条款的姿态。1919 年 11 月 15 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对凡约的"十大保留案"，公开声明，美

国不承认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的有关条款，并且对由此引起的中日争端，美国"有完全自由行动权。"它对和约决定把赤道以北的原德属岛屿交给日本也十分不满，因为这损害了作为主要战胜国的美国的利益。美国认为，它力图要改变这种状况，在新的实力对比的基础上，建立各强国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新均势。说得明白一点，即建立美国在这一地区的霸权。

一战后，帝国主义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实力对比，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巴黎和会虽然也涉及到了这一地区的问题，但毕竟是蜻蜓点水、隔靴搔痒，未来得及给予全面的调整和解决。加之战后美国既受挫于欧洲而将战略重心移向亚太，更使该地区的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和紧张。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进行角逐的主要是英、俄、日、美、法、德六6国。大战结束后，德国战败，丧失了在亚太地区的所有据点。而俄国在十月革命后，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不再参与任何侵略活动。法国则因实力削弱而忙于巩固其在欧洲大陆的优势。

这样，关于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霸权争夺，主要就在英、美、日3国之间展开。就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范围来说，英国是美国的主要对手，美国争夺的直接目标是英国的自治领。而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日本则是美国的主要竞争者。所以，美、英矛盾和美、日竞争成了战后一段时间内资本主义世界两对重要矛盾。美英矛盾主要表现在争夺海上霸权和抢占销售市场、投资场所等方面。美日竞争主要反映在争夺太平洋的霸权和争夺中国这块肥肉的斗争上。

大战期间，日本乘西方大国忙于在欧洲火并而无暇东顾的时机，加紧侵略中国，在华势力骤长。《凡尔赛条约》的签订进一步加强了日本在远东的地位，它的帝国主义野心越发膨胀，妄想实行"东亚门罗主义"，独占中国。这一企图使得美国惶惶不安，英国也感到了威胁。一战结束时，日本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处于领先地位，英国被排挤到第二位，美国居第三位。这更是英、美所不能容忍和坐视的。

为了对抗日本，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奴役中国，早在1918年6月，美国就提出了由美、英、法、日4国组成新的国际银行团的方案。它规

定，所有给予中国的各种贷款均由银行团垄断，并由银行团控制贷款的使用。美国企图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通过银行团把大量资本输入中国，以达到控制中国经济的目的。由于北洋政府慑于中国人民正在蓬勃开展的反帝运动，以及当时已成为中国第一债权国的日本的阻挠，关于四国银行团的计划便胎死腹中了。但美国并不罢休，终于在1920年10月15日成立了由它策划的国际新银行团，达到了前述目的。日本为了排斥西方列强和掩饰它对中国的侵略扩张，公然提出了"亚洲门罗主义"口号，其主要矛头显然是指向美国的。这样，美国的远东扩张政策与日本对中国的独占政策发生了激烈冲突。美、日矛盾的发展使得两国竟然公开谈论起军事冲突的可能性。1921年，日本出版了《如果日本与美国发生战争》一书，作者海军上将佐藤写道："我们帝国无论就地理方面和历史方面来说，都有一切手段在大陆上求得发展的使命。这完全不是侵略。假如它在大陆上的发展遇到困难，则它的生存本身就要受到威胁。像盆里的植物一样，帝国也只有当它的根延伸到大陆上的时候才能够继续生存和生长，它离开了大陆就

必然会死亡。可是美国却残忍地企图砍掉这些根，并企图取日本而代之并在东亚大陆上推行自己的帝国主义。”日、美两国日益尖锐的利益冲突和战争宣传，在远东造成了紧张的局势。列宁指出：“近几十年来（美、日）两个国家经济发展，积下了无数易燃物，因此这两个大国必然会为太平洋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而展开激烈的搏斗。远东的全部外交史和经济史使人毫不怀疑地相信，在资本主义基础之上，要防止美日之间日益尖锐的冲突是不可能的。”

同时，美国对英国在华的种种权益也垂涎三尺。因此，美国要求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与英、日相抗衡，夺取中国的金融和商品市场。

尽管美国对英、日怀恨在心，怒目相向，但它却不敢明火执仗地与两国放手一搏，因为英、日同盟的存在使美国总是感到如芒在背、投鼠忌器。英、日同盟是1902年1月30日缔结的，目的是联合抑制俄国在远东的扩张。1905年8月12日和1911年7月13日又两次续订。在续订中，又把德国纳入两国共同反对的目标之列。1921年7月12日续订条约期满。这时，俄国发

生革命已近4年，德国战败已近3年，作为英、日同盟昔日的对手无疑已不复存在了。然而，对废除同盟，英、日两国却迟迟疑疑，拖拖拉拉，最后竟作出延长有效期一年的决定。20年来，英、日同盟“一直是日本对（亚洲）大陆进行扩张的国际支柱”。当初，它主要是为了对付俄国及德国在远东的挑战，并在1911年第三次续订时规定，它的矛头不能指向美国。然而，战后情况就不同了，英、日这时的态度本身就已说明了它们心怀叵测和对美国不怀善意。对美国来说，英、日同盟的继续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隐患，直接威胁到了它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利益，因为一旦发生美、日冲突或美、英冲突，美国无疑会处于一比二的不利地位。美国有影响的参议员洛奇说：“在我看来，英、日同盟在我们与远东和太平洋的关系中是一个最危险的因素。它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加拿大也引起了日益增长的不安。另一方面，它正在支持日本的战争精神，支持日本在陆上和海上对新冲突的准备。”因此，拆散英、日同盟便成为美国远东外交的一个重要目标，美国必欲去之而后快。

“要对付铁甲舰的攻击，就必须拥有铁甲舰”

争夺海上霸权是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的重要方面。海上霸权对远东和太平洋这一水域广阔的地区来说，更是头等的决定因素。在德国的海军力量已被消灭，列强的海上竞争已从大西洋转到太平洋的情况下，谁拥有太平洋的制海权，谁就会在争霸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因此，战后不久，美、英、日即展开了疯狂的扩充海军的竞赛。各大国所拟订的发展海军的计划，超过了1907～1914年期间英、德竞赛时期所采取的一切措施。三个海上强国已在建造的或计划建造的新的超级无畏舰不下36艘。

战前，美国海军势力落后于英、日。1918年12月，威尔逊向国会提出拨款6亿美元以扩充海军的计划。英、日两国闻讯，极为不安。1919年4月，在巴黎和会之外展开了一场英、美两国的谈判，即所谓“巴黎的海战”。英国试图迫使美国放弃新的海军建设计划。美国最初拒绝协商，而且要求英国放弃其独占海上的统治，建立

英、美两国在海上的联合统治，即“必须使美国拥有和英国同样数量的海军”。英国表示，英国拥有强大的海军是其作为海上强国的“特殊需要”，不能容许试图把英国海军挤到第二位去的美国新的海军计划实现。英国并威胁说，如果美国一意孤行，英国将不支持美国在莱茵问题上和萨尔问题上对法国的让步。当时美国海军舰只的总吨位只有146.8万吨，而英国却有230.9万吨，日本也有82万吨。从表面上看英国海军仍是海上霸王，然而由于大战期间英国海军执行繁重的任务，大部分舰艇已经老化，战列舰中还包括老式的铁甲舰。而美国的扩军计划表明它最终要建成两支拥有16艘4万吨级的新式战列舰的大舰队。这样美国所拥有的无畏号级战列舰，将可以和英国相匹敌，并且在太平洋上也有了一支威慑英国的盟国日本的主力舰队。当时，为了实现与法国的交易，威尔逊被迫做了相应的许诺。

美国既被迫做出让步，又未能使英国承认英、美在海上的联合统治，岂肯就此罢休。于是仅过了3个月，即1919年7月，美国国会批准了1916年8月29日通过的扩充海军的计划

(该计划曾因美国参战未能实行)，预计到1925～1926年，美国将建造10艘战列舰、6艘巡洋舰和50艘驱逐舰。此外，海军部在1919年12月又提出一个一年造舰计划，要求建造2艘战列舰，1艘战斗巡洋舰和一些较小舰只。这一计划的实现，将使美国控制大西洋和西太平洋。由于国会拒绝，海军部于第二年转而积极推进一个新的三年计划，而海军部建造像英国那样庞大而强有力的舰队的计划，又得到了美国舆论界的相当支持。

日本由于与英、美两国在军舰吨位数额上差距很大，更是雄心勃勃，大有奋起直追、后来居上的趋势。日、俄战争以后即已提出的"八八舰队计划"在1920年7月终于获得通过，依照此项计划，先建成两个分舰队，而后再建三个分舰队，每个分舰队有8艘铁甲舰，这些铁甲舰每8年更新一次。1921年日本在建造的与计划建造的军舰有：主力舰7艘，一级巡洋舰8艘，二级巡洋舰16艘，炮舰5艘，驱逐舰45艘和潜水艇65艘。到1928年，日本将建造8艘与美国新战列舰不相上下的战列舰和8艘新式巡洋舰。1921～1922年日本财政年度的海军拨款占全部

国家预算的1/3。

美国海军毫无节制的高速发展，吓坏了英国的首脑人物，因为自从19世纪90年代德国开始向海上霸主挑战以来，还没有发生过使英国担心的其它重大事件。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曾宣称："英国将花掉最后一个金币以使其海军优于美国或任何其它国家。"1919年，英国在建造中的军舰有：主力艘10艘，重级巡洋舰6艘，轻巡洋舰10艘，驱逐舰17艘，潜水艇39艘。英国每年海军建设的预算额达1.4亿英镑。

1920年，英国得知美国国会批准了1916年的海军计划，并鉴于日本的大规模海军建设，英国统治集团更是忧惧如焚。英国当时虽拥有最强的海军舰队，但英国的经济和财政状况使得要建造新的军舰异常困难。但英、美矛盾的尖锐和英、日冲突的潜在可能，又迫使拥有比美、日两国军舰更旧的军舰的英国不得不加入"竞赛"。这意味着不列颠帝国准备竭尽全力来保持其海上霸权。邱吉尔在反映这一集团的意见时说道："世界上无论什么东西，无论什么见解，无论什么论据和劝说，不管它们是多么动人，都不应迫使我们放弃我国所赖以生存的海上霸权"。

因此，英国政府决定着手建造4艘主力舰，这几艘军舰定于1924年内完成，其中每艘军舰价值达700万英镑。1921年英国议会通过决议，除已建造的10艘战列舰外，再增加4艘，此外还建造10艘巡洋舰和30多艘潜水艇。当年，英国的海军预算达8344.4万英镑。

法国和意大利两国虽不像以上三国那样搞得满天风雨、气势汹汹，但也倾其全力，投入了这场不见尽头的海军冒险行动。

恩格斯有一句军事上的至理名言："没有什么更像军队和舰队那样依赖于现代经济。"竞赛刚刚开始，各国就遇到了难题，它们不得不谋求暂时的妥协。

英国在大战中已耗尽了财力，背上了外债，无力制造替补业已老化的战舰。英国要是再同财大气粗的美国竞赛，无疑是自不量力，很可能使本已原气大伤的经济出现灾难性的后果。以滑头政客著称的劳合—乔治，虽然表面上不甘示弱，说出了大话，但对自己的家底还是心中有数的。他在帝国国防委员会会议上就海军军备竞赛的问题警告将军们说："我们要对付的可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因此，除非绝对必要并

有最令人信服的力量，否则不会有哪个英国政治家会把祖国投入一场可能是灾难性的竞争。”殖民大臣温斯顿·邱吉尔认为，必须把同日本的联盟牺牲掉，以换取美国的让步，他说：“如果把我们的海上政策建立在同日本联合起来反对美国的基础上，那么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加糟糕的政策了。”劳合—乔治和其他一些国防委员担心放弃英、日同盟，则英国将被视为一个轻信寡诺的国家并会引起日本的敌视，而且一旦有事，英国在太平洋上又不得不依赖美国海军的支援，这也是一种失败的下下之策。英国首脑人物最后不得不面临困难的抉择：是继续保持英、日同盟，与美国展开无望的、灾难性的海军竞赛，还是牺牲英、日同盟而与美国妥协？

日本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小民贫，实力还远不及英、美。日本耗资巨大的造舰计划，使军费骤增。1921～1922 年间，日本海军拨款占其全部国家预算的 1/3，日本如果执行它的计划，那就意味着到 1927 年日本每年海军建设的费用就要达 4 亿美元。在巴黎和会上，日本虽暂时保住了战时攫取到的利益，但它的顽固态度也使其处境孤立。中国人民反日斗争的日益高涨，

更使日本感到头痛。

战后，日本国内的民主运动也日益高张，政党内阁中出现了所谓“自由派”的内田、币原外交。这一派虽然在对外扩张的基本方针上与过去的外交没有什么不同，但在策略和手法上主张通过谈判和协商来达到目的。

但与其它国家比起来，日本虽软件不足，但硬件却优越——日本拥有一连串的太平洋上的海军基地——南自台湾起，经琉球群岛和日本本土，至北方的南库页岛为止。此外，日本还拥有一条完整的海防前哨基地——分布在日本南部和东南部的马里亚纳群岛、马绍尔群岛和加罗林群岛，因为日本获得了对这些岛屿的委任统治权。这就为日本在太平洋西部造成了相当稳固的战略地位。日本的优势还在于，日本能在发生战争时集中它的全部舰队于其主要基地的附近地区。

美国的政治人物不能不考虑到这一切情况，尽管有人在谈论对日军事冲突的不可避免，但他们知道，美国对作战还没有准备好。统治阶级中有一部分人也反对在新的海军建设上花费过多的钱，因为美国为了执行1916年的计划，

也需要有15亿美元的追加额，这个数目超过了德国在1898～1914年期间的海军建设费用，包括基尔运河的工程费在内。同时有人担心：既成的局势将引起对日关系极度恶化，而且如果海军军备竞赛不停止，战争就要在对美国不利的情况下爆发。

1921年，美国海军情报局侦知，日本和英国正在建造的某些军舰，其吨位超过美国所建造的军舰。

美国从前认为，它正在建造的6艘主力舰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主力舰，可是现在知道，日本在建造8艘吨位更大的主力舰，而英国在1921年3月也决定建造4艘威力不亚于日本的主力舰。当然，美国拥有比英、日两国大得多的财政能力来继续进行海军竞争，但这需要时间。此外，美国还受巴拿马运河通过能力最高额的限制，因为3.5万吨以上的船只不能通过该运河。美国即使有比这大的巨型战舰，一旦太平洋有事，却不得不绕过南美洲而行，等到它赶到战场，说不定早就大局已定而成了马后炮了。

还有令各国统治者头痛的是，战后美、日、英几国人民的反战情绪日益增长，舆论反对毫

无意义的军备竞赛。美国人最为群情激愤。统治者虽可暗中翻云覆雨，玩弄民意于股掌，但在表面上却还不得不装出一副惟民意是从的样子。美国国会中旧日的反备战集团在停战后复活，并在1920～1921年冬天结合成为争取召开国际裁减海军会议的强大运动。参议院在1921年5月25日、众议院在6月29日以压倒多数通过了爱荷华州国会参议员威廉·E·博拉提出的决议案，要求政府开始同英、日举行促进裁军的谈判。

当时，同美国缔结海军协议，成为英国外交部主要奋斗目标之一。虽然英国一如既往，渴望保持海军优势，但同美国从事军备竞赛的前景，却使英王陛下政府要考虑代价。由于深信耗费过高，英国外交部通知美国国务院说：如果华盛顿政府不对裁军首先采取行动，英国将带头。同一天，也就是1921年7月8日，该通知到达华盛顿，美国总统哈定和国务卿都认为：再不能不采取行动。在初步建议得到友好反应以后，为了争取主动，休斯于8月11日对英国、日本、中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葡萄牙（这些国家都在远东有利害关系）发出正式邀请，准

备于1921年11月在华盛顿举行一次会议来讨论限制海军军备和远东及太平洋问题。

唯一与上次会议不同的一点即在于它们将中国视为了公共财产并在空前的“友好合作”中将之“共了产”

对于美国的倡议，英国表示支持。因为它在远东和太平洋虽然与美国有着尖锐的矛盾，但又对日本的步步进逼感到不满；同时，尽管它不愿因废除英、日同盟而与日本闹僵，但对更加强大的美国，英国更是惹不起，因而它也不愿因英日同盟的存在而开罪于美国，更不愿在可能发生的日、美交战中使自己受到连累。此外，限制军备固然是美国引人上钩的一种手段，但它对于经济困难而又想维持海上霸权的英国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在英、美进行了秘密接洽后，1921年7月10日，美国国务卿休斯向英、日、法、意、中5国大使建议在华盛顿召开会议，讨论限制军备问题及远东与太平洋问题。美国之所以邀请这几个国家参加是有它的考虑的：英、日特别是日本是美国在远东的主要竞争者，

因此是重要的当事者，必须到会；中国在山东等问题上同日本有争论，可以利用中国问题压日本；法国在远东有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战后它的外交政策与英国常相冲突，可以在会上利用法国牵制英国；意大利是五强之一，虽在远东无特别利益，但可起某种缓和平衡作用。对于美国的邀请，英、法、意、中很快做出了肯定的答复，唯独日本例外。当美国的建议送达东京后，日本政府怀疑英、美事先已经达成谅解，它担心被当做“被告”在会上“受人裁判”，怕失去从巴黎和会上分到手的赃物，尤其是在华利益。然而，日本此时却真正面临赶鸭子上架的窘境，根本没有拒绝的余地，因为美国是冠冕堂皇地打着“维护世界和平”的招牌而邀请它的，日本如果公开拒绝参加，则会在世界舆论面前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禁忌，外交上就会被孤立而成为孤家寡人。还有，虎视眈眈的美国说不定正可借此找它的麻烦而使日本哑巴吃黄连，有苦无处说，有冤无法伸。经过几次内阁会议的反复策划，日本政府提出了出席会议的条件：“限制军备问题仍为此项会议之主题，太平洋及远东问题之讨论不过求一主张及政策上共同了解而已，”“凡

问题之关于任何特殊国家者，或已成为既定事实者，当审慎免除其加入。”这就是说，对于太平洋及远东问题的讨论，只能限于一般原则性辩论，而像“二十一条”及日本在山东的权益问题则属于“既定事实”，不应列入会议讨论之议题中。对此，美国毫不买帐，做出明确答复说，会议不“划定范围”，可以“自由讨论”。

美国最初邀请参加会议的只有英、日、中、法、意5国．后来，荷兰、葡萄牙和比利时或因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有属地，或因与中国有经济关系，也要求参加会议。这样，到1921年11月12日华盛顿会议召开时，参加会议的就有9个国家。按照凡尔赛条约的规定，德国在太平洋的殖民地已被剥夺，因而尽管它仍不失为一个三流大国，但没有被邀请。苏维埃俄国尽管在远东举足轻重，但因尚未得到美国的承认，并且帝国主义列强希望缓和，哪怕是暂时地缓和它们之间的尖锐矛盾，以便建立反对苏俄和反对中国人民的统一战线。考虑到苏俄如出席会议，对他们来说，不但碍手碍脚，而且在面子上也将出现难堪局面，因而苏俄自然便被拒于会议之外了。

华盛顿会议的正式议程是：(1)限制军备问题；(2)远东及太平洋问题。根据会议议程，大会的组织机构，除了由九国组成的代表大会以外，还设立了两个委员会：一是“限制军备问题总委员会”，由美、英、法、意、日5个海军大国的代表组成，二是“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委员会”，由出席会议的九国代表参加。真正的工作是由这两个委员会及其小组委员会在秘密会议中进行和完成的。公开举行的全体会议，只听取正式报告，批准委员会的决议，而不进行公开的辩论。操纵会议的是美、英、日三国，一切重大问题都是由美国国务卿休斯、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和日本海相加藤友三郎“三巨头”在幕后交易决定的，公开大会只是走走形式而已。会议从1921年11月12日开幕到1922年2月6日结束，历时85天。会议本身批准并通过了7项条约和12项决议案，另有2项条约是在会议期间由与会国在会外商定的。

华盛顿会议故意开得热闹异常，每次会议都公开进行，代表们的发言立即见报。资产阶级报刊更大言不惭、不遗余力地宣告：从此不会再有秘密外交了，全世界都殷切地把希望寄托在

这次给人民解除军备重担的会议上。

参加会议的美国代表团由国务卿休斯率领，他当选为大会主席。

英国代表团团长是贝尔福。英国的自治领和印度均有单独的代表权。因此，参加大会的国家在实际上是14个。

法国代表团由总理白里安率领。在中心席位上，不知为什么没有给白里安准备座位，所有的座位都被英、美的代表占了，法国总理不得不坐到边上去。直到散会的时候，人们才让英国大使坐到旁边去，给白里安腾出了一个位子。法国代表们对此气得七窍生烟，他们认为，这一事件是有意要贬低法国的威望。

英日同盟是远东国际关系的症结问题之一。华盛顿会议的议事日程上虽然没有正式提出英日同盟问题，然而谁都明白，这个问题是基本问题，是不能回避和必须优先解决的，因为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要在“限制”海军军备方面让美、英、日三国取得一致意见，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早在会议开始前，英、美、日三国之间就对这个问题展开了秘密讨论。

1921年5月，在英日同盟续约还有两个月

就到期时，日本派皇太子访英，谋求延长盟约。因为自1902年以来，英日同盟一直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基石。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该同盟对日本的对外扩张起了重要作用。一战后，日本谋求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仍想借助英国的力量。如英日同盟被取消，日本在国际上有陷于孤立地位的危险，特别是由于它在巴黎和会上态度顽固、四面树敌后更是如此。因而，此时日本更将英日同盟视为救命稻草，绝对不愿意取消它。

1921年6月，英国在伦敦召开帝国会议，讨论英日续盟等问题。会上，英国各自治领意见不一。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在地理位置上靠近日本新占领的岛屿，怕取消英日同盟后，日本失去同盟条约的束缚，对它们的安全造成威胁，因此，反对废除英日同盟。但南非和加拿大坚决主张取消英日同盟。南非代表斯穆茨说："依情理讲，和我们的关系最为密切的是美国。英国的属地拿美国当长兄看待。美国是和我们的意见最相合的国家。……依我看，英国唯一的坦途似乎就是和美国携手。"加拿大代表认为，英日同盟终将使英国卷入日、美战争的漩涡，英国终将帮助

日本攻打美国。到那时，加拿大却可能参加美国对日作战。所以，答案只有一种："英日同盟是英帝国分裂的征兆"。英国国内在远东有经济利益的资产阶级，因在中国同日本的经济竞争不断加剧，认为日本的对华政策同英国的利益相抵触，要求废除英日同盟。此时，英国政府对这个问题举棋不定。一方面，他们认为日本是英国的老关系户，英日同盟曾在两国抑俄反德中起过重要作用，今后对维持英国在远东和太平洋的利益和地位也不无帮助，所以不愿意轻易取消；另一方面，如果坚持续盟，显然会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这时，美国一再向英国施加压力，甚至利用美国国会准备讨论爱尔兰的独立问题，对英国进行恫吓。1921年6月23日，国务卿休斯在同英国驻美大使谈话时说：国会关于爱尔兰问题的决议，将视英、日关系的前途而定。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既不愿意得罪美国，也不愿意开罪日本，它希望在即将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能妥善解决这一问题。

拆散英日同盟，是美国召开华盛顿会议的主要目的之一。因而会议一开始，美、英、日三国立即对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在美国看来，英

日同盟问题如不解决，则其他问题很难达成协议，因为在会上美国有两个主要对手，而这两个对手又有同盟关系，不首先拆散同盟，美国必将处于以一国力量对两国攻守同盟的不利地位。

为了解决这一棘手问题，1921 年 12 月 1 日，在英、美、日三国代表的秘密会议上，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提出了一个用英、美、日三国同盟取代英日同盟的妥协性方案。他在会议召开的前一天给首相劳合—乔治写信说，坚持英日同盟，“在美国将会是很不得人心的，并将使得缔结持久和令人满意的限制军备协定的谈判极难进行”，但是，“我们不能考虑任何旨在疏远日本人情感的行动，更不能激怒他们。”为了调和这两个相互冲突的因素，他设想了一个方案，其形式是美、英、日三国协定。

贝尔福提出三国协定的目的是：(1)能够使美国成为三方协定的一方，消除美国的疑忌；(2)结束现今存在的英日同盟，而又不伤害盟国日本的感情；(3)使英国今后有活动余地，如果英日再次受到“德国或俄国的威胁，就能恢复与日本的防御同盟。”

英国计划的三国协定实为英日同盟的放

大，这个协定适用的范围不仅包括太平洋各岛屿，也包括中国；在解决争端问题时，不但可使用外交力量，而且可使用军事力量，英国的目的是要搞一个变相的英日同盟，以维持它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但美国根本不愿保障其竞争者在远东的特殊利益，它不但力求在中国实行其臭名远扬的“门户开放”政策，还力求在取消英日同盟后能缔结一项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美国大资本家利益的国际协定。因而，美国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这不符合美国的传统政策和大会的方针，休斯提出了三点修正意见：(1) 这个协定只包括太平洋各岛屿，不包括中国，对华问题应另外缔结九国公约，“以示公允”；(2) 遇有问题发生时，缔约国有使用陆海军的义务。这是为了防备英、日两国秘密进行军事联合；(3) 邀请法国加入，改为四国协定。这是由于美国担心英、日由于原有的同盟关系易于接近，从而使自己在其中处于少数地位，法国在太平洋也有着重大利益，它不但应该而且愿意参加。这样，美国便可以利用法国牌而加强它与英、日抗衡的地位。

虽然英国不满意美国的修改意见，但在休

斯坚持之下，终于同意法国参加。而令英国吃惊和难堪的是，日本这时却对美国的方案表示赞成。这是因为一则英日同盟实已无法继续保留下去，坚持原意，将会使谈判进入死胡同而于己不利，不如明智地承认既成事实；二则美国既已声明将中国问题排除在该协定之外，因而这样一来条约便失去了在中国问题上的约束力，这正是日本求之不得的。日本代表币原参酌英国的原案和美国的主张，提出了一个修正案。该修正案经“三巨头”会议通过并拟定了条约草案后，才匆匆由休斯通知法国，请其加入。美国代表亨利·洛奇根据妥协的结果于1921年12月10日向大会全体会议正式提出缔结四强条约的决议草案。

1921年12月13日，美、英、法、日四国代表签署了《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简称《四国条约》。条约规定：(1) 缔约国“同意相互尊重它们在太平洋区域内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权利”，如果相互之间发生涉及上述权利的争端而不能通过外交途径获得满意解决时，应当“邀请其它协约国召集会议受理全部问题，以便考虑解决”；(2)“如上述权利遭受任

何国家侵略行为的威胁时”，缔约国应进行协商，“以便达成协议，联合或单独地采取最有效的措施”；（3）该协定的有效期为10年；（4）协定中有一条特别条款（第四款）规定，在交换批准书后，1911年7月13日在伦敦签订的英日协定（即英日同盟）即自行失效。

《四国条约》的签署，无疑是美国的一大胜利，因为美国已达到了拆散英日同盟的目的。英国也获益甚多。在它看来，条约既保持了英、日之间的友好关系，又增添了同美国协作的新气象。所以，劳合—乔治声称这是英国外交的大成功。为了表彰贝尔福的功绩，英王给他晋爵授勋。日本则为英日同盟的废除感到惋惜。在华盛顿，日本代表对英国代表说：“无论如何，你们已经给英日同盟安排了一个盛大的葬礼。”但是，通过这项条约，日本作为四强之一，在太平洋上的权益得到了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承认，这毕竟是它的一大成功。所以日本外相内田康哉沾沾自喜地说，“四国协约为华盛顿会议之第一成功，日本之国际地位有加无已。”首相高桥是清说：“新协约足以宣扬日本人民之责任，增加日本在东亚之地位。”

《四国条约》的签订，调整了帝国主义在太平洋地区的关系，使美、英、日之间的冲突得到暂时的延缓，它们相互勾结起来，建立了反对苏俄和镇压远东及太平洋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联盟。但是，这个联盟也是极其脆弱的，因为它并没有消除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这项协定延缓了日、美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在当时是对英、美不利的。这项协定的达成是以帝国主义列强的相互让步为代价的；列强各国由于看到苏俄的国际影响日益增长，所以力图缓和美、日矛盾的尖锐程度。实际上，日本仍然充当镇压亚洲大陆各爱好自由民族的宪兵的角色。日本军国主义者认为，新的协定承认了日本在满洲和西伯利亚的“特殊利益”，而且人们在执行自己的宪兵“职务”时，将来不仅能依靠英国，而且还能依靠美国。对此，美国报刊评论说：“日本利用英日同盟树立政治、经济及军事的前锋于亚洲大陆，新协约断难制止此等侵略之发展，”“四国协约乃一制造战争之工具，非制造和平之工具。”

1922年2月6日，四国又签署了一项补充条约，对“四国条约”中的一个条款进行解释，

指出，四国条约所使用的“岛屿属地”和“岛屿领地”的概念，对日本而言只适用于桦太岛(即南库页岛)、福摩萨（台湾)、澎湖列岛和由日本委任统治的岛屿。四个殖民大国就这样粗暴地损害了苏俄和中国的利益。

1922年2月4日和6日，英、美、法、日先后对荷兰和葡萄牙发出“内容相同的通知”，指出，虽然荷兰和葡萄牙政府没有参加签署条约，但四大国保证尊重它们对太平洋地区荷属和葡属岛屿的权利。

英日同盟的废除和四国条约的签订，就使得讨论限制海军军备问题成为可能了。在1921年11月12日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休斯第一个发言，抛出了美国关于限制海军军备的建议，主要内容是：暂时停止各国正在建造或计划建造的主力舰；拆毁一定数量的旧舰只；参照与会国的现役海军力量，为它们确定一定吨位的战列舰。休斯提议，协定签字后10年内不得建造战列舰，10年以后，也只能建造用以替换退役舰的战列舰；规定英、美两国重型舰只的总吨位各为50万吨，日本为30万吨。新造战列舰每艘不得超过3.5万吨。

规定英、美两国轻型舰只(即驱逐舰和巡洋舰等辅助舰艇)的吨位各为45万吨，日本为27万吨。最后，规定英、美两国潜艇各为9万吨，日本为4万吨。至于法、意两国的海军军备，休斯提议暂缓研究。

美国这项建议的主要动机是一目了然的：它为了在海军实力上赶上英国，主张将海上大国舰只的最高吨位限制在一定比例之内。

按照休斯的建议，在协定签字后3个月内，英国应停止建造战列舰，拆毁19艘，保留22艘；美国也停止建造战列舰，拆毁30艘，保留18艘；日本放弃正在建造的8艘军舰，拆毁7艘新战列舰和10艘旧舰，把重型舰减至10艘。

休斯的发言引起了一阵轰动。据一位见证人说，当休斯提到英国应停止建造“乔治五世号”军舰时，英海军上将比蒂竟然失去了常态。英国记者沙利文写道：“比蒂勋爵在靠椅上向前一趴，活像一只躺在门口太阳下打盹的猛犬被一个粗鲁的过路人踢了一脚似的……”

在11月15日的第二次会议上，贝尔福发言。他表示，英国原则上同意休斯提议。最后他宣读了劳合—乔治的电报，后者对休斯大肆恭

维了一番。

本来，美国方案的目的是为了争得美、英海军平等，使英国彻底放弃它的两强标准的原则，(按照该原则，英国舰队应等于世界上两个最强的海军国家的舰队的总和)，同时对日本的海军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美国主张限制主力舰的最高吨位，是因为当时英、日正在建造吨位比美国更大的主力舰，同时作为美国重要航道的巴拿马运河不能通过 3.5 万吨以上的舰只。

对于这样一个明显是损人利己的提案，英国为什么还要支持呢？这是因为英国由于战后经济力量衰弱，无力与发了战争横财、扩充海军潜力极大的美国竞争，“双强标准”在事实上已无法维持，因而不如退而求其次，接受“一强标准”，尽量缩小损失；其次，在英国债台高筑，对裁减海军人员和舰只正求不得时，自然不希望美国执行其庞大的海军计划。如今美国既已主动做出裁军的表示，对英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拒绝无益；第三，当时英国正力求使海军仅保留技术最先进的战斗舰只。英国特别重视一种机动性很高的巡洋舰队，这种舰队有许多基地作做托。英国代表团也正主张加强本国巡洋舰的

力量，认为这是保护帝国海上交通线的必要条件。因而，即使对战列舰做出一些限制，英国已有了补充手段，并无大的损害；最后，英国为了暂时调整其对美关系，不致与美国马上闹翻，而同时又不与其远东盟国——日本完全决裂，虽然英国也并不反对削弱日本。因而，接受美国的建议，英国不仅可以获得喘息之机，还可以获得进退自如、左右逢源的活动余地。况且，休斯已在建议中巧妙地采取了顾全英国面子的手法，他表示美国愿做别国的榜样，首先销毁自己的舰只，并在战列舰的数目上让英国占了先。鉴于这些情况，英国如再固执己见，岂非妄自尊大、不知进退？因而不如见好就收，赶快借着梯子下台。

继贝尔福之后，日本代表加藤发言，他也表示，日本在原则上接受裁减海军的建议。法国代表白里安同意休斯提案，但补充说，法国最感兴趣的是裁减陆军。

乍一看来，与会大国之间彼此似乎没费多大的劲就达成了一致意见。但实际上，各国官方代表的宣言，只不过是礼节性的外交辞令而已。一旦离开原则而转入讨论具体问题时，各国间

就出现了严重分歧。

日本代表团开始强烈反对要求把它的战列舰限制为10艘的计划，它强调自己是一个岛国，有“特殊需要”。11月28日，日本政府提出三个方案密电指示日方代表，令其在会上讨价还价，首先可提出第一案，即英、美、日的主力舰比例应是10：10：7，而非美国提议的5：3：3；如不行，可设法提出10：10：6.5的第二案；倘若必须退至10：10：6的第三案时，各国应保证“维持太平洋的防务现状。”11月30日，日本代表加藤正式向大会提出10：10：7的要求。按日本国力和实际需要，5：5：3的比例已为它提供了足够的发展余地，之所以提高要价是为了在中国问题和其他问题上迫使美国做出更多让步。

对此，英、美一致表示反对。美国代表指出，“日本只需一洋舰队，美国须有两洋舰队，”况且，如不加以限制，按当时的造舰速度，三年后美、日战列舰的比例将是100：46，因此确定5：5：3的比例对日本已经是很客气的了。美国还威胁说，如果日本不接受这个比例，那么今后日本每造一艘军舰，美国就造四艘。日本代表提

出，如接受美国方案，作为交换条件应承认日本原来在中国的权利，美国在太平洋诸岛的防备应维持现状。日本代表团哪里知道，就在他们在谈判桌上气势汹汹时，却已后院起火，将底牌全让人家给偷看了。原来，美国陆军的密码破译人员一直在偷偷监听他们与东京来往的绝密电报，这使休斯在谈判中占了主动，知道日本政府已经决定，如果日本代表不能提高美国提出的比例．则接受限额。

由于日本代表团采取拖延战术而使会谈陷入了僵局，英国代表贝尔福便出面对美国提案给予修改。同时，美国授意中国代表于12月14日向会议提出了废除二十一条的问题。在软硬兼施，两面夹攻之下，日本最后同意了贝尔福修订的条款：即美、英两国保证不在香港、关岛和马尼拉建立重要基地。作为交换条件，日本不在其控制的托管岛屿驻扎军用飞机和军舰。美国新闻记者比尔关于这点写道：

“日本人知道，目前美国在菲律宾和关岛并无这样的基地，所以，本身力量如此有限的美国舰队是不可能实行进攻的。他们坚决要求不得在太平洋岛屿进一步设防，作为接受美国提案

的必要补偿。”

同时，日本在接受这个条约前又提出它在限额之外应再建成一艘战列舰“陆奥”号（该舰当时已经下水，但未完全竣工），理由是：日本的小学生已经为建造该舰募集了款项。

尽管会议的各项工作主要是在美、英、日三大国秘密会议上讨论，法国甚至不能了解到全部情况。然而，法国活动十分积极，坚决要求有权建造10艘新装甲舰，每艘各为3.5万吨。就在英、美、日三国主力舰比率解决的当天，法国正式向大会提出要求：法国为防备德国复仇，并维持领土及殖民地安全起见，需要有主力舰35万吨。意大利也要求与法国拥有同样的数量。对此，英国强烈反对。休斯提议，法国可以拥有17.5万吨。

经过多次讨价还价，法国宣布，为避免大会破裂，它将接受美国的建议。为此，休斯将最初的提案修改为：美国52.5万吨，英国52.5万吨，日本31.5万吨，法国17.5万吨，意大利17.5万吨，这样，美、英、日、法、意五国在主力舰上5：5：3：1.75：1.75的比例最后终于确定下来了。

英国之所以迅速地接受了休斯的建议，除了前述原因之外，还由于它担心美、法两国会取得谅解。但是，接受休斯建议，严重削弱了英国的地位：英国不得不承认英国海军与美国海军相等；英国海军减少了，而法国却保留着强大的陆军。为此，英国声明，它裁减海军只能以法国裁减陆军为条件。英国外交当局想借此手段巧妙地挑起美、法之间的冲突。为了防止英国过分加强它在欧洲的影响和对战败的德国严加控制，美国是不愿意裁减法国陆军的。但从另一方面看，为了削弱日本的武装力量，美国对裁减陆军一事也表示关心。

法国对英国的建议提出强烈抗议。白里安惊呼：

"这对法国是最残酷和最冤枉的欺侮。……如果世界上还有一个坚决维护和平、全力争取和平和诚心诚意维护和平的国家，那便是法国。"

白里安拒绝裁减法国陆军，他在11月21日举行的会议上强调说，为了从布尔什维克的威胁下"拯救"波兰和整个西欧，法国陆军是不可缺少的。

加藤海军上将反对裁减日本陆军。比利时和意大利的代表也采取同样的立场。

在裁减陆军问题上，分歧十分尖锐，寇松在伦敦发表了一篇言词激烈、矛头直指法国的演说。他声称，当其它国家建造新的进攻手段时，英国不能做出牺牲。

裁减陆军的问题被迫提交给一个特别委员会讨论，但在这个委员会中，各国代表仍未取得一致意见。

在以上漫长的争论过程中，美国在主力舰的比例问题上虽然争取到了对它有利的5:5:3的数额，但是，美国仍然被迫做出了重大的让步，而且这种让步后来证明是非常危险和遗患无穷的，它几乎使美国陷入了灭顶之灾。原因在于：1922年2月6日五强（美、英、日、法、意）签订的《海军条约》的第十九条作了如下的规定：美、英、日承认自签约时起，不在下述各自领土和属地内建立海军基地和新的要塞：(1)美国在太平洋上现有或将来取得的岛屿属地，但美国附近海岸、阿拉斯加、巴拿马运河区、阿留申群岛及夏威夷群岛不在其内；(2)香港以及英国现有或将来在太平洋上取得的东经110°以

东的岛屿属地，但邻近加拿大海岸的岛屿、澳大利亚及其领地、新西兰除外；(3) 日本在太平洋中的岛屿领土和属地；(4) 千岛群岛、小笠原群岛、奄美大岛、琉球群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以及日本将来在太平洋中取得的一切岛屿领土或属地。

在讨论过程中，美国试图将菲律宾和关岛也排除在不应增加防备的领土属地之外，但日本认为这将危及它的安全，不但迫使美国做了让步，而且又将阿留申群岛列入了不设防之列。

新加坡的问题同样引起激烈的争执。该地向有“远东的直布罗陀海峡”之称，从这里可以比较容易地对日本发动进攻。英国力主将新加坡划在不应增加防备的区域之外。日本竭力反对，直到 1922 年 1 月才做出让步。这样，英、美以后在远东可以利用的海军基地主要就只有这一个地方了。如果再加上考虑到美国基地距日本所属岛屿较远，而日本本土的海军基地的建设又未受到限制，那就可以看出，这个条约并未严重地损害日本的海军实力。更为严重的是：一旦爆发战争，美国舰队不仅要在太平洋上作战，而且还要在大西洋上作战，而英国舰队则要保

护英帝国那庞大的、散布于五洲四洋的属地。这样一来，在未来的太平洋战争中，只有日本能集中其全部海军力量于靠近争夺的主要对象的地区。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果然利用这种优势发动了突然袭击，不但在珍珠港事件中使美国太平洋舰队被炸瘫痪而一时难以恢复元气，并且合围了中国沿海而完全截断了中国战时的海上交通，还乘机远攻南洋，长驱扫荡，几乎将英、荷、美等国的海陆军赶出了大半个亚太地区。

应该说，美国代表当初在会议上同意在军事问题上做前述让步时，是应该能充分地意识到这一危险后果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那样做呢？是目光短浅、不明厉害，还是求和心切、无暇顾及？对此，历史学家们虽可以任意猜测和评价，但美国代表当时的确认为：由于他们做出了让步，武装冲突被推迟了，而美国在财政资源、技术和原料资源方面的优势，使美国能够最终战胜其在太平洋上的劲敌；还有，美国必须执行一种能保证其在未来可能的对日冲突中与英国保持联系的对外政策路线。

主力舰问题解决之后，关于其它舰只限额

的争论就主要在英、法之间展开了。

英国在主力舰吨位比例问题上对美国让步以后，企图用缩小两国的潜水艇舰队建造的办法来获得补偿。美国提出的方案是：英、美各为9万吨，日本5.4万吨。我们知道，在一战中，英国的舰队由于德国潜艇部队的海盗式的偷袭，而吃了大亏，英国一想起来就心有余悸，不寒而栗，因此，它希望今后能减少潜艇对英国舰队和商船的威胁，因而力主限制各国潜水艇的发展，甚至主张予以完全取消。战后，英国在欧洲大陆上的主要竞争者是法国，自然极力要求法国裁减潜水艇部队。

关于潜水艇的讨论暴露了英、法之间的深刻矛盾。受英国指使的美国报刊发动了一个主张宣布潜水艇为非法的运动。在华盛顿会议开始辩论时，英国代表宣称，英国准备取消其整个潜水艇舰队和解散潜艇部队的人员，只要其余国家也仿效它那样做。法国代表坚决反对这个建议。他们说，潜水艇是海军较弱的国家防御海岸、抵抗强国战舰的锐利武器，而且价格低廉、作用显著、用途最广，战列舰少的国家应拥有较多的潜水艇。因而为了国家的安全，法国政府不

但不能接受关于取消潜水艇舰队的建议，而且不能同意减少潜水艇舰队的总吨位以及限制每艘潜水艇的吨位。他们甚至坚持要把法国的潜水艇舰队的吨位增加到9万吨，即与英、美相等。法国代表援引休斯关于潜水艇是保卫弱小国家的武器的说法，而以在会议上没有代表的各小国的“保卫者”自居。他们证明说，如果不准这些小国使用潜水艇，那它们将成为强国的牺牲者。他们由此得出结论说，会议根本不能作出关于潜水艇的决议。换句话说，法国拒绝服从对潜水艇的限制。

意大利和日本支持法国的意见。美国企图调和英、法两国的立场，因此休斯建议把美、英两国的潜水艇舰队限制为6万吨，意大利限制为2.2万吨，法国和日本的潜水艇舰队限制为3.1万吨。日本代表不服，提出了5.4万吨的要求。法国代表团在同本国政府磋商后仍坚持有权建造9万吨的潜水艇舰队。

英国对法国的态度极为恼怒。贝尔福在会上公开说，法国关于9万吨潜水艇的要求，对它的邻国英国来说，是十分危险的因素。他援引上次世界大战的经验，郑重地提醒与会各国代表

不要忘记了当时德国潜水艇采用野蛮的方法，击沉了总排水量1200万吨的商船。最后，他声明："不能允许拥有80万陆军的法国再拥有头等的潜水艇舰队"。

法国代表一方面继续坚持自己的要求，同时保证说，法国政府不会侵害其他国家的利益，它只想确保自己国家的安全。白里安在回答贝尔福时指出，当英国代表要求本国保持50万吨的主力舰时，无论是他还是法国的其他代表，都没有把这一要求看做是反对法国利益的。法国既然没有怀疑英国以其52.5万吨的战列舰向法国施展阴谋，英国也不应当因为法国要求拥有国防所必需的9万吨潜水艇而怀疑法国对它怀有敌意。白里安接着说道："英国采取预防办法来对付我们，而我们也想采取预防办法来对付英国。英国要想取消潜水艇，我们不同意这样做。但如果英国愿意取消主力舰，那我们就立即同意取消潜水艇舰队……"

英国代表贝尔福见状，再次强硬地声明：法国9万吨潜水艇卡在英国的喉咙中，英国将保留不受限制地建造能防御潜艇的各种辅助舰只的权利。

英、法在华盛顿会议上的“潜艇战”，给两国关系投下了巨大的阴影。正当他们唇枪舌剑、吵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日本和意大利也乘机大凑热闹、混水摸鱼，他们趁火打劫、不怀好意地声明，他们不但反对取消潜艇，而且都要求增加自己的吨位。由于争论激烈，互不相让，各国代表都清楚，要就潜水艇问题达成协议是根本不可能的，再谈下去，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于是，纷纷王顾左右而言他。这样，旷日持久的潜水艇问题之谈判，就这样不了了之、随风而去了。

经过两轮争吵以后，一般人也许会感到头痛和没劲而不想多开口了。然而，英、法代表却不是这样，尽管他们作为凡胎肉体也免不了疲劳的困扰，但一涉到以各自的利益时，他们就像乏力的吸毒者在海洛因的刺激下一样，立即精神为之一振，又开始了对水上辅助舰（包括巡洋舰、驱逐舰等）问题的争吵。美国的方案规定，英、美的总吨位各为45万吨，日本为27万吨。法国为自己提出了33万吨的要求，并且坚持说不能低于这个数字，否则，“便危及国家生死利益，殖民地及海军之安全”。法国这种不调和的

态度又一次激怒了英国。贝尔福说，法国不是在限制军备，更不是在执行防御政策，它的9万吨潜艇的要求已压得英国透不过气来，为了对付法国的潜艇政策，英国将保持建造各种水上辅助舰的权利，因而一切限制之类的言辞，敬请诸君免谈。

由于英、法两个大国从中作梗，关于限制水中辅助舰的讨论同样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无结果而散。

接下来，会议进入了这项提案的最后一个议程：讨论限制航空母舰的问题。出人意料的是，这个问题各国比较顺利地取得了一致意见。但是如果你认为这是因为代表们或想改变先前那种遇事必争、吵嚷不停的孩童形象而想显得老成持重些，或是实在太累而无精力再争吵了，这却大错特错了。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航空母舰刚问世不久，各国海军高级将领对它的作用和性能还缺乏了解和表示怀疑，他们大部分人还停留在浅层次的认识上，认为这个笨重庞大、花钱又多的水上钢铁怪物，最多只能充当水上移动炮台的角色。

对于这个问题，美国的方案是，英、美各为

8万吨，日本4.8万吨，法、意各2.8万吨。在12月30日的海军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意大利代表提出，2.8万吨的限额只能有一艘航空母舰，若因事修理或不幸沉没，意大利一时就成了无航空母舰之国，所以要求增加到5.4万吨。随后，英、法、日各国均以各种理由要求增加吨位。在此情况下，休斯提出了普遍提高各国吨位的修正案，获得通过。

同时，美国提出了一项附加条款：每一个缔约国均可将两艘战列舰改装为航空母舰，其吨位可达3.3万吨。美国之所以提出这一附加条件，是为了将它已在船台上的两艘战列巡洋舰改装为大型航空母舰"列克星敦"号和"萨拉托加"号。后来证明这是一项有深远影响的决定。由于这种航空母舰有着其它任何舰艇无法比拟的优点，它航程远、航速快和装载的作战飞机多，对敌方的打击往往是粉碎性的，威力相当巨大。美国在一些有远见的海军将领努力下，发展了以大型航空母舰为中心的特混舰队战术。珍珠港事件中，美国损失了在太平洋上的主力舰之后，主要就是依靠幸存的特混舰队来支持危局，并为以后的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

经过长达86天的激烈争论，1922年2月6日，美、英、法、意、日五国签订了《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即《五国条约》，或称华盛顿《海军条约》。

条约规定：英国可拥有战列舰20艘，总吨位为55.895万吨；美国18艘，为52.585万吨；日本10艘，为30.132万吨；法国10艘，为22.117万吨；意大利10艘，为18.28万吨。

缔约国保证不得拥有和不得建造3.5万吨以上的战列舰，每艘战列舰不得配备口径超过16英寸的大炮。战列舰的可替换吨位，美、英两国不得超过52.5万吨，日本不得超过31.5万吨；法国和意大利各为17.5万吨，这就是一般通称的5：5：3：1.75：1.75的比例。

五国航空母舰总吨位的限额是：美、英各为13.5万吨，日本为8.1万吨，法、意各为6万吨。辅助舰只的吨位限定为1万吨，航空母舰每艘限为2.7万吨。

条约对于要塞和海军基地问题，特别予以重视，规定，在这个问题上，维持现状，这就是说，除某些特殊情况外，禁止在太平洋中部和西部建立新的海军基地。整个看来，根据协议，美、

英两国不得在距日本5000公里以内的地区建立海军基地。其具体规定为条约的第十九条的内容，前已详述，此不重复。

五国条约指出，缔约任何一方在战时可以中止条约效力。如缔约任何一方在和平时期认为新的形势影响到它的国防利益，各缔约国应举行会议，对条约加以修正。这一条款实际上把整个协定化为乌有，因为任何参战国都有可能撕毁这项协定。这些滑头政客们也许是聪明过头了，他们怎么没有意识到仅仅由于这一规定而在实际上表明他们长达86天的争吵和挖空心思的算计，到头来实际上全是在做无用功呢？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还是吃错了药、利令智昏？我们圈外人士自然不得而知了。

同一天，五国又签订了“战争时期保护海上的中立国人员及非交战国人员生命协定”，并规定“禁止在战争中使用有毒气体及化学物质”。所有资产阶级报纸都企图把这个协定解释为禁止潜艇击沉商船的协定。但是，后来的事实却把这些纸上的保证统统勾销了。

《海军条约》是世界现代史上第一个在大国之间达成的裁军协议，它暂时停止了各大国间

的军备竞赛，并缓和了它们之间的矛盾。但是这个条约并没有也不可能消除产生军备竞赛的根源。除非缔约的各国都自愿放弃侵略政策，否则任何裁军的协议，都将很快被证明是没有价值的。

《海军条约》实质上只解决了海上实力的重新分配。条约对美国来说是又一个胜利，它终于迫使英国这个海霸正式承认了英、美海军力量对等的原则，并使日本的野心受到一定遏制。但是，美国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对日本做出了后果严重的让步。而且，条约并没有消除列强之间的矛盾，相反，却造成了孕育着种种新的国际争端的局面：美国丧失了在菲律宾和关岛设防的可能，这一情况很快就加剧美、日之间的矛盾；英国在西方通往太平洋的门户新加坡仍保留设防权利，这就表明英、日矛盾将会进一步尖锐起来；日本尽管已捞到不少好处，但贪心不足，对条约阳奉阴违；法国舆论对条约极为不满，报纸公开发表评论说，过去"法国与英国同为世界海洋史上之花，今法国自行放弃已往之历史，是自贬于二等海军国之列。"

华盛顿会议的主要议题有两个：限制海军

军备问题和远东与太平洋问题。与会的大国在解决了前一个问题之后，会议自然就进入了对远东和太平洋问题的讨论，其核心是中国问题。当时，中国是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争夺的主要目标，对于这个东方维纳斯，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都虎视眈眈、环顾左右，将它们那淫邪恶毒、不怀好意的目光紧盯在中国身上，都想搭上一手、捞上一把。所谓远东和太平洋霸权之争，实质上就是对中国霸权的争夺。美国召开华盛顿会议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日本在中国问题上做出让步。

在华盛顿会议召开时，中国存在着南北两个政府。孙中山所领导的南方政府曾要求参加华盛顿会议，列强们对这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不妥协的反帝立场早就又惊又惧，因而毫不犹豫地对此加以拒绝。北方亲日的皖系军阀段祺瑞已失败下台，掌握北京政权的是亲英、美的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他们想借助英、美限制日本在华势力。这时中国形势已不同于巴黎和会时期："五四"运动以后，反帝爱国运动日益深入人心，华盛顿会议开幕前几个月，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革命运动正在兴起。在种种压力的

影响下，北洋政府派出了以施肇基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才得以在会议上提出某些维护民族利益、收回主权的议案。然而他们总的立场又是软弱的，寄希望于外力，首先是借助美国的支持来抑制日本，争取收回某些权益。所以代表团聘请了前美国国务卿兰辛、前驻华大使芮恩施和美国人韦罗贝等为顾问。

1921年11月16日，在"远东和太平洋问题"全体委员会会议上，中国北洋政府出席华盛顿会议的首席代表施肇基提出了10项原则，要求将其作为讨论和解决中国问题的基础。即：(1) 各国约定尊重并保持中华民国之领土完整及政治上、行政上之独立。中国自行准备声明，不以本国领土或沿海任何地方，割让或租借他国。(2) 中国既赞同所谓"门户开放"主义，即与约各国工商业"机会均等"主义，故准备接受该项主义实行于中华民国各地而无有例外；(3) 为增进彼此间信任暨维持太平洋及远东和平起见，各国允许，除先期通知中国俾有机会参预外，彼此不订立直接有关中国或太平洋普遍和平之条约或协定；(4) 以前中国政府给予外国一切特别权利和特免权，应予废除；(5) 中国在司

法、政治、经济与行政上所受之限制，应立即取消，或按照情势许可尽速废止。(6) 中国现有之条约，其无期限者，概须附以相当明确之期限。(7) 凡解释让与特权或特别权益之条文时，应依公认解释原则，以有利于让与国严格解释之。(8) 在未来战争中，中国如不参战，应完全尊重中国中立之一切权利；(9) 应规定和平解决太平洋及远东国际冲突之办法；(10) 应规定召集定期会议，以讨论与太平洋及远东有关之国际问题，并为冲突之缔约国决定其共同政策之基础。

中国方案中的这 10 项条款，更加详尽地重申了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当时未经审议就遭到拒绝的要求。10 项原则中虽提到各国对于中国的“领土之完整及政治与行政之独立”的“尊重并遵守”，但同时又完全承认了“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因此，前者只不过是装点门面的空话而已。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政策，本来是后起的美国与老牌帝国主义争夺中国时所打的旗号，当初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门户开放时只限于租借地和势力范围，他所说的机会均等也只限于商业方面。现在北洋政府的代表倒好，一下子大方得吓人，在提案

中却把机会均等的原则扩展到了工业，并要在全国各地实行门户开放。这事实上是自动敞开大门，引狼入室，导致对本国主权的严重破坏。当然，北洋政府为了取得美国的支持，以抑制列强，特别是日本给中国施加压力，故不惜讨好卖乖，极尽献媚巴结之能事。但是，当时列强各国本来为争夺中国已矛盾很深，一直是桌上握手、桌下踢脚。因而中国完全可以利用它们的不和而纵横捭阖、相机行事、以夷制夷，根本用不着做出太大的让步。但是，出席和会的那帮软骨头，为达目的，哪管后果，早将国家利益、民族权限抛到了九霄云外。综观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中外谈判即可发现，中国屡次受欺，也与国人的这种妄自菲薄、自毁长城不无关系。任何一个血性中国人，每念及此，无不痛心疾首、扼腕叹息！

中国代表提出10项原则后，美国代表卢特主动提出为大会起草有关中国问题的决议草案，他将10项原则归纳为4条：(1) 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即中国领土与行政之完整；(2) 给予中国以发展并维持一有力巩固政府之机会；(3) 保证维持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

会均等之原则；(4) 不得因中国状况，趁机营谋特别权利，而减少友邦人民之权利，并不得奖许有害友邦安全之举动。其要害仍是“门户开放，机会均等”。

日本代表加藤在会上对“行政之完整”的涵义提出质问，卢特在回答中表示，它不影响过去已经许给各国的利益与特权。这才使日本放下心来。卢特的4条原则当然是对企图独占中国的日本的一个打击，但是，既然保持了日本原有的掠夺所得，日本也表示可以接受。以上4条原则，经会议通过成为正式议案。

接着，休斯提出了关于实施门户开放的4条建议。前3点无非是说中国政府“欢迎”外国在门户开放的原则下来中国投资，外国的投资者也必须按此原则办事。但其中提出，要在中国设一审议局，以审查外国过去同中国签订的条约及达成的协议是否符合门户开放的原则。这是对中国主权的明目张胆的践踏。第四条则规定，现存的外国与中国签订的条约也需进行商议。这就是说，该条保有溯及既往的权能。由于它触犯了日本的利益，币原当即表示反对，法国代表也支持日本的立场，第四条终于被删去。

美国之所以不惜甘冒触犯众怒的风险而力求使美国传统的“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主义”能获得确认，是因为这个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实力增强的情况下，对于实现美国的掠夺计划是一块方便的遮羞布，而且能保证美国垄断组织在中国取得统治地位。

美英代表在“门户开放”主义的“大公无私”的性质这个题目上所说的煽动性的话，是为了沽名钓誉、欺骗本国和中国的舆论。而实际上，确认“门户开放”的原则，就是意味着对中国的进一步奴役，就是宣扬既然有免费早餐，就应该有饭大家吃，而不能有的饿死，有的撑死。

美国进步的政论家乔治·马里昂在说明美国所推行的“门户开放”政策的特征时说道：“我们宣布了‘门户开放’的原则，并且不止一次地提出了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的要求，这决不是为了摧毁外国在中国的统治制度本身。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随着力量对比的变化，能有一个迅速侵入英国、日本及其它国家的势力范围的合法的空子。我们准备排除一切障碍，去继承欧洲帝国主义的外交在远东所创造的一切。”

英、法、日各国对于门户开放原则表面上不能不表示赞成，但对按照此项原则审查过去同中国签订的条约表示反对，因为这触犯了它们在华已经取得的利益。法国代表首先反对说，这将会“危及既得的利益”，他强烈指出，“改正既定契约甚不正当。”英、日也反对重新审议过去的对华条约。英、法、日三国对于中国问题都抱定一个“维持现状”的目的，他们在会上所用的是一种“敷衍”政策。凡空空洞洞的条文、粉饰太平的决议，不妨碍他们原有势力的维持和发展的，他们都表示赞成，但条文如有溯及既往破坏他们已经取得的赃物的，他们都极力反对。

尽管帝国主义各国非常动听地声称“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及领土完整，但一涉及到实质问题，他们即晴转多云、把脸一抹，完全恢复本身的强盗和无赖面目。对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的涉及收回中国主权的一些重大问题，或不予理睬，或设辞规避，或给一点微小的让步，敷衍了事。

1921 年 11 月 23 日，中国代表提出关税自主问题，认为中国现行之约定关税，乃全世界罕见之低数额，且制度上流弊丛生，不仅妨碍中国

主权，而且与国际上均等及互惠原则也格格不入，要求中国收回自行规定与处理关税之权。作为第一步，要求从1922年1月1日起将现行的名义上的5%的税率（实际上未达到）提高到12.5%。

列强借口中国内战未息和本国商人受损，只同意召开修正税则的上海会议，以设法使关税切实达到5%。至于关税自主问题，于将来适当时机再行提出讨论。

11月25日，中国提出了废除领事裁判权的要求，认为它有碍中国主权，不符合国际法之原则。当时，有英、美、法、意、日等15个国家在中国享有这种特权。与会各国借口中国司法制度不完善和问题很复杂，在休斯的建议下，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考察在中国领事裁判权之现在办法以及中国法律、司法制度暨司法行政手续”，以便提出各国逐渐放弃领事裁判权的具体建议，但又说各国“可自由取舍该委员会建议之全部，或任何一部。”显然，这是典型的“牛步战术”，将问题推到遥遥无期，不知要到猴年马月才有结果。

同时，中国还提出了撤销外国邮局的议案。

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外国在华邮局的数目越来越多。1921年，这类邮局不下150所，其中日本124所，法国13所，英国12所，美国1所。中国当局不得检查由它们经手的邮件，结果是漏税品和违禁品（特别是吗啡和鸦片等毒品）都通过这种渠道大量流入中国。由于各国不想断了这条可使他们暴富的肮脏财路，所以在1922年2月1日通过的决议中规定，租借地以及各国控制的铁路附属地的外国邮局原封不动，照常“营业”，各国只答应在外国邮务总办的地位保持不变等条件下，撤销上述范围之外的、一些国家自行设立的没有条约根据的小邮局。

11月28日，中国提出了取消外国在华无线电台以及撤退外国驻华军警的要求。关于前一问题，经过多日的讨论，才允许中国以“全价”赎回少数几个电台。

各国在华驻扎军警的问题兴盛于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有根据条约而来的，有毫无根据而来的。及至1921年，已经达到了相当规模，尤以日本为最多。日本代表埴原声称，日本在中国设置这类军警只是为了维持秩序，并不抱有任

何侵略目的，坚持不肯撤退。其他列强都支持日本的立场。最后会议决定，由各国驻华外交代表会同中国政府联合调查，并写出详细报告书和意见书，但各国“可自由采纳拒绝报告书中调查结果所得之事实及意见之全部或任何一部”。也就是说，调查结果和有关建议对任何一国都无约束力。后来在中国的坚持下，日本只撤退了在山东和汉口的驻军。

12月3日，中国提出“废除和提早终止”外国租借地的要求，此事涉及到胶州湾、旅大、广州湾、威海卫和九龙。英国声明，它不能归还九龙，因为该地“为香港之屏障，无九龙则香港成为不能自卫之港口”，但答应放弃威海卫。日本则表示，旅顺和大连不是直接取诸于中国，是“以不小牺牲”从俄国手中夺得的，日本在那里“有关系其经济生活和国家安全的重大利益”，绝不能作任何让步。法国表示可以放弃广州湾。但事实上，威海卫到1930年才交还，而广州湾拖到1945年才交还。美国因在中国没有地盘便袖手旁观，装聋作哑。

接着，中国又提出了取消列强在华势力范围的议案。但会议只做出一个空洞的关于禁止

将来建立势力范围的决议，该决议成为《九国公约》的第4条。

1922年2月6日，美、法、英、意、日、荷、中、葡、比九国正式签署了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即《九国公约》。全文共9条，卢特的4条原则被列为第一条。公约的主要内容是：(1)“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2)“切实设立并维持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3)“不得因中国状况，乘机营谋特别权利，而减少友邦人民之权利”；(4)凡“意在中国指定区域内设立势力范围，或相互设有独占之机会者，均不予以赞助”。

公约的核心是肯定了美国提出的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并赋予它以国际协定的性质，这在公约的第三条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该条附带宣布：“为适用在中国之门户开放或各国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更为有效起见，缔约各国，除中国外，规定不得谋取或赞助其本国人民谋取：(一)任何办法为自己利益起见，欲在中国任何指定区域内，获取有关于商务或经济发展之一般优越权利；(二)任何专

利或优越权，可剥夺他国人民在华从事正当商务实业之权利，抑或因其范围之扩张、期限之久长、地域之广阔，致有破坏机会均等原则之实行者。”十分明显，这个条约是用以对付日本想单独剥削中国的野心的。

《九国公约》的签订，是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国务卿休斯得意洋洋地说：“我们认为由于这项条约，中国的‘门户开放’终于实现了。”条约签订后第三天，美国代表团在给总统的报告中说，华盛顿会议已将美国政策的重要信条重新认可，它不再停留在外交照会的阶段，而是以条约的形式确定了下来，并具有列强最严肃的保证效力。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指出：“‘门户开放’政策的采取，显然是美国侵略中国的第一步成功。”

《九国公约》实质上是在美国占优势的基础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共同的、有组织的联合统治和掠夺。它丝毫没有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中国没有能收回租借地，而这些租借地又位于中国的战略地区，因而形成了国中之国。正如毛泽东所分析的那样：“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在

一个时期内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独霸中国的机会，但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使得经过那时的卖国头子袁世凯签了字的对日屈服投降的条约二十一条，不得不宣告无效。1922年美国召集的华盛顿九国会议签订了一个公约，又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

在《九国公约》的前期谈判中，由于英、法、日对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原则拖拉搪塞，想极力维持“现状”。美国为了打破“现状”，特别是打破日本独占中国的局面，扩大美国在中国的势力，因此，它趁着当时中国国内人民群众要求收回山东的要求，支持中国代表向会议提出山东问题提案。1921年11月30日，中国代表在远东和太平洋问题委员会上，正式提出了山东问题。

对此，日本借口山东问题是中、日两国间的事，拒绝在大会上讨论这个问题，要求在会外通过中、日双边谈判解决。美国这时却又装出一副左右为难的样子：为应付国内外舆论，它必须公开支持中国的要求；可它又怕由此问题引起的争端给大会增加新的困难，从而影响正在进行

的其他谈判。英国也处于同样境地。于是英、美顺水推舟，同意了日本的立场，但为了保持对中、日谈判施加影响，英、美坚持必须派出他们的代表以观察员资格列席参加。日本接受了这一要求。

12月1日，中日双方开始举行谈判，英、美代表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在谈判中，胶济铁路问题争论最为激烈。日本开始坚持该铁路应由中、日公司合办，遭到中方拒绝。12月6日，日本代表团在发往东京的一份“万急”密电中说：“目前处理山东问题最棘手之点，即为共同经营胶济路问题。不但中国代表在第二次会议中，竭力表示反对合办，既美国亦自始拒绝。英国对此也无良好印象。所以，我们认为勿坚持名义问题，毋宁采取避名就实的方针。”在此方针得到日本政府批准后，日本代表团即撤销了合办的建议，提出将铁路售于中国，但拒绝中国用现款支付，要求中国为赎路而向日本借款，45年还清，目的是为了继续控制铁路。对此，中国代表坚决反对。这时，日本通过美、英出面调停，由休斯和贝尔福提出一折衷方案，并请美国总统哈定出面干预，软硬兼施、恩威并济，中国代表

被迫接受。于是，中、日双方就胶济铁路问题达成妥协。

华盛顿会议开幕后，中国人民强烈要求取消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然而北洋政府的代表团却畏首畏尾、迟疑不决。只是当美国为迫使日本在限制战列舰问题上做出让步而对中国这一要求表示了支持以后，中国代表才于1921年12月15日向远东总委员会提出，“二十一条”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生存、独立和完整，应当予以废除。日本代表埴原以“此系中日两国间事不能在大会讨论”为借口加以拒绝。延至1922年1月17日，美国代表出面调停。然而，日本仍持强硬立场，这种蛮横霸道的态度一时遭到会内外舆论的抨击。由于这时日本接受了5：5：3的战列舰比例，休斯便以集中讨论海军问题和山东问题为理由，宣告远东问题总委员会不定期休会。直到2月2日才恢复对该问题的讨论。

日本代表币原声称该条约经两国政府正式批准，完全合乎国际惯例，同时危言耸听地说，取消“二十一条”将会成为“取消其他国家签订的条约”的先例，“如果承认被庄严地赋予条约效力的权利，随时可因其违背提供此种权利的

人的自由意志而予以收回，那么这将造成极端危险的先例，它可能给亚洲、欧洲和其他任何地区当前国际关系的安定，带来影响深远的后果。”

不过，日本外交当局担心美、英两国会由于日本的顽固态度而力求在其他问题上捞取补偿，与其造成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于己无益的局面，不如作些让步，因而日本答应放弃“二十一条”中的某些次要条款，如放弃在南满及东部内蒙古建造铁路借款的优先权，并把以这两地的各种税款作抵押的借款的优先权让给新近组织的以美国为首的四国银行团；放弃向南满派遣政治、财政、军事、警察顾问和教官的优先权等。可是，日本却避开了中国关于日军撤出南满的要求这一重大问题。

中国代表团不满意于日本的回答，还想据理力争，但是会议已经匆匆收场。这样，在2月3日远东问题总委员会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中国代表指出，“二十一条”是和华盛顿会议所制定的原则不相符合的，并声明保留今后相机解决此案之权利。作为华盛顿会议的结果，日本在满洲的势力不仅没有受到削弱，反而得到会

议的默认，这使它更加有恃无恐。

1922年2月4日，中日签订了《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附约》。条约规定：日本应在签约后的6个月内将胶州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并且把租借地内所有公产全部移交中国政府，中国则允诺将该地全部开为商埠，准外国人在该区域内自由居住并经营工商及其他合法职业；日本军队，包括宪兵在内，一律在同期撤出山东；“本条约实施时，青岛海关即完全为中国海关之一部分”；胶济铁路及其支线归还中国，但中国应照上述铁路产业之现值以国库券偿还日本，此项国库券以铁路产业及进款作抵押，期限15年；在国库券未偿清之前，中国政府应选任一日本人为车务长，并选任一日本人为会计长，与中国会计长权限相等；淄川、坊子、金岭镇各矿山，应移归中国政府所特准的公司接办；济南—顺德、高密—徐州铁路借款优先权让与以美国为首的四国银行团；中国对“外国人民在德国旧租借地区域内之既得权，无论在德国租借时或日本军事占领时经合法、公道取得者，应尊重之”；青岛—烟台及青岛—上海间的前德国海底电缆归于中国，但其中一部分，即

“日本政府用以安设青岛、佐世保间之海线者，不在此列。”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根据这一条约，日本将山东归还中国是有条件的，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的经济、政治地位仍然很牢固。它可以利用胶济铁路、矿产、地产、工商企业来操纵山东的经济命脉。同时，“由于领事裁判权的继续施行，青岛日本领事的地位在权力上不低于中国督办。”甚至在“附约”里还明显保留着日本的一些特权，如“准许在胶州德国旧租借地内之日本商人，得用日本文字与青岛海关接洽事务；关于选用青岛海关适宜职员时酌加考虑”。此外，这一条约的签订还为美国插足山东提供了机会。但是，凡尔赛条约关于山东问题的决议总算得到了若干修正，中国在山东的主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从美、日争夺远东霸权的角度来看，它意味着美国外交的胜利和日本外交的失败。

此外，华盛顿会议上美国还提出了日本在苏俄驻军的问题。日本说明虽尚有部分驻军但迟早要撤退，但美国表示反对，要求立即撤军。日本最后一批干涉军于1922年10月撤离海参

威。

华盛顿会议也讨论了有关中东铁路的问题。早就垂涎于满洲铁路网的美国垄断组织，企图在建立“国际财政监督”的幌子下来夺取属于苏维埃国家的中东铁路。但苏俄政府在其抗议中宣称，它绝不承认在没有它参加的情况下所通过的各项决议。苏俄政府的这一坚定立场，就阻止了通过任何有关中东铁路问题的协定。

1922 年 5 月 4 日，美、日开始交涉废除《蓝辛—石井协定》，1923 年 3 月 14 日，双方经过换文，宣告协定终止。

华盛顿条约经签字国中最后一个国家批准后，于 1925 年 8 月 6 日在华盛顿互换批准书正式生效。

华盛顿会议同巴黎和会一样，也是帝国主义的一次分赃会议，是根据当时帝国主义列强的实力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进行一次权力再分配。它在承认美国在太平洋及远东占有优势的基础上，修改了凡尔赛条约中的一些条款，解决了若干巴黎和会所未能解决的问题，重新调整了战后帝国主义列强在这一地区的关系，最后完成了战后帝国主义对世界的重新分割，形成

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新体系，即所谓“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华盛顿会议后，帝国主义列强暂时停止了海军军备竞赛，并在均势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脆弱的集体安全体系。这虽然只是帝国主义列强间的临时妥协，但它毕竟给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带来暂时的国际和平与安宁，暂时减轻了各强国人民的军费负担；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世界20年代的经济繁荣。

华盛顿体系虽然是由一大堆条约和协定作后盾，但其主要条约并没有真正的约束力，尤为关键的一点在于，它没有规定保证实施的机构和措施。虽然签约国原则上承认了集体安全的原则，却未承担处理任何违约行为的义务。它仅寄托于各国的“道义与自我克制”。美国是这一体系的倡导者和守护神，它所依靠的是强大的经济实力、无限的资源和由此形成的庞大的军事潜力。然而潜力与实力之间是有差别的，由潜力变为现实的军事力量，需要决心和时间，何况美国参议院在批准《四国同盟条约》的时候就声明美国将“不投入武装力量，不结盟，不承担参加任何防御的义务”。

华盛顿会议完成了对远东的重新划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巴黎和会的继续，对于凡尔赛条约是一个补充。1919年，英、法外交官曾经在巴黎巧妙地绕过了美国人，反过来，这一次美国代表却在华盛顿获得了显著成功。华盛顿会议表明，世界政治发生了有利于美国的某种变化。美国外交扮演了远东新的“均势”的发起者与组织者的角色。但这种均势是动荡的和短暂的。

中国未被允许参加四国条约的谈判，虽然这个条约是直接同中国有关的，所以中国的舆论认为这个条约是扩大了的变相的英日同盟。中国在名义上参加签订的九国公约，是帝国主义列强间关于中国的协议，而不是它们与中国达成的协议。只要看一看某些条文的措词就行了，在那里直接了当地说：“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协议如下……”

中国贫弱，英雄气短，固然可被欺于一时，但这些帝国主义老爷们会永远高枕无忧、平安无事吗？一旦中国反过手来，结局将会怎样呢？中国政府软弱可欺，但已饱经风霜，进行了80年反帝斗争的几亿中国人民岂可易与？

华盛顿会议的各项协定，是在“门户开放”原则，即首先对美国有利的旗帜下，以共同掠夺中国为基础，来建立帝国主义的暂时均势的一次尝试。

但这一尝试的失败是预先就注定了的。会议的决议并未能缓和帝国主义在太平洋上的尖锐矛盾。美国向日本和英国的阵地进攻，引起了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矛盾的进一步增长。

从本质上说，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不过是帝国主义上一轮争夺的总结，下一轮争夺的开始。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不管是一个帝国主义联盟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联盟，还是一切帝国主义强国结成一个总联盟，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前后两次战争之间的‘暂时休战’”。一旦帝国主义者的贪掠欲望膨胀到无法自制和它们的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后，他们必将重开争夺之战，那个时候也就是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寿终正寝之时。

第三章　敞开的窗口

土耳其的民族解放战争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撕开了一个巨大的、永远无法弥补的缺口

一战中，土耳其因追随德奥集团并战败，结果在战后被迫于英、法等协约国集团于1920年8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色佛尔条约》。就在协约国集团为他们的阴谋得逞，已将土耳其剥夺得所剩无几而沾沾自喜时，他们哪里想到，他们与之签约的土耳其封建政权苏丹政府，在国内革命的冲击下早已处于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境地，因而《色佛尔条约》只不过是镜花水月之事，既靠不住，更没有实现的可能。土耳其国内以基马尔为代表的民族阶级所组成的安卡拉政府，一面声明坚决不承认《色佛尔条约》，一面

组织了国民军，开始用武力直接打击侵略者。英国、希腊等侵略者在战场上遭到迎头痛击、连连失败后，被迫宣布与安卡拉政府停战谈判，重订和约。

1922年11月22日，有关各国在瑞士的洛桑召开会议，讨论重新签订对土和约问题。以协约国英、法、意、希为一方，他们提出邀请美、日与会；以土耳其为另一方，则提出邀请黑海沿岸的大国苏俄参加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英国外交大臣寇松、法国总理普恩加来、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和希腊首相维尼塞洛斯。土耳其的全权代表是伊斯美特巴夏。美国因未参加国际联盟，仅派驻意大使蔡尔德以观察员身分列席会议。苏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等国应邀与会，但只限于参加对黑海海峡问题的讨论。

洛桑会议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22年11月22日至1923年2月4日。这一阶段会议讨论和争执的主要问题有下列三个：

(1) 关于黑海海峡问题。

黑海海峡问题不仅关系到维护土耳其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而且关系到黑海沿岸各国的和平与安全。在洛桑会议前夕，列宁曾公开提

出了苏维埃政府对海峡问题的基本主张：(1)“满足土耳其的民族愿望”，恢复土耳其在海峡地区的全部主权；(2)“无论平时或战时都不准任何军舰通过海峡”；(3)“商船有充分的贸易航行自由”。在洛桑会议上，苏俄代表团团长齐切林根据列宁的意见提出了苏俄政府的方案：“平时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与达达尼尔海峡的航业交通应予永远自由，毫无限制；”“无论平时战时，除土耳其外，达达尼尔海峡与博斯普鲁斯海峡对于任何国家的军舰与军用飞机，均予永远封禁，”以维护黑海的和平及其沿岸各国的安全。

苏俄代表的建议遭到英国为首的协约国的反对。英国唆使罗马尼亚代表提出另一方案，主张任何国家的船只不仅在平时，而且在战时（只要土耳其是中立国）都可以自由通过海峡；在土耳其参战的情况下，中立国军舰可以自由通过海峡；其他国家的军舰是否可以通过，由土耳其政府自行决定；海峡地带解除武装，由非黑海国家组成国际委员会加以监督。这个方案一出笼就受到法、意两国的支持。美国也打着“公海航行自由”的旗号，支持英国。美国列席代表蔡尔

德在会上宣称："我们要进入世界上一切自由的海区，如果我们的军舰不能在我国公民侨居的地区和我国船只停泊的水域实现自己的和平目的，我们是不会满意的。"

土耳其按其本身利益当然赞成苏俄的建议，但是，许多中小国家却都赞成罗马尼亚的建议，以致争执甚久，相持不下。英国更是恼羞成怒，寇松蛮横霸道地指责土代表追随苏俄，一方面纠集法、意向土施加压力，一方面又与土举行单独密谈，许诺在其他问题上对土让步，以诱土在海峡问题上妥协。最后，土耳其权衡全局，做出让步，基本上满足了英国的要求。

（2）关于摩苏尔的归属问题。

摩苏尔为世界著名石油产地，对这样一个诱人的液体黄金聚宝盆，欧美列强自然均想染指。战前，英、德联合组织了"土耳其石油公司"，开采摩苏尔石油，其中德国占有25%的股份。德国战败后，在1920年国际联盟的圣勒莫会议上，英、法签订石油协定，规定英国占有摩苏尔，并由国联委任英国代管，法国则承接德国的全部石油股份。为此，美国于同年11月向英国提出抗议，指出：美国对于一切和约中代管权

的最后决定，确有参与的权利，凡未经美国政府同意的决定，将来美国概不承认。

在洛桑会议上，土耳其要求收回摩苏尔。英国坚持该地应脱离土耳其而划归英国委任统治下的伊拉克，以便继续控制该地。美国则主张自己也应分得一份摩苏尔石油，并于11月26日发表声明说：以前英、法、意三国所订的一切协定，其目的无非是在三国间分配势力范围，这种行为与美国经济平等的主张不符，列强均应承认“门户开放”的原则。

土耳其为了加强自己在谈判中的地位，利用协约国之间的矛盾，与美国达成协议，把摩苏尔石油的开采权让与美国，结果立即招致英、法的一致反对。老于世故的寇松见此状况，随即改变策略，抛开盟友法国，与美国代表秘密交涉，将原定给予法国的石油股份又许给了美国。这样一来，土耳其未能争取到美国的支持，摩苏尔的归属问题成了悬案。

(3) 关于外国在土耳其的特权和外债问题。

在洛桑会议上，土耳其代表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强烈要求废除帝国主义在土耳其享有的政治、经济和领事裁判权等一切特权，并要求取

消原奥斯曼帝国苏丹政府所借的一切外债。但是，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岂甘心就此放弃在土的既得利益？因而不但要求土耳其偿还原奥斯曼帝国的全部债务，而且在领事裁判权问题上提出了建立为期10年的所谓“过渡性制度”，实质上就是保留旧的特权。

由于与会各国在上述三个主要问题上争执不下，谈判破裂，会议于1923年2月4日中断。

休会60余天后，洛桑会议从1923年4月9日开始了第二阶段的讨论。会议一开始，英国为了孤立土耳其，就把苏俄代表排斥在外，并把巴尔干国家的代表，特别是希腊代表推向前台，蓄意扩大希土在会议上的矛盾和冲突，以便混水摸鱼。但土耳其代表仍继续坚持那些关系到国家独立的基本条件，如废除《色佛尔条约》，保全土耳其的基本领土等。经过3个多月的激烈争论，各方最后妥协，于1923年7月24日签订了《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土耳其和约》（简称《洛桑条约》或《洛桑和约》）及《黑海海峡公约》。

《黑海海峡公约》对海峡地位和管理制度的规定，基本上是以英国方案为蓝本的。公约规

定：(1) 平时或在战时土耳其保持中立的情况下，包括军舰和军用飞机在内的任何船只和飞机，“不分昼夜，不论悬挂任何国旗，有完全通航的自由，免除任何手续和捐费”；(2) 在土耳其参战的情况下，“中立国军舰有通过的完全自由”，交战国军舰的通航，则由土耳其政府自行决定；(3) 除土耳其在伊斯坦布尔驻兵1.2万人，保障该地与马尔马拉海的安全外，海峡地带不得设置其他任何武装力量；(4) 由本公约签字国组成“海峡委员会”，对公约的遵守情况实行监督。

公约的签订，从法律上把英国控制海峡的企图变成了“合法”事实，从而损害了土耳其的主权，也给黑海国家的安全造成威胁，因此苏俄拒绝了在公约上签字。

《洛桑条约》取代了先前苛刻的、掠夺性的《色佛尔条约》而成为协约国对土耳其的正式和约。其主要内容包括：

(1) 原奥斯曼帝国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属地，因实际上早已为协约国的英、法、意几家瓜分掉了，因而洛桑和约规定，土耳其宣布放弃埃及、突尼斯、摩洛哥、利比亚、多得坎尼群岛和塞浦

路斯；巴勒斯坦、叙利亚、外约旦、美索不达米亚（伊拉克）交由国际联盟委任他国管理；汉志（今沙特阿拉伯的大部分）成为独立国家。但和约基本上承认了土耳其本土的主权统一与领土完整，欧洲部分的东色雷斯和亚洲部分的伊兹密尔地区归还土耳其，亚美尼亚和库尔德斯坦等少数民族地区，仍归土耳其所有。但摩苏尔的归属却作为悬案，留待以后英、土双方谈判解决（根据1926年《英土协定》，土做了让步，把它划给英国委任统治下的伊拉克）。

（2）协约国军队撤出伊斯坦布尔。1923年10月2日起，协约国军队开始撤退，10月6日，土耳其国民军开入该城，至此取得了全国的统一。

（3）和约废除了外国在土耳其的领事裁判权和一切特权，废除了帝国主义对土的财政、关税的监督权。《洛桑和约》第28条规定："一切缔约国承认，所有在土耳其的各种特权，今后完全废止。"

（4）和约确认原奥斯曼帝国的外债，由其分裂出来的各国分担。土耳其偿还债务的主要部分，其他分裂出去的国家也各承担部分债务。

《洛桑和约》的签订，标志着土耳其人民反帝斗争的重大胜利。虽然土耳其在谈判过程中作做了一些让步，条约中也还为外国殖民势力保留了一些特权。但是，《洛桑条约》毕竟已与《色佛尔条约》不可同日而语了。前者使土耳其沦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成了任人宰割的附属国，后者却维护了土耳其主要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和不受侵犯，保证了土耳其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而进入国际政治舞台。尤其重要的是，作为"凡尔赛体系"一个组成部分的《色佛尔条约》被埋葬了，帝国主义者昔日得意洋洋地炮制了它，今天却被迫流着眼泪亲手撕掉它。这就宣告了凡尔赛体系已被打开了一个不小的缺口，帝国主义瓜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计划已开始遭到重大挫折。

黄金能把人的灵魂带入天堂。于是，贸易协定打开了欧洲紧闭的窗户

苏维埃俄国在用极大的代价争得国际国内的和平环境之后，开始面对恢复国民经济的严峻课题。由于连年战争的破坏，1920 年的工业

产量只有战前的14%，粮食总产量只有战前的49%。国内战争时期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采取的余粮收集制在战后已引起了农民的严重不满，工农联盟的纽带空前松弛。面对严峻的现实，1921年3月俄共举行了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重要决议，这是苏俄建立后对国家大政方针进行重大调整和转换路标的开始。

为了获得良好的国际环境，顺利地恢复和发展经济，苏俄必须主动调整外交政策，尽快摆脱在国际上的孤立局面，打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同尽可能多的国家恢复和发展经济贸易联系，并为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铺平道路。

苏俄的经济不景气，资本主义国家的日子也不好过。然而，比苏联更糟的是，他们十分缺乏发展经济的原料和将商品卖出去的销售市场。苏俄是一个资源大国，拥有十分丰富的原料，加之国大人众，因而也是一个巨大的销售市场，这对缺乏原料和市场的一些欧洲资本主义大国无疑有很大的吸引力，因而他们陆续暗送秋波，以期获得一些卢布来填充它们那空空的

钱袋。

最先同苏俄开展贸易谈判的是英国。一战后，英国经济一直在困境中挣扎，失业人数不断增长，从德国获得的赔偿，大都用于了失业救济。1920～1921 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对英国的打击特别沉重，工业生产下降 46%，对外贸易下降 50%，以致使以出口工业为主要支柱的整个经济面临着严重困难。面对日益增强的国际竞争，英国急需寻求广阔的市场。从历史上看，英、俄有着传统的贸易关系。一战前，英国所需木材的 50%、小麦的 20%，都是从俄国进口的。在英国的石油进口中，俄国的供应居于第一位。英、俄贸易量几乎等于英国与印度的贸易量。可见，英、俄贸易在英国的对外贸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对于英国来说，重新打开俄国市场，对缓和国内危机是十分必要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和英国报刊都明确表示，要恢复世界经济，就必须利用俄国的原料，必须吸引俄国参加恢复世界经济的工作。英国许多工商业家也希望尽快恢复英俄之间的贸易关系。英国政府内部，就关于同苏俄进行经济谈判的问题展开了辩

论。主张与苏俄进行贸易的劳合—乔治内阁占了上风，他以解决国内危机并进而以经济手段控制苏俄为理由，否定了张伯伦、寇松等人主张对苏俄进行新的武装干涉的观点。劳合—乔治声称：

“我们没有能用武力恢复俄国。我相信，我们能通过贸易做到这一点并挽救它。”

1920年4月，苏、英恢复贸易关系的谈判在伦敦开始了。在谈判中，苏俄代表克拉辛要求完全取消封锁，相互建立商务代表处，停止支持波兰进行反苏战争。英国代表则要求苏俄政府放弃“支持东方各国敌视英国的态度”，并承担沙皇政府的外债。

6月底，当红军向波兰军队反攻的时候，英国政府中断了谈判，借此向苏俄施加压力。10月，苏、波停战协定签订后，苏、英恢复谈判，并于1921年3月16日在伦敦签订了《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与大不列颠帝国通商协定及关于承认赔偿宣言》，即《临时贸易协定》。

协定的主要内容是：两国恢复贸易关系，互设商务代表处，商务代表享有外交特权；两国人

民可以自由地返回各自的祖国；双方保证放弃任何反对另一方的敌对行动和宣传。英国政府承诺，对属于苏俄的黄金、财产和商品，决不采取任何扣留的行为。苏俄政府则声明，对曾向俄国提供商品或劳务的私人，准备给予相应的补偿，但是，这些问题要在缔结一般性和约时才能解决。

英、苏贸易协定的签订，对苏俄来说，其意义是极其重大的，除了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外，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苏俄外交的重大胜利和帝国主义对苏俄的经济封锁失败的开始。还有，它意味着凡尔赛体系建立后，协约国集团的外交阵线第一次出现了重大裂痕，英国政府事实上已经承认了苏维埃俄国。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3月23日正式宣布，英苏协定是对苏维埃俄国事实上的承认，他说："因为我们需要俄国，而俄国也需要我们。"

苏俄与英国建立贸易关系，为与其他国家建立贸易关系开辟了道路，如同列宁所说，贸易协定打开了欧洲的窗户。这种情况立刻影响到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影响到它们之间的竞争的加剧，影响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对苏俄

的态度，它们被迫重新考虑各自对苏的外交立场和策略。

德国对苏、英贸易协定的签订非常不安。德国工业集团提心吊胆，生怕被挤出俄国市场。这时，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问题对德国来说特别迫切，因为根据凡尔赛条约，德国被剥夺了所有殖民地，它原有的市场大都被英、美、法、日等国占领了。在这种情况下，苏俄这个广阔的市场，对德国来说就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1921年5月6日，苏、德两国通过谈判签订了关于恢复贸易关系的临时协定，还签署了关于交换战俘和被扣人员的补充协定。根据协定，苏俄商务代办处是俄国驻德国唯一合法的代表机关，即实质上为外交代表机构，这说明了德国已在法律上承认苏俄迈出了一大步。

接着，1921年末和1922年初，苏俄同资本主义各国签订了一系列的新协定。1921年12月26日，苏俄同意大利签订了贸易协定。1922年上半年，苏俄又同挪威、奥地利、瑞典、捷克斯洛伐克、丹麦等国签订了临时贸易协定。

当时，苏俄政府也明确表示了同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国美国和法国建立贸易关系的意愿，

并不止一次地采取了积极的步骤，列宁在接见美国记者时说：

“让美国资本家不要触犯我们，我们是不会触犯他们的。我们甚至准备用黄金向他们购买用于运输和生产的机器、工具及其他东西。而且不仅用黄金买，还要用原料买。”

他明确表示，在两国建立正常的商务和外交关系中，“我们这方面没有什么障碍”。但是，财大气粗、以资本主义世界盟主自居的美国岂肯放下它那故作清高的臭架子？它提出了极其苛刻的条件，不仅要苏俄发还美国在俄国的企业、财产，而且天方夜谭般地要求苏俄恢复私有制，这实质上是堵住了一切和谈的大门。法国也跟着瞎起哄，反对同苏俄缔结任何经济协定，并坚持要苏俄偿还一切债务。

尽管少数资本主义大国仍不愿同苏俄缔结经济协定，但以苏、英贸易协定为契机，苏俄的对外贸易关系有了较快的发展。仅在苏俄开始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的第一年，即1921年，就有14个国家同苏俄恢复了贸易关系，它标志着帝国主义对苏俄经济封锁的长墙已开始倒塌，出现了巨大的缺口。

列强的两个敌手俄德在会外携起了友谊之手。这对它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921年，苏俄发生灾荒，全国有3000～4000万人处于饥饿状态。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企图借救济灾民为名控制苏俄。10月6日至8日，19个资本主义国家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了所谓"援助苏俄"的各国政府代表会议。会议建议各国政府，在苏俄承认沙俄帝国的外债并允许监督食品分配委员会入境的条件下，可以向苏俄提供救济贷款。

布鲁塞尔会议没有通知苏俄。苏俄政府面对苏、英贸易协定签订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虽先后同苏俄建立了贸易关系却不愿在外交上正式承认它的局面，早有进一步推进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正常化的打算。而此时又面对嗷嗷待哺的灾民，因而没有拘泥于外交礼仪，立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它于10月28日正式发表了一项《声明草案》，其中表示："苏维埃政府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同其他大国的经济合作作为自己政策的基本目的之一。它一向声称，外国资本家如

能帮助开发俄国的自然资源，恢复其经济，苏维埃政府愿意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利润。”“俄罗斯政府宣布它愿意对其它国家及其国民承认1914年以前沙皇政府所借的外债，”而还债的条件是，给俄罗斯政府以优惠条件和贷款；同苏俄缔结最终的全面和约；苏维埃政府得到其它大国的承认。声明还要求立即召开国际会议讨论苏俄和其他国家的相互要求。

苏俄的建议引起了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与国际舆论的兴趣与关注，英国和意大利马上表示赞同召开国际会议，还向苏俄政府索取建议的补充材料。劳合—乔治希望这次会议能有助于增强他的内阁的威望，保证他的党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获胜。英国政府希望以“大陆绥靖者”的身分出现，迫使苏俄屈服，并联合德国削弱法国在欧洲的地位。德国也很积极。

法国却态度冷淡。法、俄的贸易关系本来就没有英、俄那样密切。但是，法国也担心，对苏俄的不妥协态度可能会导致自己的孤立和失去俄国的市场。1921年底，法国总理白里安在访问华盛顿回国途中，在伦敦与劳合—乔治会面。劳合—乔治向他介绍了拟向苏俄和德国提供机

会推销英国商品的设想。他还提到要举行一次有苏俄和德国参加的欧洲会议。他向法国保证，英国在德国侵略法国时将援助法国。法国这才表示愿意参加将于1922年1月6日在法国戛纳召开的协约国最高委员会会议，讨论召开欧洲经济会议的问题。

1922年1月6日，协约国为了协调彼此的行动，在法国戛纳召开了最高委员会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英国的劳合—乔治、法国的白里安、意大利的波诺米、比利时的特尼斯和日本的石井，美国仅派加维作为观察员参加了会议。德国代表也应邀出席。

戛纳会议通过了准备在意大利热那亚召开"欧洲国家经济会议"的决议，并邀请苏俄和德国参加。会议提出了6项条件，其主要内容是：任何国家均不得将本国的所有制、国家经济生活和管理制度强加给别国；外国资本、外侨财产及其权利和利润应保证不受侵犯；凡希望得到外国贷款的政府，应明确宣布承认其一切债务，承认归还一切属于外国人的财产或补偿外国人因财产被没收所蒙受的损失；保证财政货币流通，以利贸易往来；不得进行敌视别国的宣传；

各国保证不对邻国发动进攻。

随后，意大利政府受协约国最高会议委托向各国发出了邀请书。1922年1月7日，意大利政府通过苏俄驻罗马贸易代表团将一项决议通知莫斯科。决议写道："意大利政府经与不列颠政府磋商，认为列宁先生如能亲自出席这次会议，将大大有助于解决振兴欧洲经济的问题。"

尽管戛纳决议还有附加条件，但苏俄第一次被邀请参加国际会议，表明西方国家在事实上已承认了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并且，它们为了解决自身存在的深刻矛盾，不得不正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和两种所有制同时存在的事实，不得不和苏维埃代表坐在一起讨论欧洲的经济恢复问题。

1922年1月8日，苏俄政府决定与会，并发出表示接受邀请的复照，复文说："即使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因工作繁忙，特别是因国内发生饥荒而不能离开俄国，但代表团的人选和它的职权范围，都将使代表团具有列宁先生亲自参加的那种威望。"

列宁提出为排除帝国主义支持白匪代表参

加会议的可能，必须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统一战线。1922年2月22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主持的俄罗斯、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布哈拉、格鲁吉亚、乌克兰、花拉子模和远东共和国等9个苏维埃共和国的全权代表会议。会议签署了一项协定，授权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在热那亚会议上保护其它8国的利益，有权代表它们缔结或签订会议上可能达成的一切协议。

列宁十分重视热那亚会议，他领导了出席会议的全部准备工作，亲自为苏俄代表团制定了参加会议的方针和策略。他把出席热那亚会议看做是实行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原则的一项重大实践活动，看成是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打破帝国主义反苏营垒的一次极好机会。列宁分析了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大国与小国之间，好战派与和平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对不同类型的国家与人物采取不同的策略。在会上，既要抵制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又要充分注意到各国人民对普遍和平的强烈愿望。因此，列宁建议，要在会上阐明最广泛的热爱和平的纲领，支持和平主义者。

当时，各资本主义国家按其对热那亚会议的态度，可区分为3派。第一派是协约国中的英、法等大国。它们企图通过会议达到从经济上奴役苏俄的目的。他们成立了一个由大国代表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在伦敦炮制了一份“复兴俄国”的纲领，它实际上是戛纳纲领的具体化，如要求苏俄偿还180亿金卢布，赔偿被没收的外国企业损失，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等等。但是帝国主义的反苏统一战线也不牢固，它们各怀私利，分歧很大。英国期望同苏俄扩大经济关系，法国则坚持要求苏俄偿还一切债务，并威胁苏俄，如不承认戛纳决议，就进行新的武装干涉。第二派是协约国中的中小国家及战败国。它们希望会议成功，好与苏俄发展贸易关系。特别是德国，它期望能加强苏、德关系以抵抗凡尔赛和约的压力。第三派主要是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他们大多是资产阶级的名流、政客以及第二国际的头面人物。他们主张恢复国际间的自由贸易，取消一切债务，以缓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希望会议通过几项和平主义的建议。这一派人物在公众中有较大影响。

根据上述情况，列宁提出如下具体的策略：

首先，苏俄出席热那亚会议的代表团，应争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应提出带有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色彩的纲领，应建议普遍裁军、禁止使用毒气等。列宁认为苏俄参加会议的政治任务之一，就是要使资产阶级阵营中和平主义这一翼从他们整个阵营中分化出来，希望同他们不仅达成贸易协定而且达成政治协议。

其次，在对待协约国的戛纳条款上，应利用英、法的不同态度加以拒绝。法国坚持要苏俄在会前承认戛纳条款，而英国认为不必以此作为参加会议的先决条件。但对第一条条款，即关于任何国家均不得将本国的所有制、国内经济生活体系及管理制度强加于别国的提法，则可为我所用，以解释成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但要回避对条款的承认。如协约国提出最后通牒，应提出，苏俄可以新债还旧债，但协约国必须赔偿外国武装干涉给苏俄造成的损失。关于新经济政策方面，列宁指出，可以对资本家再做让步，给他们租让优先权，但原则必须是不能有损于苏维埃俄国的主权。

再次，在对待德国的问题上，列宁认为，德国是一战的战败国，但同时又是一个经济发达

的大国，它不会甘心于战败国的地位，一定会摆脱凡尔赛体系的束缚。因此，同德国签订某种协议，以便打破帝国主义对苏俄的封锁，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最后，列宁还指出，苏俄始终要抓住国际贸易这一张牌，以不变应万变。他说："我们不是以共产党人的身分，而是以商人的身分到热那亚去。"我们与资本主义国家有通商做生意的绝对必要。我们要在会议里，研究那些交易买卖具有最公平、最有利的条件。我们希望做有利于我们的生意，资产阶级希望做有利于他们的生意，"至于斗争将怎样展开，这就要看我们外交人员的艺术了"。列宁在最冷静最谨慎地估计热那亚会议所具有的各种可能性后说，如果在会上达不到目的，"那就在会外达到这一点"。列宁为代表团制定的方针和策略充分体现了苏维埃外交政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3 月底，苏维埃代表团在赴热那亚途中来到里加，同拉脱维亚、波兰和爱沙尼亚举行了会谈，缔结了经济合作和共同安全的协定。当时四国还宣称将在热那亚会议上采取一致行动，这就打击了法国妄图拉拢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建立

反苏联盟的计划。4月初，苏维埃代表团抵达柏林，又同德国总理维尔特和外长拉特瑙就两国关系问题进行了会谈，双方相互保证在热那亚会议上保持密切的接触。

1922年4月10日，欧洲经济会议在热那亚圣乔治宫开幕。出席会议的有29个欧洲国家，加上英国的自治领共34国，与会的代表和专家共计2000人。许多大银行、大石油公司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外长巴都、意大利总理法克塔、德国总理维尔特都亲自出马担任首席代表。美国拒绝正式参加会议，只派驻意大使蔡尔德以观察员身分参加会议。苏俄代表团团长是列宁，副团长是契切林。由于估计到国际反动派可能进行暗杀列宁的活动，因此列宁没有出席会议。但任命列宁为团长一事，充分表明了苏俄对参加的第一个国际会议的重视。

会议开始后，由东道国意大利总理法克塔致开幕词。他说：与会国家中，没有敌人，也没有朋友，没有战胜国，也没有战败国。劳合—乔治宣称与会者是平等的。

但是，就在他们两人发言的后半部分中，就

已明显暴露出了与会大国之间的尖锐矛盾。法克塔强调，这次会议是根据戛纳决议召开的，凡来参加会议的国家，就表明已接受了戛纳决议的条件。劳合—乔治补充说，与会各国的平等是以各国接受同等条件，即戛纳条件为原则的。这种会议基调，明显是对苏俄代表团施加压力。苏俄代表团只准备把戛纳决议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事实上，协约国邀请苏俄参加会议时，并未明确要求正式承认戛纳条件，而苏俄在复照中也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

法国外长巴都在发言中除支持意、英代表关于戛纳决议的立场外，还明确表示，法国不允许对任何一项凡尔赛协定进行讨论，并声称："热那亚会议不是、不可能是、将来也不会是讨论和修正现存条约的上诉机构。"这是对德国代表团准备在会上提出修改凡尔赛条约要求的事先警告。

德国总理维尔特在会上陈述了德国的严重困难，表示希望获得国际的援助。他间接地但十分明确地批评了战胜国的政策，他说，各战胜国是在力图损害邻国的幸福以增进自己的幸福。

苏俄代表团副团长契切林的发言成了会议

的注意焦点。他在演说时宣称："俄国代表团来这里，不是为了宣传自己的理论观点，"而是"为了和平，为了共同恢复被长期战争和战后的政治破坏了的欧洲经济。……为要在互惠、平等和完全的无条件的承认的基础上与各国政府及工商界人士建立事务性联系"。他说：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有可能并存，它们之间的经济合作，对于普遍的经济复兴是绝对必要的。而作为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欧洲最大的一个国家，俄国经济的复兴是世界经济普遍恢复必不可少的条件。他表示苏俄政府准备提供森林、煤炭和矿产开采的租借权，来扩大欧洲工业的原料、粮食和燃料基地。鉴于战争威胁和军备竞赛已使人民群众更加贫困，并成为欧洲复兴的主要障碍，他还建议普遍裁减各国军备和军队，禁止使用野蛮的作战方法——施放毒瓦斯和使用反对和平居民的破坏手段。

契切林的发言突破了协约国列强给会议规定的框框，法国外长巴都立即发言反对讨论裁军问题，声称苏俄的建议超出了会议的议事范围，与经济问题似乎无多大关系，是否走得太远了一点。他进一步威胁说，裁军问题对他来说，

是“坚决不应予以考虑的”，如果俄国代表团坚持要求讨论这个问题，法国代表团“不仅是抑制，而且是明确、断然、彻底、坚决的拒绝”。劳合—乔治称契切林的建议是“危险的爆炸物”，他说，“不要使船只超重”，要求苏俄代表团不要坚持把裁军问题列入议程。

从4月11日起，会议分成4个委员会，即政治、经济、财政、运输委员会，分别讨论具体问题。其中政治委员会争论最为激烈。

在该委员会上，西方各国要求苏俄偿还全部外债，即战前与战时沙皇政府、临时政府、其它反革命政权及一切地方机关所欠的债务总数为180亿卢布，其中战前债务为90至100亿卢布，战债80至90亿卢布。苏俄政府认为，战债是沙皇、临时政府及反革命政府为进行大战和内战而借的，一律不还。在大战中，俄国与协约国共同作战，生命、财产所受损失甚重，苏俄并未索取分文赔款，所以更无理由偿付战债。至于战前债务问题，苏俄代表表示可以通过谈判解决。苏俄代表团在债务问题上还针锋相对地提出反要求：协约国要赔偿武装干涉给苏俄造成的损失。苏俄的备忘录指出，“俄国在农业、工

业、矿业、运输业，以及协约国的经济封锁、武装干涉及国内战争所蒙受的损失总计约390.4497亿金卢布。”这样，就回击了西方各国在债务问题上咄咄逼人的态度。

关于收归苏俄国有的外国企业的财产问题。西方各国要求发还被没收的外国企业和财产，并赔偿十月革命后外国资本家受到的一切损失和苏维埃政府及过去历届政府或地方当局因其行动或疏忽所造成的一切损失。苏俄认为，这些企业是苏俄的全民财产，发还这些企业将直接损害苏俄的国家主权。此外，西方各国还要求苏俄放弃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让外国资本家在苏俄境内自由进行贸易；给旅居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外侨以类似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所享有的治外法权。苏俄代表坚决拒绝了这一要求，表示决心捍卫经济独立和国家主权。

4月14日，英、法、意、比、俄5国代表举行秘密会晤。英国表示可以同意取消战债，但要求苏俄放弃反建议，即偿还战前债务和采用租让制，实际上仍是要求发还被没收的外国企业。法国仍坚持要苏俄偿还一切债务。4月15日，英国支持法国向苏俄提出最后通牒，声言如

不接受协约国建议，会议只好就此结束。至此会议陷入僵局。苏俄代表看清了帝国主义召开热那亚会议的动机，便转向会外活动，重点是加强对德工作，以取得在会外突破的成果，打破帝国主义的反苏联盟。

早在热那亚会议之前，列宁就曾考虑过“以给德国克虏伯及相似的德国托拉斯以经济特权的方法，从而将德国从西方国家阵营中拉到俄国一边来。”

本来，德国资产阶级是仇视苏维埃俄国的，如果当时在修改凡尔赛和约问题上对它让步，它就准备参加反苏活动。但这种要求刚一提出就因遭到迎头痛击而化为泡影。更使德国统治集团非常恼怒的是，英、法等国不仅未加考虑便一口回绝了它减少赔款的要求，而且专家委员会还在备忘录中承认俄国有权得到德国的赔款。既然德国在苏俄与各战胜国之间随机应变、骑墙观望的政策未给德国政府带来预期的效果，那么为了避免全盘皆输、一无所获，在俄国主动发出友好的信号后，德国不得不转而认真考虑苏俄牌了。更为重要的是，苏维埃俄国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因素了，这一点是德国

不能不考虑的。苏俄的巩固使德国领导人相信，它是不会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压力面前俯首称臣的。同时，与苏俄关系的正常化无疑会改善德国的国际地位，增加它与协约国集团讨价还价的筹码和多一条退路。还有，与苏俄的经济联系对德国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苏俄市场的容量大和距离近对德国工商界有很大的好处。在1914年以前，德国出口商品的1/8是输往俄国的；而它自己所需的进口粮食则几乎全部是从俄国输入。因此，德国工商界自然不愿意英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成为苏俄贸易的主要对象，而希望由自己来扮演这个角色。

鉴于以上形势和考虑，德国代表、外交部俄国司司长马尔赞便于4月15日上午约请苏俄代表拉科夫斯基及越飞会面，询问俄国是否有意继续在柏林中止的谈判。苏俄代表予以肯定的回答。当夜，越飞打电话给马尔赞，邀请德方次日会谈。4月16日，苏俄代表团与德国代表团在热那亚近郊的拉巴洛举行会谈，并在当天由契切林和德国外长拉特瑙签订了《德国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协定》，即《拉巴洛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如下：

（1）苏维埃俄国和德国相互放弃关于赔偿战费、赔偿由于在战区内的军事措施（包括在对方领土内的征用）而对另一方及其平民造成的损失的要求。双方互相放弃偿还战俘费用的要求。这就意味着，德国正式放弃了1918年11月13日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废止的布列斯特和约的条件。苏俄方面则放弃了俄国根据凡尔赛和约应从德国获得的赔款。

（2）德国放弃它在俄国因苏俄的国有化政策而被没收的财产（国家的或私人的）的要求，但苏俄也不得满足第三方同类性质的要求。

（3）两国立即恢复外交、领事关系。

（4）苏维埃俄国和德国同意根据互利原则全面调整彼此的商务和经济关系，互给最惠国待遇。两国政府应以友善的精神对待两国的经济要求。

拉巴洛条约的签订对帝国主义者推行的孤立苏俄的政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标志着苏俄对外政策的重大胜利，它使苏俄的国际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德国不顾许多国家不承认苏俄的阴谋而同苏俄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个事实既说明了俄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威信和份量

已有进一步提高，又证明了帝国主义国家从凡尔赛体系起、中经华盛顿体系所苦心经营的反苏统一战线再次受到沉重打击，它们企图以损害苏俄来复兴欧洲的计划也破产了。

另一方面，拉巴洛条约创立了以和平共处原则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既证明了苏俄的和平共处外交路线是合理和可行的，也给协约国集团对苏俄的外交路线的非难和应付将了一军。条约的签订也使德国在国际上摆脱了孤立状态，并促进了它的主权的恢复。这是《凡尔赛条约》后德国同一个大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苏俄作为第一个大国在战后承认了德国的平等地位。

最后，拉巴洛条约为苏、德两国密切经济往来和正常外交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保证，列宁评价指出："当全世界还没有摆脱私有制及其产生的经济紊乱和战争而走向更高级的所有制的时候，只有拉巴洛条约体现了两种所有制真正平等。"它在经济方面立即产生了良好的效益：1922年，德国对苏俄的出口量增加了1倍多，而进口量则增加了13倍多。该年苏俄对德国的出口量也占了苏俄出口总额的18%以上。

《拉巴洛条约》的签订在帝国主义集团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他们对这个条约大肆攻击。帝国主义者诬蔑这个条约是对欧洲合作和复兴事业的“打击”，而且似乎“破坏”了会议，等等。他们根据这种捏造的“理由”，要求废除该条约。4月18日，英、法、意等国联合照会德国，谴责它对协约国不忠实，违反了戛纳决议，“背着别国外交家同俄国秘密签订条约”，不准其再参加热那亚会议的政治委员会，并令德国交出条约的正式文本备查。德国代表团经与苏俄代表团磋商后，于4月21日对照会做了答复，称拉巴洛条约并不影响其它国家对苏俄的关系。4月23日，协约国再次照会德国，声称“德俄条约中，凡与现存条约相抵触之条款，各国政府均有权视为无效”。

苏俄代表团于4月20日致函劳合—乔治，同意做若干让步，撤回反要求，表示愿意偿还战前债务，并准备用租让制满足外国原业主的要求，其条件是取消战债，给予苏俄财政援助，并在法律上承认苏维埃政府。5月2日，协约国向苏俄代表团递交了一份新的备忘录，内容是：苏维埃政府要承认除战时债务以外的全部债务；

对收归国有的外国资本家的企业和财产应归还给原业主或给予补偿。对苏俄的要求却避而不谈。5 月 11 日，苏俄代表团在答复中指出：苏维埃政府在法律上没有义务偿还已被推翻的以前历届政府的债务，并拒绝把由于革命而收归国有的企业和财产发还原业主或赔偿他们的损失，但如果协约国做出相当的对俄国人民有利的让步，苏俄政府也愿意做出重大让步。对此，西方国家没有答复。

由于帝国主义坚持在经济上奴役苏俄的计划，历时 40 天的热那亚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协议。1922 年 5 月 19 日，第三次全体大会宣布会议暂时结束。当时曾通过与此相关的一项决议，规定在最近期间内，作为讨论“俄罗斯问题”的专家委员会在荷兰海牙继续开会。

海牙会议于 1922 年 6 月 15 日开始至 7 月 20 日结束。它被认为是热那亚会议的继续，因为这个会议的议程和所要审议的问题是热那亚会议曾经讨论过的。

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这一次又采取了某些措施。劳合—乔治和法国新任总理普恩加来商定：会议是咨询性质的，参加会议的将不是

全权代表，而是些专家，他们的任务是向各国政府草拟报告。关于经济协定的问题则由各国政府自己解决。由此可见，发起召开会议的各国政府已为自己保留了行动自由的余地。

除德国外，所有出席热那亚会议的国家都被邀请参加海牙会议，但冰岛未派代表参加。美国对海牙会议的态度基本上与对热那亚会议的态度相同。它表面上拒绝参加会议，但它的代表却戴着“观察员”的假面具积极干涉会议的事务。

参加海牙会议的各帝国主义国家的主要目的，如同过去一样，是要迫使苏俄归还十月革命前属于外国资本家的企业和一切其它财产。关于偿付已被推翻的政府的债务问题也仍旧留在议程上。

尽管早在会议开幕前，帝国主义者就已经商量好要采取一致行动，并在苏维埃代表团到达前10天即集会商讨对策，但它们仍因利害冲突太大而陷入了无休止的争论之中。加之苏俄代表坚持在热那亚会议上的立场，帝国主义的掠夺计划仍旧不能实现，于是海牙会议同样以毫无结果而散伙。

热那亚会议与海牙会议虽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但它的召开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一向受蔑视、被视为洪水猛兽的苏维埃政府被邀请与会，作为平等的一员同诸大国坐在一起，这一事件本身就意味着对苏维埃政府事实上的承认。苏俄代表团在国际会议上初试锋芒，就取得了外交的重大胜利。它利用国际讲坛大力宣传了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及各项纲领，对国际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苏俄外交巧妙地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坚定、灵活的外交手段，突破了帝国主义的反苏俄营垒，成功地签订了拉巴洛条约，获得了第一个西方大国的承认，摆脱了建国以来的严重孤立困境，为苏俄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发展贸易往来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苏俄代表在会议上执行了列宁英明的对外政策，粉碎了帝国主义国家建立统一战线的阴谋，捍卫了苏俄的主权，保护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对外贸易垄断制。苏俄再一次明确地表示，对它是不能用命令和威胁的口吻说话的，而且为了资本主义各国自身的利益，它们需要与苏俄建立外交关系和广泛的商务联系，

骑墙观望和封锁孤立的政策是损人不利己的，因而是既不明智又行不通的。这样，苏俄同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从此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共处时期。

到了1924年，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在国际上出现了“承认苏联之年”

本来，热那亚会议和海牙会议已使帝国主义者焦头烂额、郁郁寡欢。然而，当失败的阴影尚未从它们的头上完全散去之时，更沉重的打击却又接踵而至了。1924年，国际形势出现了戏剧性的，对帝国主义集团更加不利的局面，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年，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范围内，有12个国家承认了苏联，国际上出现了“同苏联建交热”。1924年也就因其乃“承认苏联之年”而作为一个闪光的数字被嵌入了国际关系新年轮。

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不是偶然的。首先，苏维埃政权认为在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后，为了发展经济，加强国防，必须把俄国境内

的各个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1922年10月，俄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列宁的建议：把各苏维埃共和国自愿平等地联合成一个新国家。

1922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大会通过了苏联成立宣言和联盟公约，宣布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和高加索联邦4个加盟共和国第一批加入苏联。大会选出了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1924年1月，苏联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批准了苏联宪法，把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形式固定了下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立，进一步稳定了国内政局，提高了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威望。西方的一些资产阶级政客明白，继续推行遏制苏联的政策，将是十分不得人心的。英国的麦克唐纳和法国的赫里欧都以“同苏联建交”、“同苏联友好”的口号来争取公众的支持。斯大林曾风趣地说：“欧洲某些当权者，竭力把自己的官运建立在同苏联的‘友好’上……这正表明苏维埃政权在资本主义国家广大群众中是真正有声望的。”

苏联成立时，国民经济已经恢复，开始走上

了大规模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轨道，需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贸易往来，而正处在战后恢复阶段的资本主义各国也需要苏联的广阔市场和丰富的原料。列宁指出："经济关系和随之而来的外交关系正在改善，应该改善。凡是反对这样做的国家，都有落在别人后面的危险，也许会在某些相当重要的问题上陷于不利的地位。"但发展贸易必须有政治基础来保障，所以各国纷纷与苏联建交。

此外，苏联在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中，采取了较灵活的政策，对待非原则问题善于妥协退让，对于一些历史上的遗留问题则予以妥善解决，使之不致妨碍双边关系的发展。

1924 年，第一个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的是英国。苏、英的建交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路程。英国本来是同苏俄建立贸易关系最早的资本主义大国，但在热那亚会议之后，由于《拉巴洛条约》的签订，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德国率先在外交上承认苏俄并与之建立了密切的经济联系，两国贸易额大幅度增长。这种情况引起了英国严重不安。英国为了加强同苏联的经济贸易关系，必须调整对苏政策，实现两国之间外交关系的

正常化。1924年1月，麦克唐纳工党政府在“承认苏联”等竞选口号下上台。他表示：“在外交上拒绝承认某一民族的结果，就是拒绝与某一民族通商。这是一个代价太高的瘋狂政策。”麦氏公开声明，必须彻底改变英国的对苏政策。但他上台之后，在同苏联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却又主张有条件地承认苏联，表示要恪守英国对外政策的“继承性”。他说：“我们不是一届新政府，我们将是一届遵循我国外交活动中那些传统的历史原则的工党政府。”

1924年1月12日麦克唐纳写信给苏联驻英国正式代表，建议苏联政府在建交之前承认英国的部分要求，如偿还沙俄和临时政府的债务等。苏方在复函中拒绝了他的要求，但表示在建交之后可以讨论有争议的问题。

1924年2月1日，英国政府宣布在法律上承认苏联，并向苏联政府递交了通知书，但同时提出了重要的保留条件。通知书说，英国政府“承认苏联为过去属于前俄罗斯帝国而目前在苏联管辖之下的领土上的法律上的政府”。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如果有任何一个地区不承认苏联政府的权力，英国也将不承认苏联对原俄国

的这块地区的管辖权。同时通知书又说："承认俄国苏维埃政府，将使两国在俄国革命前签订的所有条约自动生效，已失去法律效力者不在此例。"这是企图强迫苏俄接受已被它宣布废除的、沙皇政府签订的掠夺性条约。

苏联政府为尽快实现同英国外交关系的正常化，采取了既维护苏联的根本利益，又避免同英国进行无休止争论的灵活策略，对英国的保留条件提出了自己的解释。2月8日，苏联政府在复照中，对英国在法律上承认苏联政府表示满意，但特别强调指出，"苏联的政权已在原俄罗斯帝国全部领土上普遍建立，经苏联政府同意分离出去并成为独立国家的地区除外。"这一解释就从根本上维护了苏联的领土和主权。复照还指出，它愿意以友好的方式讨论和解决由于承认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全部问题，"建议就已经废止的或因战后事态的发展而失去法律效力的旧条约达成一项协议"，这就巧妙地否认了两国间过去的所有条约"自动生效"的说法。

苏、英关于英国在法律上承认苏联和解决悬案的换文，标志着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为进一步发展和扩大苏、英之间的经济交流开辟了

良好前景。

1924年4月14日，在伦敦举行了苏、英会谈。在谈判中，苏联代表表示：如果英国政府保证提供长期贷款，苏联准备偿还一些战前的债务，并对财产被收归国有的英国企业主提供租让权，以资补偿。但英国代表团却要求苏联无条件承认前俄国历届政府的一切债务，并赔偿英国资本家由于被收归国有的企业和财产而造成的损失。在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英国工党政府受到本国工人阶级的强烈谴责，英国工商界人士也都要求顺利地完成谈判。这样，英国代表团不得不做出让步，在8月8日与苏联签订了两个条约，即一般性条约和苏、英贸易条约。苏联政府同意，在英国提供贷款的条件下，部分地满足英国债权人对战前债务的要求；英国承认苏联对外贸易的垄断制；双方在贸易上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关于沙皇和临时政府向英国的借款与苏联就外国武装干涉造成的损失提出的要求，两者被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是彼此抵销了。但是，由于英国国内敌视苏联势力的反对和美国从中作梗，以致工党麦克唐纳政府下台后，保守党鲍德温政府拒绝批准已签订的条约。这

样，上述两个条约在实际上从未生效。

但是，苏、英建交揭开了“承认苏联之年”的序幕。1924年2月至3月，意大利、挪威、希腊、奥地利和瑞典等也相继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6月，丹麦与苏联建交。7月15日，法国向苏联发出照会，拟在短期内同苏恢复正常外交关系。但由于国内反苏势力及美国的阻挠，直到10月28日法国才同苏联建交。1925年1月，日本也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到这时，已有22个资本主义国家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在资本主义大国中，只有美国冥顽不化，仍然对苏联采取不承认政策。

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表明帝国主义在军事上、经济上扼杀苏联和在外交上孤立苏联的政策彻底破产了。这一结局的出现对两者都意味着些什么呢？

对苏联而言，回想从十月革命至今，先是经历了帝国主义的联合武装干涉，继则又遭到经济封锁，随之而来的又是政治孤立，可谓历尽艰辛，多灾多难。然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并没有在空前的内忧外患的重压下崩溃。它忍辱负重、委屈求全、励精图治，终于在帝国主义的严密火

网中杀开了一条血路，使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巍然屹立于北半球的东方。从此，闪烁于涅瓦河畔的星星之火，日益燃成熊熊火炬，它不仅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俄国人民奋勇前进、继往开来，而且像一个不灭的灯塔，照亮了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前进道路，指引着他们在求生存、得解放的奋斗征途上昂首阔步、一往无前。尽管前进的路途难免风云变幻、坷坷坎坎，然而坚冰既已打破、航船开始起锚、社会主义的航船终将冲过险滩急流而驶入人类文明的大海汪洋。

对帝国主义国家而言，这种局面则是令人伤感的。一战的硝烟尚未散尽，争霸的热战却又开场。社会主义的苏俄的存在和发展，对于所有帝国主义霸权者来说，都是一个障碍和威胁，因而是不能容忍的，必欲去之方心安。因此，从巴黎到华盛顿，从热那亚到海牙，他们可谓机关算尽，招术用绝，先是明目张胆的武装围剿，继而又在谈判桌上威逼利诱。打打谈谈，谈谈打打，以打促谈、软硬兼施、恩威并济，无所不用其极。然而，尽管他们煞费苦心，建立了一个争霸世界、遏制革命的天罗地网般的凡尔赛—华盛顿

体系，并将主要矛头和打击力量指向他们眼中的强敌和“乱源”的社会主义苏俄，却总是力不从心，连连败北。尽管他们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道对付革命的防波堤和长墙不断添砖加瓦、修修补补，然而这道长墙却总是摇摇晃晃，以致于全线倒塌。到头来，协约国集团甚至不得不改弦更张、放下屠刀而主动与苏俄言和。也许，他们尽可以装出一副宽大为本、慈悲为怀或言不由衷、迫不得已的苦相，尽可以高唱曲线救国，拯救苍生的论调，并挤出几许凯旋而还的微笑，然而，面对凡—华体系落花流水春去也的不幸结局，他们在慨叹天不助我、人不逢时之余，果真就不会向隅而泣吗？

英、法、美三国，本是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支柱。然而，敌国既已不存，盟友岂能再相安无事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建立后的世界形势，从战胜国帝国主义的矛盾来看，主要表现为英美矛盾和英、法对立。

英美对立是世界性的，它取代了战前的英、

德对立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主要矛盾。一战后，英、美矛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海上霸权之争；二是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斗争。由于在华盛顿会议上缔结了《五国海军协定》，英、美之间的海军对比关系暂时得到调整。此后，英、美之间的经济竞争显得更加突出了。

在争夺原料产地、商品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的斗争中，英美矛盾重重，它们在全世界展开了激烈的角逐。美国为了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加紧向英国的势力范围渗透。一战结束时，美国在国外所控制的石油资源还非常有限。以后，美国垄断资本加紧排挤英国和荷兰资本，大规模渗入中东、印度尼西亚及委内瑞拉等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石油产地。1925 年，在美国国务卿休斯的干预之下，7 个美国石油公司在未来的伊拉克石油开发中得到 1/4 的股份，打破了英国对中东石油资源的垄断。

在战后的头 10 年中，美国依仗其经济上的优势地位，极力扩大对外贸易，它的主要竞争对手英国的商品到处受到强烈冲击和排挤。到 1929 年，美国对外贸易总额比战前增长了 110%。1913～1929 年，美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比

重从11.1%上升到14%，而原来占国际贸易第一位的英国则由15.1%减少到13.2%。1929年，美国第一次夺得了资本主义世界贸易的头把交椅。这时，美国在加拿大和拉丁美洲各国的对外贸易中占有绝对优势。1929年，在拉美的20个国家的进出口总额中，美国的份额分别达到38.7%和34%，把英国远远抛在后面。同时，美国商品还进一步打入欧洲和亚洲各国。还有更损的一招是，美国除了直接推销商品之外，还采取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设厂的方式，就地生产和销售。1924～1929年，美国的汽车、石油、电器等工业部门打入了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这就进一步排挤了英国的商品销售市场。

英、美在资本输出方面的竞争更加激烈。战后，美国的资本输出发展很快。1919年，美国垄断资本在国外的投资额是70亿美元，到1929年猛增到172亿美元。但这时，仍稍低于英国，而居世界第二位。这一时期，美国资本输出主要方向是德国及拉丁美洲各国。1929年，在德国的长期外国投资中，美国占20%，居垄断地位。在拉丁美洲，1913～1927年，美国资本由12.4

亿美元增加到55.9亿美元，已接近英国在该地区的投资总和，而在中美洲各国已经超过了英国。

英、美的经济竞争实质上是世界霸权之争。早在大战期间，美国一家报纸就公开声称，“要想称霸世界需要两件东西：美元和银行。美元我们有的是，因而我们要建立银行，要称霸世界。”

英、法矛盾是战后欧洲动乱的根源，它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对欧洲国际关系处于支配地位。早在巴黎和会上，英、法的裂痕就已暴露出来，这突出的表现为两国在欧洲问题上不同政策的对立。英国执行的是“均势政策”，而法国奉行的则是“安全政策”。这种政策冲突有其深刻原因。英、法虽是战时盟国，并联合打败了德国，但由于两国作战的目的各异，所以在研究处置德国的时候，它们便很快地分手了。法国要树立欧洲大陆霸权，它在“安全”的旗号下，欲占领德国莱茵河以西的土地，并对德国进行种种限制，使之处于一蹶不振、永世不得翻身的地位。英国所关切的是消灭德国在商业上与海军方面的竞争力量，掠夺德国的殖民地，但是，英国不愿看到欧洲大陆上出现一强独霸的局面。

这两个目标当然是针锋相对的。

1919 年 3 月 27 日，英、法、美三国首脑在巴黎和会上，就法国为了安全的需要企图肢解德国的问题，进行了激烈辩论。威尔逊支持劳合—乔治对德国应表示温和的意见。克里孟梭反驳说："美国在遥远的地方，并受到大洋的保护；而英国，即使拿破仑也无法达到。你们两国是有保护的，而我们没有。"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劳合—乔治和威尔逊向克里孟梭建议，如果法国放弃对莱茵河左岸的领土要求，英国和美国就分别与法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以共同保证法国的边界安全。这两个条约后来成为凡尔赛和约的附约，并于和约一起在 1919 年 6 月 28 日签字。这两个条约规定，在法国边界无端受到德国的侵略时，英、美两国应立即向法国提供军事援助。但条约有一个附加条件：如果这两个条约中有一个未获批准，另一个也无效。后来，美国参议院否决了凡尔赛和约，这样，作为该和约附约的法、美条约也跟着遭殃，失去了效力。法英条约自然也就失效了。于是，英国也摆脱了对法国安全的保证。

在保证条约失效的情况下，法国为了巩固

自身的安全和建立欧洲霸权，采取了广泛联络大陆上各小国的结盟政策，以防止德国重新侵略。1920年1月28日，法国与比利时就缔结军事同盟问题举行会谈。比利时为避免过分依赖法国，要求英国也参加。但是，英国不愿意参加任何有利于增强法国在欧洲大陆地位的协定。1920年9月7日，该协定正式签字。协定规定，在任何一方无端受到侵略时，另一方将出兵援助。这标志着法、比军事同盟的形成。1921年2月19日，法国又与波兰缔结了同盟条约。条约规定，两国在外交方面将采取一致行动；如任何一方蒙受第三国的无端侵犯时，则其他一国应出兵相助，借以维护彼此的领土和正当的利益。后来，两国又签订了经济协定，规定在彼此的贸易中，征收互惠的低度关税，法国给波兰4亿法郎的巨额援助。1924年1月25日，法国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同盟条约。条约规定，凡一切与彼此的安全与和平有关的外交政策问题，必须在互相咨询之后方得采用；当彼此的利益受到威胁时，双方应采用一种协同的步骤；在德、奥企图合并时，缔约国应设法予以对付。此后，法国在1926年又与罗马尼亚签订了法罗同

盟，1927 年与南斯拉夫签订了法南同盟。

在欧洲中部，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之间的关系也趋于紧张。捷克人同匈牙利人和波兰人的关系已紧张起来。巴尔干各国也在相互争斗。英、法两国竞相争夺在欧洲、巴尔干和近东的霸权。法国和德国之间、意大利和法国之间的仇恨日益加深。这些矛盾动摇了凡尔赛体系。为了保存和巩固凡尔赛条约体系，更加磨利它的反苏矛头，协约国领导集团中有人主张，把中欧和东南欧某些力求保持凡尔赛条约以后现状的国家组成一个集团。这对于想在欧洲建立亲法同盟体系的法国来说，无异于是天赐良机、正中下怀，因此它便乘机出头、上下其手，支持由捷、罗、南组成“小协约国”，并分别对捷、罗、南提供经济的、外交的、乃至军事物资和军事技术的援助。1920 年 8 月 14 日，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在贝尔格莱德签订了为期两年的“防御同盟”条约。1921 年 4 月 23 日，罗马尼亚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盟约。1921 年 6 月 7 日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签订了一项条约。最后，1922 年 8 月 31 日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签订条约，决定把 1920 年 8 月 14 日的同盟协定延期 5

年。于是，就形成了由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组成的小协约国——法国在东南欧保卫凡尔赛条约的卫道士。尽管罗马尼亚和波兰在1921年3月3日签订了同盟条约，但波兰和希腊都没有参加小协约国。

小协约国为了反对匈牙利复辟旧王朝和修改和约，希望得到法国的支持，因此在20年代它推行了对法友好政策。法国经过上述一系列的努力，建立了一个从战略上对德国形成包围之势的较为完整的安全体系。然而，它们却都忽视了一个潜在的黑洞：那些条约同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毫无共同之处，不仅没有缓和，反而加剧了凡尔赛体系的重重矛盾，并为它未来的危机埋下了祸根。而且，法国的这种安全政策，显然是同英国的均势政策相冲突的，而英国又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岂会善罢甘休？

英国历来是采取一种"扶弱抑强"的政策，这种政策的目的是保持欧洲大陆上国际力量的平衡，以便于欧洲事务为英国所把持。一战前，德强而法弱，因此，英国奉行扶法抑德政策．战后德、法力量倒置，英国就转而采取扶德抑法政策。丘吉尔阐述这种政策时说："请注意，英国

的政策并不考虑企图称霸欧洲的国家究竟是哪一个，问题不在于它是西班牙，还是法兰西王国或法兰西帝国，是德意志帝国还是希特勒政权。这个政策与这个国家是什么国家，谁当统治者都毫无关系；它唯一关心的是，谁是最强大的、或具有支配力量的暴君。因此，我们不要怕别人说我们亲法反德。如果情况改变，我们同样可以亲德反法。”亲德反法正是战后英国对欧政策的核心内容。英、法的政策冲突对20年代欧洲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为德国的再起提供了有利的机会。

当时，整个世界在一战余波的震荡下可以说是一团糟，简直一切都乱套了。战胜国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除了英、美对立和英、法对立之外，还有美、英、日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对立，英、法、意在地中海的对立。从国际关系全局来看，战败国德国同战胜国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虽暂时处于次要地位，但潜伏着巨大的危险，而且两类矛盾互相交叉。如果以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划线，意大利和日本出于自己霸权利益的考虑，也同德国一样是站在这个体系的对立面的。这就为形成新的帝国主义争霸集团播下了

种子，埋下了祸根。

德国以各种方式向凡尔赛体系发动了抵制抗拒，想打碎这块吊在自己脖子上的沉重的磨盘石

战胜国在拟定凡尔赛和约时，为预防德国不履行和约条件，除做了详细的具体规定外，还设置了一些负责和约实施的常务机构，其中主要的是设在巴黎的“大使会议”，它由英、法、美、意、日等各国的外交代表组成（后来由于美国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宣布退出“大使会议”，仅愿以观察员资格列席）。此外，为监督和约一些重要条款的实施，还设立了三个重要机构：(1)监督裁军的陆军监理委员会、海军监理委员会和空军监理委员会；(2)监督赔款偿付问题的赔款委员会；(3)管理但泽和萨尔行政事务的国际联盟理事会的附设各机关。

尽管战胜国采取了上述措施，但凡尔赛和约的执行还是遇到了德国的各种形式的抵制和抗拒。1920年1月10日凡尔赛和约正式生效后不久，德国总统在一份电文中就公开声称：“我

们竭诚努力根据《和约》履行我们对协约国的承诺，但是，如果某些条款被证明是根本不能实现的，我们确实希望协约国能理解这一点、而且能够照顾到我们的困难。”

在德国，修改条约的叫得最厉害的一个理由就是德国不服从应负战争责任的规定，并极力叫嚷要进行什么澄冤昭雪。《凡尔赛和约》第23条规定，德国应承担战争罪责。为了证明这一条是不公正的，德国政府煞费苦心地搜罗了大批历史学家、文献专家、外交人员，就差没有将档案管理员也动员起来，组织出版了从187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期的全部德国外交档案，企图找到任何一条，哪怕是蛛丝马迹般的可资推翻战争责任、修改《和约》的依据。1921年3月3日，劳合—乔治明确指出，德国所拒绝接受的战争罪责问题，是《凡尔赛和约》的真正基础。3月12日，德国外长西蒙斯在议会就此问题竟然诡辩说：无疑我们已经在《和约》上签署了一项表明德国唯一承担战争罪责的声明，但这并不意味着关于德国是唯一的战争罪犯的指责是真实的。在这个议会里，没有一个男人或女人相信德国是引起战争的唯一原因。我虽然

无意声称我们是无辜的，但是世界必须逐渐了解，关于德国是唯一罪犯的说法是错误的。竭尽全力来澄清这一问题是我们的责任。

对德国的修约趋向，各协约国政府均持否定态度，它们坚持《凡尔赛和约》必须贯彻执行。在这一点上，法国的意见最为明确并得到了协约国的共同承认。但是，由于德国的抑制，《和约》的一些条款实际上并未履行，或只是走走形式而已。

在《和约》第227条中，协约国宣布将对前德皇进行审判。这时，德皇正躲在荷兰。1919年6月28日，也就是和约签署的当天，法国驻海牙代办向荷兰政府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表明了协约国将对德皇进行审判的意图，要求荷兰政府放弃对德皇的庇护。7月10日，荷兰政府答复说，我们“必须保留行使主权的自由”。随后，1920年1月15日，协约国正式要求将德皇移交给它们进行审判，并列举了德皇应承担的罪责。1月27日，荷兰政府在答复中拒绝了协约国的要求，理由是它并非《凡尔赛和约》的签约国，因而其行动也不受该条约的限制。以后，经过双方多次交涉，荷兰政府答应，负责监视德皇，使

其不再回国惹是生非。这件事便算了结了。

按照《和约》规定，德国政府还有义务将一切主要战犯提交各协约国联合军事法庭受审。但在1919～1920年的两年中，德国政府以害怕引起国内反对为由，拒不执行。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双方商定，各战犯由德国的地方法院自行审理，但在审讯时，协约国可派观察员列席。1921年夏，在莱比锡对战犯进行了审判，被传到案的只有12人，其中被控告有罪的只有6人。这岂非敷衍了事，制造笑料？对此，法国舆论大哗，抨击德国奉行保护战犯的政策。但自此以后，对于《和约》中有关处罚战犯的条款，也就不了了之。

凡尔赛和约还规定，德国在裁军问题上负有下列三种义务：(1) 销毁和交出多余的军用品；(2) 全国军队裁至10万人；(3) 全国的警察裁至和1913年的警察总数相等。

但是，德国对它在军事方面受到的限制尤其不满，深恶而痛绝之，常常采取各种办法进行抵制。一战前，德国政府并不直接管理警察事务，均由地方政府管理。《和约》签订后，德国政府大力发展警察组织，并配备充足的武器。这

自然引起了协约国的警惕。

1920年7月5日至16日，协约国在斯巴召开会议，讨论解除德国武装问题和赔偿问题。这个城市选作会议地点，也并非偶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里是德军最高统帅部所在地。协约国就是要借此再次说明德国昔日军事上的强盛和今日的衰落破败。但是，德国代表、陆军部长海斯勒和德国国防军司令谢克特仍然身着全副军装耀武扬威、威风凛凛地来到会场。

德国人知道协约国内部有分歧。德国外长西蒙斯说："必须对敌人的策略有所估计。敌人当中，一些人想挤牛的奶，另一些人想割牛的头。那些想挤牛奶的人将会同我们达成协议。"

履行还是抗拒凡尔赛条约？这是德国各地纷纷议论的问题。右翼政党、军事团体和国防军暗中支持的法西斯煽动分子要求"抑制"凡尔赛条约，他们处心积虑地利用受到挫伤的民族情绪，并自称是人民利益的"保护者"。但德国政府不敢公开拒绝履行和约条款。

德国代表提出借口，说什么革命运动妨碍了他们履行条约条款。在斯巴会议召开前，德国人多次抱怨没有足够的兵力去平定革命运动。

对于这一点，协约国总是认真听取的。在1920年6月，协约国竟不顾凡尔赛条约的规定，允许德国把警察人数从8万增加到15万，把配备步枪、战刀和手枪的宪兵人数也从1.1万人增加到1.7万人。后来，德国政府又通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法规，把警察部队变成了变相的军队。也许，协约国在允许德国扩充警察部队时，一定认为，所谓的警察不过是戴着大盖帽，提着警棍，整天在街上晃来荡去的那些对付地痞流氓的大兵，与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久经沙场的正规军自然有天壤之别。况且，这在巴黎、伦敦等地已是司空见惯的，想必在柏林也不会有例外了。然而，这帮蠢家伙哪里想到，平时头戴大盖帽的恶棍，在战时把警棍一丢、冲锋枪一提、钢盔一戴，转眼间就成了战场上的厉鬼恶魔，这就像一个人把先前插在衣袋里的手又拿出来那样轻巧和自然。况且，如果在伦敦和巴黎的原则在柏林也会流行无误，那么，德国也就不成其为德国了，一战也就只有在那些富于幻想的历史学家们的小说中才能见到了。对此，英国驻协约国委员会军事代表评论说："两者就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那样协调。在每个军队士兵的后面站着一个警

察，就像影子一样。”

1920年7月，德国代表团在斯巴故伎重演，提出国内有爆发革命的危险，要求延期15个月执行《和约》的军事条款。协约国认为，这个过去的敌手要价未免过高，他们责令德国政府没收私人武器，实行志愿兵役制，交出全部多余军用物资和履行条约的其余条款。如果德国接受上述条件，协约国则同意德国到1920年10月1日前可保留15万国防军，但在1921年1月1日之前要将军队压缩到10万人。协约国威胁说，如果不按时或不切实履行这些条件，协约国将重新占领德国土地，必要时也包括鲁尔区在内。德国被迫接受了上述条件，但执行起来仍是阳奉阴违。

德国的多余军用物资也迟迟不按《和约》规定收缴给协约国。当1918年底德国军队撤出法国和比利时的时候，大批军人名义上复员回乡，却带走了枪支和其他装备。根据协约国掌握的材料，德国至少还有200万支步枪尚未交出；德国保留的机枪是6000挺而不是2000挺；他们拥有的火炮比规定数量多5倍。德国还保留了大批炮兵阵地、军火库、供给库和军马场。这些

军事设施曾满足过德国旧军队的全部需要，远远超过现有军队的需求。但德国政府对这些设施既不按和约规定裁减，又不出售，也不改为它用。这些保留下来的军事设施和装备，随时能够武装一支庞大的军队。

关于飞机的限制更是经常出现争议。按和约规定，德国政府不得拥有任何种类的军用飞机。但是，军用和非军用之间很难分辨。为了排除这种争论，协约国同德国商定了一种检验办法，即按飞机的速度和性能制订一个标准。凡超过这一标准的即军用飞机，未达到者便算做非军用飞机。为监督这种新办法的实施，各协约国又组织了一个保证委员会。自这个机构成立之后，所有的德国飞机、战舰和水手都要在这里注册。德国对于该机构的设立极为不满，国内舆论公开抱怨说："维持空中的战斗力是任何国家的基本权利。除了协约国这个对德办法以外，有史以来，还没有一个主权国家受过这样的限制。"

《和约》第42条和第43条规定，不仅莱茵河左岸，而且右岸50公里的地带内，为永久非军事区，并且在和约上附加了特别重要的一点，即德国违反这些条款的任何行动，都是"反对在

《和约》上签字的各大国的敌对行动，并被认为是对世界和平的破坏"。因此，协约国对任何违反上述条款的行为倍加警惕。1920 年 3 月 19 日，德国政府借口"共产主义危险"，要求协约国准许派正规军进驻莱茵非军事区。法国断然拒绝；英国倾向于让步，但提出了某些预防措施以避免德国正规军在这一地区的过分集中。德国政府得知这些分歧后，便不等协约国批准，于 1920 年 4 月 3 日命一支包括骑兵和机关枪部队在内的 2 万名德军开进了鲁尔。法军立即于 4 月 6 日以占领法兰克福和达姆施塔特作为报复。英国抗议法国自行其是的行动，但法国向英国保证，一俟德军撤出中立区，即结束对德国城市的占领，并承诺今后不再采取单独行动。5 月 17 日，法国撤走了它的部队。

《和约》第 428～432 条规定，莱茵河以西的德国领土，加上河上的三座桥头堡，由协约国军队占领 5 至 15 年，作为德国履行和约的保证。根据与《凡尔赛和约》同一天签订的一项单独协定，占领军应由英国、法国、比利时和美国提供，同时由各协约国共同组成一个"高级委员会"，作为协约国家在被占领区的最高代表。这个委

员会有权发布“对维持协约国军队的给养、安全和要求所必需”的命令，可以对任何被指控攻击协约国武装部队的人进行军事审判，并在必要时在被占领区的任何部分或其全部，宣布紧急状态。

尽管有上述保证措施，协约国占领军同德国的矛盾和冲突仍时有发生。最初，德国强烈反对法国在占领区使用多种族部队。从1920年春天起，德国报刊就这个问题掀起了一场非常剧烈的运动，声称，让德国人民不仅受北非军队而且受非洲黑人军队管制，是有损一个欧洲文明国家的尊严的。为反驳这一点，法国在答复中指出，这些士兵是法国军队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些在阿尔及尔招募的士兵是法国公民，而且多种族部队也驻扎在法国本土的很多地方。德国对法国的另一指责是他们利用其地位企图控制占领地区极有价值的经济命脉和工业资源，以及千方百计地企图使莱茵河左岸永久地从德国分离出去。德国不顾和约及其他有关规定，对在被占领地区受到法国保护和支持的分离主义运动进行镇压。1920年7月24日，德国警察在被占领区逮捕了分离主义运动头目多登，并把他带

到德国未被占领的地区。协约国高级委员会认为，这一行动侵犯了它的权威，要求把多登立即送回被占领区予以释放。但是，德国对之置之不理。

协约国驻莱茵河左岸的军队总数为7.5万人，占领费由德国支付。据统计，1924～1927年，共用了3.28亿金马克。德国认为，外国军队留驻莱茵河左岸，不仅严重地加剧了德国的经济困难，而且损害德国的主权，它不断向协约国提出要求，早日结束这种占领状态。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在执行《凡尔赛和约》的过程中，战胜国同战败国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德、法矛盾是非常尖锐的。德国要尽量摆脱《和约》的束缚，它利用英、法矛盾，同法国明争暗斗。德国的外攻和英、法的内耗，使得凡尔赛和约的威力大为削弱。而对德和约又是凡尔赛体系的灵魂和神经中枢，它既已得了癌症，则整个凡尔赛体系自然就成了一个植物人。

第四章　徘徊的战争幽灵

银钱是亮的，面对成堆的金币，谁不动心？德国有胆量肇事，又无勇气赔款；列强都要吃到蛋，又要避免把母鸡累死

德国的赔款问题是战后最复杂的国际问题之一，它包含着两类矛盾：战胜国英、法、美同战败国德国之间的矛盾以及英、法、美之间的矛盾。赔款问题斗争的实质是战后帝国主义对欧洲霸权的争夺。

在签订《凡尔赛条约》时，赔款问题悬而未决，德国的赔款总额以及各战胜国对赔款的分配比例等重要问题均未达成协议，决定由英、法、美、意、比五国组成赔款委员会研究解决。这说明战胜国在这个问题上，从一开始意见就

不一致。后来，由于美国拒绝批准《和约》，实际上，赔款委员会就由英、法、意、比四国代表组成，法国代表担任主席。主席的权力很大，在通过决议时，如表决各为2票，规定由主席做出最后裁决。这反映了法国在赔款问题上的领导权。该委员会在1920年7月召开的斯巴会议上，确定各国应得赔款数的比例是：法国52%、英国22%、意大利10%、比利时8%，希腊、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共得6.5%，日本和葡萄牙各得0.75%，保留美国应得份额的权利。

在1921年1月召开的巴黎会议上，协约国提出的赔款方案规定，德国的赔款总额是2260亿金马克。德国代表坚决反对，并威胁说，德国将面临崩溃的危险。3月3日，协约国向德国递交了最后通牒，声明，如3月7日以前不承认巴黎决议，协约国将出兵占领莱茵河右岸的杜伊斯堡、鲁罗尔特和杜鲁尔多夫，并将在莱茵河上设立海关站。可是，德国不予理会。3月8日，协约国军队占领了上述城市，并开始对德国实行经济制裁。德国对此提出抗议，但无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于4月24日提出新建议，表示愿意承担500亿金马克的赔款。

在1921年4月召开的伦敦会议上，赔款委员会讨论了德国的建议，重新确定德国的赔款总额为1320亿金马克，并规定从5月起，德国必须每年支付20亿金马克以及每年出口商品价值的26%。5月5日，协约国把这一决定再次以最后通牒的方式送交德国政府，如德国拒绝接受，将出兵占领鲁尔区。5月11日，即在最后通牒到期时，德国维尔特新政府宣布接受协约国的全部条件。

但是，德国虽低头认罪，却未心服口服。德国新政府虽然宣布对赔款采取"履行政策"，实际上却暗中抵制。在政府的默许下，资本家拒绝纳税，并让大量资本逃往国外，人为地加剧德国的经济困难。政府则以弥补预算赤字为借口而滥发纸币，致使通货膨胀恶性发展。这样，既给协约国对德国预算进行监督造成困难，又能以没有支付能力和财政破产为托辞拒付赔款。

当时，以斯汀纳斯为首的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在国内煽动复仇主义情绪，力主修改凡尔赛条约，拒绝偿付赔款。1922年6月28日，主张履行赔款义务的维尔特政府的外交部长拉特瑙遭暗杀。当年11月6日，维尔特政府下台。接

着，古诺政府上台。古诺是汉堡—美洲轮船公司的董事长，德国重工业集团利益的代表人物。他执行了斯汀纳斯的政策，拒不履行《伦敦协定》。斯汀纳斯则公开声明，德国工业家宁愿冒鲁尔被占领的危险也拒绝缴付赔款。因为他深知，鲁尔被占领反而对德国有利，因为这样可以引起英、法摩擦，促成英、德接近，最终导致取消赔款的可能。

最大限度地掠夺战败国的财富，是战胜国的共同愿望，但是，帝国主义之间的利害冲突，决定了它们在赔款问题上不可能抱有一致的立场。

英国和法国在赔款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矛盾。协约国中法国最关心赔款问题，因为它享有德国赔款额的半数以上，指望通过向德国索取庞大的赔款来补充国内恢复工业所需的资金，同时使德国经济从此一蹶不振，以便树立自己在欧洲大陆上的霸权。1922 年 7 月 12 日，德国提出延期偿付赔款的要求，法国坚决不同意，并扬言德国如不按期偿付，将出兵占领鲁尔。英国在赔款问题上，却不希望过分削弱德国。英国把保持欧洲的“均势”看做是自己长远的战略利

益。为此，它要把德国当做一支同法国抗衡的力量保存下来。同时，英国认为，整个欧洲的经济复兴及英国海外贸易的扩张，有赖于德国经济的稳定，因此它希望德国经济得到某种程度的复兴，这不仅可以大幅度增加英国商品对欧洲的销售量，而且也是抑制法国的妙策，真是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为此，英国甚至提出要削减德的赔款总数，这引起了法国的激烈反对。

马克的大幅度贬值，德国的抵制和英、法意见的分歧，使赔款问题困难重重。这样就为原来由于未批准和约而没有参加赔款委员会的美国插手赔款问题提供了机会。

美国对赔款问题抱有强烈兴趣，是因为赔款问题是同战债问题联系在一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等国都积欠有美国的巨额债务，现在它们都准备用所得的赔款来偿还战债。赔款如不能正常进行，归还战债必然随之成问题。1922 年 8 月，英国提议赔款与战债同时取消。对此，美国反对，法国也不欢迎。对美国而言，如果有关各国借口未得到赔款便不还债，则岂不是使美国看着银子化成水？法国之所以反对在于法国用赔款来归还战债还能有剩余，而

且就法国来说，首先考虑的是维护凡尔赛和约和巩固战争胜利的成果，它自然不愿意德国由此卸掉这一沉重的经济负担而获得解脱。

1922年9月，美国代表以观察员的身分，参加了赔款委员会。它一方面标榜孤立主义，声称绝不干涉欧洲事务；另一方面，即竭力利用欧洲各国对美国财政上的依赖，对欧洲事务指手划脚。战后的德国，绝大部分技术先进的工业设备均完好无损，所缺的只是流动资金，所以愿付高额利息来取得外国的贷款。这对美国来说，无疑是在经济上进行对外扩张的大好时机。所以，美国插手赔款问题的目的是：以其经济大国的地位，将资本输入德国，以稳定和恢复德国的经济，为德国的赔偿创造物质条件。这既可以控制德国经济，获得高额利息，又可保证捞回战债，并在赔款问题上对欧洲发号施令，可以说是一举多得。为此，美国向赔款委员会建议，将赔偿问题交给“与政治信念无关的”各有关国家的财政专家委员会去解决，这个委员会要从“纯经济”的角度提出解决方案。这个提议后被人冠以当时美国国务卿的姓名，称之为《休斯计划》。法国因摸不清美国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对此计

划完全持否定态度。

由于德国未能按伦敦会议规定偿付赔款，1923年1月2日，赔款委员会召开了巴黎会议。英、法在赔款总数和期限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英国首相鲍德温提出了一个新的赔款方案，规定：允许德国在没有任何担保的条件下，延期交付赔款4年；把德国的赔款总数从1320亿多马克减少到500亿金马克，即减少了6/10；法国应得的赔款份额从52%减为42%。倘按照这一方案，法国所能得到的赔款还不足以偿还英、美的战债。法国总理普恩加来在批评英国的方案时指出："如果接受了英国计划，则德国债务总额只有法国债务的2/3。几年以后，德国将成为欧洲唯一最先偿清外债的国家。它的人口不断地增加，工业几乎没有遭受破坏，在极短期内，它将成为占绝对优势的国家。"因此，法国断难接受。法国只同意德国部分延期赔款，期限为2年，而且在此期间要向协约国提交"有效担保品"。否则，将对德国不客气地采取制裁措施。意大利和比利时也不赞成英国的方案而在争论中站在法国一边。

英国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提议由协约国各

国代表参加，成立一个对德进行财政监督的国际财政专家委员会。显然，这是休斯计划的翻版，其意图是要取消法国在赔款委员会中的领导地位，法国对此更是反对。意大利则一心想得到德国的铁矿石，所以连刚上台的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也主张必须使“德国低头”。最后，会议以法、比、意3票赞成，英1票反对通过决议（美仅是观察员，不投票和反决），谴责德国有意不履行向战胜国赔偿的规定，协约国有权对此实行制裁。这样，巴黎会议宣告破裂，法国决定占领鲁尔，赔款危机便发展成了一场尖锐的军事政治冲突。

1923年1月11日，法国和比利时借口德国不履行提供煤炭和木材的义务，出动了5个法国师和2个比利时师共约10万人的军队，占领了鲁尔工业区。法国占领鲁尔的目的有三：一是加强法国的安全；二是迫使德国履行赔款规定。如不行，就直接掠夺鲁尔地区德国工业的大量利润；三是想夺取德国的一部分土地，取得它在《凡尔赛和约》中未能得到的东西。在法国看来，占领土地比索取赔款更重要。这一点清楚地反映在普恩加来总理1922年6月26日的演说

中。他说，“据我个人的意思，假定德国偿付赔款，反而要使我痛苦不安，因为那样我们就要退出莱茵区域了。你认为何者是上策呢？获得金钱或获得新的土地？我个人宁愿占领土地，不欲接纳赔款。因此，你就可以明白，我们为什么需要强有力的陆军与警察的爱国心；你就可以明白，维护凡尔赛和约的唯一方法，在于使被我们击败的敌人，不能履行它的条件”。法国占领鲁尔正是出于这种阴险的用心，因为这既可以瓦解德国的经济，又可使洛林的铁矿和鲁尔的煤矿资源结合起来，为法国在欧洲的军事和经济领导权建立物质基础。

法国占领鲁尔是一次冒险行动，这不单涉及德国，也涉及英、美等国的利益。站在法、比一边的则有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它们也想靠牺牲德国来发财。英、美，主要是英国想利用法、德对抗的机会，使他们彼此削弱，坐收渔人之利。英国先是对法国的行动采取纵容态度。英王乔治五世在2月13日的演讲中说：“虽然我们的政府既不会赞同也不会参与这些行动，但丝毫不想增加盟国的困难。”

与此同时，英国又鼓励德国在鲁尔消极抵

抗法国，促使法国的冒险失败。英国驻柏林大使德·阿拜隆，曾不止一次向德国政府暗示应采取的行动，并答应英国将支持德国。美国也采取了与英国相似的立场。

法、比军队占领鲁尔的第二天，德国政府就向法国和比利时提出了抗议，并立即召回了驻巴黎大使和驻布鲁赛尔公使。1月13日，德国古诺政府宣布实行“消极抵抗”政策。古诺在向国会演讲中说，“现在不再是赔偿问题，而是法国的旧政策，400年的旧梦。”德国政府指责这是公然破坏了凡尔赛条约的行为，因此声明不再履行凡尔赛条约义务，停止所有赔款和实物偿付，责成当地官员拒绝遵守占领军的一切规定，号召工人抵抗占领军，拒绝采煤和运煤。结果，工矿停工，铁路停车，电报局不给驻军传送消息，报纸不给驻军刊布命令，居民拒绝遵守占领军的规定。

德国实行“消极抵抗”政策的目的，是为了给占领军造成种种困难，以阻止其对鲁尔煤炭的掠夺，从而迫使法国做出让步。德国还想利用这一机会加剧英、法矛盾，并希望美国出面干预，为减少甚至取消赔款创造条件。

英、美不愿看到法国过分削弱德国，更不愿看到法国因占领鲁尔而加强其在欧洲的地位。为了共同抑制法国，英、美之间应调整关系，加强合作。1923年1月31日，英国首相鲍德温访问美国，解决了英国对美国的债务问题，双方商定，将英国的欠款削减30%，余下的部分在62年内还清。这样，就排除了两国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障碍。4月23日，英国外交大臣寇松就鲁尔问题发表声明，正式表示赞成休斯关于建立专家委员会的建议，明确提出赔偿问题应由专家委员会研究解决，变相地否定了法国的武力胁迫。法国认为，专家委员会对德国的支付能力永远做不出正确的估价，表示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服从专家委员会的建议。

鲁尔被占领对德国也是重大的打击。鲁尔是德国工业的心脏和欧洲重工业的中心，它的煤、铁产量占全德总数的80%，铁路收入占70%。法、比占领军把该地区与德国其他地区隔离，建立关税壁垒，实行军事戒严，使德国工业生产下降了一半，失业剧增，黄金储备枯竭，通货膨胀达到了天文数字。1922年8月1美元在柏林可兑换1000马克，到1923年底竟可兑换

42000 亿马克。德国经济面临崩溃，小中企业纷纷破产，人们多年的积蓄荡然无存。失业和恶性通胀引起了 1923 年 8 月 10 日柏林工人的总罢工，并迅速蔓延到全国大部分地区。8 月 12 日，古诺政府被迫宣布辞职。13 日，魏玛共和国总统艾伯特任命施特莱斯曼为内阁总理。施氏在组阁时声明，将中止鲁尔的消极抵抗。同时，他也借这次革命危机向其它各国施加压力，说他的政府也许是“德国最后的资产阶级政府。”9 月 24 日，内阁会议做出了结束“消极抵抗”的决议，3 天后把这一决议通知了协约国。但德国局势继续动荡。10 月 10 日和 16 日，萨克森和图林根建立了有共产党参加的“左派联盟”政府。10 月 23 日，汉堡爆发了由德国共产党总书记台尔曼领导的武装起义，并同政府军激战了三昼夜。11 月 8 日，希特勒在慕尼黑发动了“啤酒馆爆动”。在法国占领军支持下，莱茵—威斯特伐利亚还出现了分离运动。虽然这些起义和爆动先后遭到镇压，但它们进一步加深了德国政府的危机，震动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英、美帝国主义害怕德国的革命危机蔓延，决定联合对法国施加压力，以尽快结束鲁尔危

机。英国外交大臣寇松警告说，德国的解体也就是债务人的消失。为迫使法国就范，在法国财政危机的紧要关头，英、美又将它们握有的大量法郎和法国有价证券抛向金融市场，迫使已贬值的法郎更加暴跌，法国财政经济急剧恶化。英、美并商定迅速召开国际会议，成立专家委员会来重新估计和处理赔款问题。

这时，法国也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它占领鲁尔不仅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占领鲁尔使它付出了以10亿计的占领军费用，从鲁尔运出的煤铁远不足以抵偿，法国的经济受到了进一步的损害，政局不稳。执行冒险政策的普恩加来政府在内外强烈谴责声中倒台。而且，法国在道义上也处于不利地位，舆论上受到国内外谴责，外交上陷于孤立困境。

鲁尔危机造成的严峻经济形势，以及英、美的压力，使法、德两国政府难以坚持原来的政策。德国新政府既已让步，法国迫于财政困难，不得不向美国摩根财团求援，为了得到1亿美元的短期贷款，被迫接受了召开国际专家委员会的建议，以重新研究赔款问题的解决办法。

1923年11月30日赔款委员会决定，建立

2个由美、英、法、意、比代表组成的专家委员会。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稳定马克和平衡德国预算问题，由美国摩根财团一家银行的董事长道威斯任主席。还有一个委员会负责研究德国外流资本数目及追回的途径，主席是英国人麦克唐纳。

1924年8月，伦敦国际会议正式通过了以道威斯为首的专家会议提出的关于德国赔款问题的方案，即《道威斯计划》。计划的主要思想是首先要稳定德国的金融，复兴经济，在此基础上索取赔款。在确定每年赔款数目时应考虑到德国财政经济的承受能力。计划规定，德国应获得8亿马克的贷款以恢复经济。为了保证能收回贷款和利息，德国应从工业和运输业利润以及国家预算中扣除这笔资金。《道威斯计划》没有规定德国的赔款总数和年限，只规定计划生效后的第一年，德国应支付10亿金马克的赔款，以后逐年增加，从第五年起，每年应交付25亿马克，同时规定，德国的财政经济应接受以美英为首的协约国的监督。

8月5日，德国代表到达伦敦，接受了《道威斯计划》。16日，法、比、德三国政府就撤军

问题达成了协议。1924 年 11 月中旬，法、比军队全部撤离鲁尔。

《道威斯计划》是德国赔偿史上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就是这么一份很不起眼地小纸片，改变了德国在欧洲乃至世界上的地位，对德国在 20 年代中后期军国主义经济基础的复活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道威斯计划”通过后不久，以美国资金为主的大量外资源源不断地流进德国，渗入到了从钢铁生产到电影制作的每一个经济细胞。短短几年间，德国总共得到了 210 亿马克的外国贷款，而仅支付了 110 亿马克的赔偿费，大大地捞了一笔。大量外资的输入，使德国就像一个长期贫血的病号得到了血浆一样，那苍白的病容逐渐褪去，如死灰色的面孔又开始透出几许红晕来。自 1924 年起，德国经济开始恢复。1925 年，出现了工业高涨局面。到 1929 年，德国工业总产量再次赶过英、法，成了欧洲第一经济大国，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而排行老二。而且，令人注目的是，德国一切与战争有关的经济发展得最快。从来就对凡尔赛条约看不顺眼的德国，如今握着哗哗作响的钱袋，岂肯再做顺民？

英、美两个大国在这场争斗中，一心只为自己的小圈圈着想，为了打击法国，不惜与敌携手。殊不知，正是由于它们的这种蠢举，在无形中使《道威斯计划》对《凡尔赛和约》做了重大的修改，使欧洲那本已出现紊乱的国际关系的软盘又染上了新的病毒。在1924年伦敦会议以前，赔款问题几乎是由法国独自决定的，而伦敦会议则规定，如有争执问题，应由美国人所领导的、由协约国代表所组成的仲裁委员会加以解决。这既标志着巴黎和会赋予法国在赔款问题上的优越地位已经丧失，表明法国已无力迫使德国履行凡尔赛条约，同时也反映了法国在欧洲事务中处于某种程度的孤立状态。所有这些都说明，凡尔赛体系所确立的国际关系已经开始动摇了。

也许，英、美会认为，德国是一个尚在吃奶的幼儿，一旦不老实，它们就可以用断奶的方法迫使德国待它们如亲爹亲娘，俯首贴耳。但是，殊不知，此时的德国却青春期提前，过早地成熟了，大有儿子与老子再次分庭抗礼的趋势。还有，对于德国这种铤而走险的强盗，用大棒远比用文明棍好使得多。武力可以剥夺一切，但武力

也可以收复一切。试想，在德国这个一向患歇斯底里症的狂人好战分子面前，是有百万陆军的法国有威慑力呢，还是只能开出几打支票和订单的英、美管用？

德国贪得无厌的本性，在几年后就露出了来了。尽管它的小命是通过道威斯计划的输血才得以苟延下来的，但德国过河拆桥，对该计划仍有许多不满意之处。它前天刚问了：既然伦敦会议所规定的1320亿金马克的赔款总额太多了，而道威斯计划又不规定赔款总数，协约国是不是要把它作为一头永不停产的奶牛？昨天它又抱怨，该计划没有规定赔款的年限，那么德国应赔到哪一年才能使债主们满意呢？今天，它干脆怒气冲冲地吼道：外国凭什么要监督它的财政？1928年，德国借口经济困难，提出无力支付1928～1929年度的25亿马克的赔款，要求修改道威斯计划。

面对这个要求，美国第一个举手赞成，因为美国希望通过支持德国使后者首先支付美国贷款的利息而不是先偿付给英、法等的赔款，把钱先捞到自己的腰包里再说。英国也点头同意，它希望通过修改计划结束德国用实物赔偿的规

定，以免再在伦敦的商场中老是看到德国货而让人恶心。法国虽担心德国中断履行赔款义务，但自己又无能为力，也只好同意召开会议，重新制定德国赔款计划。

1928年12月22日，英、法、意、比、日等国同德国政府商定，成立新的专家委员会，以制定解决赔款问题的新方案，并决定邀请美国参加。1929年2月11日，专家委员会在巴黎举行会议，选出美国摩根财团银行家、道威斯计划的实际起草人杨格为主席，负责起草计划，这意味着美国对赔款计划说了算。专家委员会经过近4个月的争吵，于6月7日完成了一份新的赔款计划，即所谓的《杨格计划》。其主要内容如下：

(1) 规定德国赔款总额为1139亿马克，比以前的规定减少了181亿马克，约15%。新的赔款计划从1929年9月开始实施，到1988年3月为止，共59年完成。前37年，每年约赔20亿马克，比《道威斯计划》规定的每年25亿减少了20%；后22年，每年赔款平均数是15亿马克。(2) 赔偿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条件的，即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应按时缴付，其数额为6

亿多马克。另一类在德国财政发生困难时，可以延期缴付，但以2年为限。这一规定虽然确保了英、法等国每年都能旱涝保收，多少得一笔外快，但也为德国拖欠大部分赔款开了绿灯。(3)今后德国缴付赔款主要用外币支付，用实物抵付赔款的年限为10年，且其数量要逐年减少；(4)取消对德国的财政经济监督；(5)设立国际清算银行，对索取和分配德国赔款进行调节。

1929年8月6日，英、法、德、意、日、比、捷、南、波、罗、葡和希腊等12个国家在海牙举行国际会议，讨论《杨格计划》。会上争吵激烈，矛盾的焦点有二：

关于赔款的分配问题。英国抱怨该计划不仅把英国应得赔款的比例从原来的22%减少到19%，使英国每年所得还不足以偿付欠美债款的利息，而且，在德国缴付的无条件赔款中，也没有英国的份额。因此英国不仅要求增加应得赔款的总数，而且要求得到无条件赔款，并反对德国用实物抵付赔款，以免不利于英国的出口贸易。对此，意大利、法国和比利时坚决反对，因为这个计划增加了它们应得的赔款份额。双方争得不可开交。英国代表以退出会议相要挟。

法、意、比等国看到，不给这个老不死的一点甜头是不行了，因而做出了让步，同意给英国每年增加赔款约4000万马克，而且每年付给英国400万马克的无条件赔款。

关于莱茵撤兵问题。德国声称，它已履行了《凡尔赛条约》，解除了武装，并根据《道威斯计划》偿付赔款，因此，外国驻兵莱茵区对德实行监督的理由已不复存在了。如果有关国家不明确表示撤兵日期，德国将不接受《杨格计划》。

按照《凡尔赛和约》的规定，莱茵占领区划分为3段，占领的时间分别为5年、10年和15年。属于法国的是第三占领区，应在1935年撤退。由于提前撤兵涉及法国在欧洲的长远战略利益，所以，法国外长白里安提出，应先实行《杨格计划》，然后再研究撤兵问题。对法国这种施延战术，德国表示强烈反对。在双方争执不下之时，奉行助德抑法政策的英国乘机对法国拆台，说它将于1929年底完全从莱茵区撤兵。这就使法国陷入被动地位。8月29～30日，英、法、比、德四国外长达成了从莱茵区撤兵的协议，法国答应在1930年6月底以前撤军。

1929年8月31日，与会各国签署了一项议

定书，原则上同意《杨格计划》。1930年1月20日，召开了第二次海牙会议，正式批准采用杨格计划。

尽管各国对杨格计划沾沾自喜，但真正最大的赢家却是德国。计划进一步放宽了《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限制，减少了德国的赔款额，撤消了对德国财政经济的国际监督，并初步达成提前从莱茵区撤军的协议。同时，德国的军事工业在国际清理银行的资助下，在没有任何控制和监督的情况下，大量生产武器和军用物资。当一个个挂着拖拉机和电机牌子的德国工厂造出来的却是坦克和飞机时，这对欧洲以至世界来说，难道是一个好兆头吗?

杨格计划刚获批准，1929年10月开始的资本主义世界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大危机爆发了。一时间，这股旋风从纽约迅速刮遍全世界，它使得各国的经济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垮塌，对德国的打击尤甚，仅1931年6月10日至19日的短短10天内，德国的外汇储备就减少了10亿马克。

在经济危机空前严重而缴付赔款的期限又日益迫切之时，1931年6月5日，德国总理勃

朗宁向世界发出紧急呼吁，公开声称必须解除德国“不能胜任的赔偿义务”。同日，勃朗宁和外长科尔休赴英要求延期偿付赔款和贷款，但遭到严词拒绝。6月20日，德国总统兴登堡急电美国总统胡佛，诉说德国财政陷于困境，乞求给予援助。

美国这时虽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但它不得不考虑到厉害关系：首先，这里面存在着一个三环关系，德国偿付欧洲各国的赔款，是以从美国得到大笔贷款为前提的；而欧洲各国要偿付美国战债，又必须得到德国的赔款。既然赔款与战债问题如此密切相联，则必须做出某种新的处置。还有，如德国因支付赔款而引起经济全面崩溃和发生革命，不仅将使美国投放到德国的巨资化为乌有，而且会动摇整个欧洲的经济体系，这样又将使美国的过剩商品和资金失去出路。

基于上述目的，胡佛在当天即发表了《缓债宣言》，其要点为：(1) 美国政府建议，各国政府间的债务、赔款的本利，停付1年，外国政府对美国的一切债务的偿还也展延1年；(2) 德国的赔款问题是一个欧洲问题，与美国无关；(3)

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债务不能取消。

其实，德国的赔款与协约国欠美国的战债密切相关。这笔战债，大约等于德国赔款总额的1/3。然而，美国始终不承认这两个问题之间的联系，其用意无非是害怕当赔款条件不利时，会影响到战债的偿付。

英、意等国赞成胡佛的宣言，唯独法国表示反对，因为它每年从德国索取的赔款数额，超过它需偿还的战债近 20 亿法郎。若接受胡佛建议，无异于是一笔巨额损失。经过双方代表的磋商，美、法两国于 7 月 6 日达成协议，规定：德国仍须照付无条件赔款，法国则将所获得的这部分赔款以贷款形式转给德国铁路公司。至此各国意见渐趋一致，于是美、英、法、意、比、日、德 7 国于 7 月 20 日至 23 日召开了伦敦会议，通过了胡佛的建议。

缓期偿付赔款和战债 1 年的建议虽然通过了，但德国的许多银行都已陆续停止了营业，即使缓期 1 年，德国也仍然无偿还能力，债权国下一步又将怎么办呢？此外，胡佛的建议虽在 1931 年 12 月 7 日由国会两院讨论通过了，但附有一项条件：外国所欠美国债务一概不能减少或取

消。既然德国无力赔款，而美国战债又还得照付不误，显然，先前各国的所有活动全是白忙了一场，赔款和战债问题在缓期1年之后，仍然没有解决方法，仍是一个悬案。还有，在伦敦会议上曾组成了由英国经济学家沃尔特·莱顿任主席的专家委员会，研究德国经济问题。结果，该委员会却鬼使神差地提出了一个认为“德国的国际支出必然会损害德国财政稳定”的报告。德国政府以此为口实，扬言即使缓债1年以后，也无办偿还赔款，继续以“经济崩溃”、“革命危机”为理由，呼吁彻底取消赔款。由于德国公开赖帐，于是赔款问题再度告急。

1932年6月16日，为继续讨论德国的赔款问题，各有关国家在洛桑召开会议。当时国际舆论要求取消战债的呼声甚高，美国唯恐被迫取消战债，拒绝派遣正式代表，只派观察员列席会议。会上，英、意、比、日等国都主张赔款与战债同时一笔勾销，只有法国主张取消战债而保留赔款。美国则坚持赔款与战债是毫不相干的两件事的一贯立场。德国这时处在严重的经济危机情况下，继勃朗宁上台、得到法西斯势力支持的巴本政府，对内施行高压政策，对外执行更

加强硬的方针。德国在会上公开提出，德国经济萧条，人心浮动，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无法赔款。巴本要求对于德国赔款问题，做一个最后的解决，同时声明德国赔款完全与协约国对美之战债无关。

英、法、意、比等国一致反对德国的意见，要求它仍需偿付一定数额的赔款。最后达成协议，于7月9日签订了《洛桑协定》，规定德国只要最后缴付30亿马克，就算了结了它的赔偿义务。但是，德国实际上就连这个数目也没有如数偿付，及至希特勒上台后，索性完全取消了赔款义务。

在洛桑会议期间，英、法于7月初达成口头协定，其内容是，双方一致认为，如果以后英、法本身所负的战债已有满意的解决，即各债权国应批准洛桑协定；反之，就应回复到胡佛计划以前的状态。说得明白一点，就是英、法放弃赔款应以美国放弃战债为条件。至11月初，美国大选揭晓，英、法就致函胡佛，要求取消战债。11月23日胡佛发表声明，强调赔款与战债是两回事，不同意英、法以经济困难作为取消战债的理由。这时，英、法等偿付美国战债的日期——

1932年12月15日已经逼近，老朽昏聩的大英帝国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竟动用国库储备的黄金支付了当年应还的债款。意大利、捷克两个笨伯和欧洲一些小国也跟着瞎凑合而付了债款。而法、比、波、希等国死硬到底，任凭美国如何威胁，就是摆出一副要钱没有，要打就奉陪的架式而拒不付款。

1933年，英、意等国又象征性地缴付了一笔债款，其他国家仍然未付。为此，1934年4月13日，美国会通过了《约翰逊法》，做出了对欠债国家惩罚性的强硬规定。但除芬兰外的欧洲各国，依然稳坐钓鱼台，不予理睬。至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纠缠不清、多次引起纠纷的赔款和战债问题，就这样不了了之。

赔款问题先规定于凡尔赛条约，继则在15年的时间内三番五次地折腾，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却不了了之，这本身即是对凡尔赛条约的莫大讽刺，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长达400余条的条约，其许多条款都是摆在那里装门面的，在实际执行中毫无用处，形同虚设。在这场空前的马拉松式的扯皮战中，尽管英、法、美等战胜国

都从德国那里得到了一些好处，但由于它们之间狗咬狗的争斗，结果常常出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局面，德国最终成了最大的赢家。德国不仅轮番折腾、多次诉苦、软泡硬磨而使债权国多次大量缩减它的赔款，最后它甚至还干脆赖掉了赔款。而且，德国在赔款的同时又得到了大量贷款，并且一直是进多出少，这无疑是给战后德国面临崩溃的经济打了强心针，服了肥壮灵，使它仅用10年的时间就又东山再起，登上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国的第二把交椅，大有打马崤山、笑傲江湖的气势。更为重要的是，德国在这段时间内，将一切有限的能量都集中到了军事经济这部马达上，使其疯狂运转。本来，在长期的争斗中，英、法、美等国由于相互拆台和德国的煽风点火、鼠摸狗盗，已多次在无形中损害了凡尔赛条约的威力。

如今，德国既已时来运转，加之只要风云突变，即可将全国立即变成一个武装的大本营，人们不禁要问：凡尔赛条约那柔软的纸片和残破的丝网，还能抵挡住德国的钢铁洪流和大炮的轰鸣吗？

1925年10月，在瑞士的一个小镇上，德国再一次时来运转，又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政治大国的宝座

《道威斯计划》使德国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加深了法国的忧虑。为了遏制德国对法国及其东欧盟国的威胁和可能的侵略，必须使法、德边界以及德国与法国东欧盟国的边界得到安全保证。

1924年9月国联召开第五届大会，提出了集体保障公约草案，通过了《日内瓦议定书》，规定议定书的参加国彼此不进行战争，保证维护《凡尔赛条约》规定的领土，其中包括维护法国的东欧盟国边界的现状。法国对此很满意，迫不及待地在议定书上签了字，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似的。

就在法国眼看就要浮出水面而免于被溺死的命运时，阴险狡诈的英国却突然掀起一个大浪，将法国一下子呛死了。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看到议定书同英国一贯执行的千方百计削弱法国，力争保持法、德平衡的均势政策，以及尽量避免在欧洲大陆承担义务的意图不相符合，便

拒绝签字，这样，议定书终于流产，法国空欢喜了一场。

德国政府战后一贯奉行利用战胜国之间以及它们与苏、德之间的矛盾，在夹缝中求得恢复和发展的政策。1922 年 4 月苏德《拉巴洛条约》的签订，使它在同协约国打交道时，手中握有一种“苏俄牌”。这时德国看到机会来临，便趁 1924 年 9 月国联讨论日内瓦议定书的时候，向协约国和国联秘书长递交了备忘录，要求加入国联，撤退协约国在莱茵区的驻军，并取消德国在军备方面的不平等状况。很明显，德国要进一步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束缚，它不仅要取得在军事上重新武装的权利，而且要争得在政治上同其它列强平起平坐的地位。德国为了实现自己的要求，极力拿布尔什维克的威胁来吓唬英、法，并声称，如果德国在欧洲社会得不到平等地位，那只好“投到苏维埃的怀抱里去了”。

英法都十分害怕德国和苏联接近。英国认为要防止德国倒向苏联，利用德国来反苏，就必须对德国做出某些妥协，于是英、德开始了频繁的外交接触。同时，英、德都明白，要使法国撤出莱茵区，不给法、德边境以某种程度的安全保

障也是不能说动这个瘟神的。于是，在英国的授意下，德国于1925年1月20日分别向英、法发出备忘录，提出签订莱茵兰公约。根据这项公约，德、法、英、意保证莱茵兰地区领土的现状，对于德国西部边界，即德法、德比边界，德国承认遵守凡尔赛和约的有关规定，英、意承担这条边界不受侵犯的安全保证。至于德国的东部边界，只同意缔结仲裁条约。

法国见德国公然不明确保证与其东部盟友波兰、捷克的边界安全，因此十分不满。正在这时，美国又像程咬金似的半路杀出。本来，美国根本没有参加莱茵保证公约的谈判，它属于局外人而不应说三道四。但是美国希望公约能通过，以使德、法暂时保持和平关系，美国资本家不愿看到它的两个债务国在一次互相残杀中耗尽借给它们的资本而将还债日期推到更遥远的未来。因此，美国仗着它有几个臭钱而公然威胁法国说，任何一国拒绝德国的建议，美国就停止向它贷款，同时美国财政部长又逼迫法国偿还旧债。

在英、美的联合压力下，法国被迫让步，同意与德国政府举行正式的缔约谈判。

1925年10月5日，英、法、德、意、比、捷、波7国在瑞士小镇洛迦诺举行会议。法国外长白里安、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和德国外长斯特莱斯曼是会上的三个风云人物。他们在会上始终都面带微笑、彬彬有礼地互致问候，建立了非常密切的私人关系，从而使洛迦诺会议的气氛暖融融的，与巴黎和会相比，简直是完全变了一个世界。但是，如果你认为这是因为洛迦诺小镇地处风景如画的乡间，面对青山绿水、田园牧歌的秀丽风景，这些平时满脸煞气的政治巨头也免不了在这优美祥和的风光的感染薰陶下而变得空前的文静儒雅起来，那纯粹是想当然了。尽管在会议过程中，协约国之间没有预先私下协商，彻底改变了以前密室外交的不光彩的形象，然而，他们在关键问题上却仍是各有打算，时刻准备为自己捞一把。还有，笑里藏刀远比老是板着面孔更能欺骗对手，更能在意想不到的时候而突然杀一个回马枪而令对手防不胜防，出奇制胜。

洛迦诺会议的实际操纵者是英国，它的目的概括地说是扶德、抑法、反苏。在第一次会议上，张伯伦就建议以后的会议不设主席，而是在

"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这明显是为了抬高德国的国际地位。斯特莱斯曼特别善于演戏，他在会议上始终面带微笑、拱手作揖，好像德国是十二分忠诚地要同协约国和解。必要时，他甚至吹嘘这个，拍拍那个，满口甜言蜜语，说得英、法等首脑心花怒放，大有驾雾腾云的感觉。其实，就在这种暖洋洋、醉醺醺的气氛中，德国已巧妙地利用了英、法的矛盾以及英、法引德反苏的心理，迫使西方对德国做出让步。白里安有和平外长之称，虽有一副慈善的面孔，但觉得法国并不是德国那样的阶下囚和战败国，完全没必要献媚讨好，因而他便充分发挥自己能言善辩的口才，在会上旁征博引、滔滔不绝，直侃得风云变色、听者动容。但是非常不幸的是，由于英、德的携手，法国在会上处于不利地位。尽管白里安使出了浑身解数，也未能给它的东欧盟国的边界取得国际保证。

洛迦诺会议于 10 月 16 日结束，与会各国草签了最后议定书和其它 7 个条约，总称为《洛迦诺公约》，其主要内容是：

（1）德、比、法、英、意 5 国签订《相互保证公约》，根据公约，德、法、比三国保证按照

凡尔赛条约维持德、法、德、比边界的领土现状，遵守和约关于莱茵兰非军事区的规定。双方约定彼此不得攻击侵犯，并且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诉诸战争，要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它们之间的一切争端。英国与意大利以德国同法、比之间边界保证国的身分在条约上签字，承担援助被侵略国的义务。

（2）德国分别与比、法、波、捷签订《仲裁公约》，规定双方发生的一切纠纷、冲突，如不能通过正常外交方式和平解决时，应提交仲裁法庭或国际常设法院裁决。在德波、德捷协定中，对它们之间的边界纠纷，没有规定任何保证的办法，这就是说，德国东部的边界是不受条约保障的。这为德国向东侵略埋下了伏笔。

（3）法国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签订相互保证条约，规定如一方遭受德国侵略，彼此立即给予支持和协助。

（4）承认德国加入国联，并任国联理事会的常任理事。

同年12月1日，公约在伦敦正式签字。同一天，协约国宣布从当天起开始从德国的科隆撤军。1926年9月10日，国联第七次大会通过

决议同意德国加入国联，并担任常任理事。同年12月，协约国通过取消对德军事管制的决议，而代之以国联主持的调查组织，宣称只要有一国要求，就可以对德国履行《凡尔赛和约》的情况进行调查。显然，这纯系表面文章。1927年1月，协约国管制委员会从德国撤退了。这对德国暗地里解除《凡尔赛和约》对它军事方面的束缚，重整军备，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洛迦诺公约》出台后，上至资产阶级政府，下至小报记者和无聊文人，一时就像一群疯子似的，不约而同地对它大加吹捧，说洛迦诺公约是一个“和解的公约”，是“战争与和平的划时代界限”，“是和平主义时代的最高峰”，它照亮了人心与精神等等，宣称“洛迦诺精神”开始盛行。总之，好话说尽，真是一犬吠日，百犬吠声，煞有介事，轰轰烈烈，好不热闹。他们甚至埋怨语言辞典太贫乏了，以致于即使把世界上有史以来的所有形容词都堆砌在一起也还是不够用，还是给人以江郎才尽和笨手拙笔的感觉。同时，就在这场闹剧像氢气球似的越胀越大时，他们又将公约的主要炮制者张伯伦、白里安和斯特莱斯曼三人堂而皇之地推上了斯德哥尔摩诺

贝尔奖那神圣的颁奖台，公然将庄严的诺贝尔和平奖那神圣的奖牌挂在了三个家伙的脖子上，以表示对他们为世界和平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的奖赏。

那么，洛迦诺公约是否真的给了欧洲的和平与安全以可靠的保证呢？是否真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和平宣言呢？答案是否定的。

不知当初那些政客们是怎么想的，首先从洛迦诺公约本身来看，它就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在逻辑上前后矛盾，牛头不对马嘴，一片混乱。从法律方面来说，没有理由只保证德国西部疆界，而不能保证德国东部边界。根据条约，莱茵区由5国保证，永久禁止军事行动。假如德国侵犯波兰，和波兰订有互相援助条约的法国，只有越过莱茵兰才能制止德国，但这样又破坏了洛迦诺的协议。

其次，洛迦诺公约打开了潘多拉之盒，使德国这个恶魔获得了完全的自由，从此它更可以肆无忌惮地兴风作浪了。德国假借与协约国大搞缓和的幌子，几乎没有做出什么让步，就得到了许多好处，实现了它的大部分目标。它在英国的支持下削弱了自己的直接对手法国，恢复了

在西欧的平等地位和国家尊严，重新加入了帝国主义大国的行列，在国际关系中获得相当大的自由。因此，洛迦诺公约实际上宣告了凡尔赛和约的破产，对德国已不再具有任何强制性的约束力。因为事实证明，除非接受德国的条件，条约就无法履行。

德国恢复欧洲的大国地位，标志着帝国主义新的一轮争夺的开始。德国很快就把已经支离破碎的凡尔赛条约的残余也一扫而光；协约国提前结束对莱茵区的占领，取消对战争罪行的指控，所有这些步骤，都加剧了欧洲的矛盾和对抗。一方面是法国和它的盟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提心吊胆，竭力维护既得利益；另一方面是心怀不满的德国垄断资产阶级，不断要求有利于他们的改变。因此可以说，如果美、英策划的《道威斯计划》，为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准备了经济基础，那么《洛迦诺公约》则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为德国军国主义势力的重新登台铺平了道路。斯特莱斯曼在条约签订后高兴地说：洛迦诺精神意味着反对凡尔赛条约、复兴德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新阶段，它标志着恢复德国的自由。可见，《洛迦诺公约》是《道威斯计划》在

政治上的继续，它“是为新战争配置力量的计划，而不是为和平配置力量的计划”。

列强就裁军举行了几百次会议，签订了上百个条约，可谓有声有色、有板有眼。然而，在这出闹剧的帷幕后面却是

华盛顿会议以后，到1934年的12年里，帝国主义者在加强军备竞赛的同时，为了欺世盗名、麻痹敌手，几乎从未间断地召开了一系列的裁军会议。他们不仅相互之间展开裁军谈判，而且还打着国际联盟统一领导下的裁军幌子，力图将裁军的叫嚣传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拼命显示它们是何等的厌恶战争和如何的渴望和平。

早在1920年，国际联盟就成立了一个非政府间的裁军临时委员会，并装模作样地声称将裁军作为它的一项光荣而神圣的任务去执行。

1925年10月《洛迦诺公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在大肆吹捧“洛迦诺精神”的同时，又煞有介事、信誓旦旦地保证“对国联已经着手的裁军工作给予真诚的合作”。

1925年12月，国联在日内瓦建立了包括英、法、美、苏等26国代表参加的裁军会议筹备委员会，为召开世界裁军会议做准备。然而筹备委员会一开始工作，就显示出帝国主义各国矛盾重重，各有打算。它们不是首先从自己做起，而是千方百计地想裁减别人的军备。说得通俗一点，我双手赞成裁军，因而你赶快裁吧，越多越快越好，至于我嘛，你不用操心……。

1926年5月，裁军筹备委员会在日内瓦举行了第一次会议。

筹委会大会小会加起来已达几百次，且历时7年有余，但还老是处于筹备会议的低层次上，正式的裁军会议却迟迟难产，一直没有出台。

1932年2月2日，也许是日军进攻上海的隆隆炮声震得列强们再也坐不住了，正式的国际裁军会议终于在瑞士召开了，62国的4000名代表云集日内瓦。会议开始后，各大国抛出了五光十色的裁军方案。由于大国之间特别是法、德之间矛盾尖锐，吵成一团糟，因而经过5个多月的唇枪舌剑的交锋后，会议还是毫无进展，分歧依然存在，许多小国的代表因失望和愤慨纷纷

拂袖而去。裁军会议只好在1932年7月23日通过一项折衷性的空洞方案，其中建议对各国陆海空军装备“进行有实质性的裁减”，“主要目标在于缩减侵略的手段”。这个方案既无具体的数字，也无确切的比例，列强谁会买帐呢？裁军会议第一阶段会议就这样收场了。

这时，老奸巨猾的德国又乘机来了个釜底抽薪，它以未能恢复军备平等权为由拒绝接受上述方案，并于1932年9月宣布退出裁军会议。这一下更引起了列强的惊慌，它们赶快妥协，又是叩头又是许诺，德国才又重返裁军会议。

裁军会议于1933年2月2日复会后，法、英两国又抛出了新的裁军方案。这时，德国的丑闻败露了，它不但加快重整军备的步伐，而且大肆迫害犹太人而使后者被迫向国联投诉。这一下欧美舆论大哗。这就给了早就对又臭又硬的德国火冒三丈而又找不到发泄借口的英、法两国一个整治德国的机会。英、法声称，德国现在根本没有资格谈裁军，没有发言的权利，它们一致要求在裁军之前先对德国建立军备监督制度。德国恼羞成怒，又露出一副十足的地痞无赖

祠，于10月再次宣布退出裁军会议。

1933年12月，希特勒干脆明目张胆地提出允许德国征兵30万、拥有《凡尔赛和约》禁止的武器、归还鲁尔等作为它参加裁军谈判的条件，遭到法国的一口回绝。此后，裁军会议就只是在制造、买卖武器的监督及军事预算的公布等不痛不痒、枝枝节节的问题上徘徊，裁军的希望就像一个肥皂泡似的，在胀到极限后突然叭地一下破裂了。

尽管如此，国联对裁军问题仍是不死心，于1934年5月底，在悲观的气氛中举行了最后一次裁军会议。劳合—乔治当时曾形象地描述了裁军会议所处的困境。他说"裁军会议很快就要从病床装进棺材了。医生们正在进行最后一次会诊。"然而由于德国的退出和列强军备竞赛的加剧，使裁军会议剩下的那一点可怜的底气也被抽走了，它那细若游丝的气息终于断了，成了一具十足的僵尸，再也无法复活，这样，裁军会议在6月11日正式寿终正寝，见上帝去了。

回想裁军运动从1920年始倡以来，历时14年，涉及到了数十个国家和上万的人员，开了几百次会议，可谓风风雨雨，历尽苍桑，但为什么

最后还是一无所获、回天无力呢?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争霸野心不死。这就像有一个小偷，左手举着捉贼的字条，右手却又插进了别人的腰包。还有，帝国主义之间你争我夺，似乎反正财富是别人的，你能偷，为什么我就不能偷?你偷了大款的口袋，为什么却限制我只能偷小职员的腰包?既然这样，裁军会议还能裁得下去吗?

帝国主义列强在大演“裁军”丑剧的同时，它们的军备却在急剧膨胀，特别是英、美、日三国之间，海军军备竞赛的规模越来越大。

华盛顿会议曾经规定了英、美、日三国的海军吨位比例，但在会后，为了争夺海上霸权，他们在建造巡洋舰、驱逐舰和潜艇方面又开始了疯狂的竞赛。尤其在1927年8月三国裁减海军军备会议失败后，海军竞赛更为激烈。美国首先决定建造6艘大型巡洋舰，日本计划建造4艘万吨级以上的巡洋舰，英国则大力扩建新加坡海军基地。到1933年，美国已造舰37艘，总吨位为19.289万吨。英、日的速度则大大超过了美国。英国共造舰139艘，总吨位达45.0726万吨，日本的造舰数为154艘，居三强之首，总吨

位达38.1944万吨。

与此同时，德国也磨刀霍霍，厉兵秣马。1925年，德国的海陆军费用还只有4.9亿马克，但1928～1929年便达到了8.27亿马克，4年之中增长了近1倍。1928年，德国政府还拨款8000万马克，决定建造万吨级的装甲巡洋舰，并准备以后再造多艘，组成一支庞大的舰队。显然，无论是《凡尔赛和约》，还是历次裁军会议，都未能阻止德国扩军备战的步伐。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全面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由秘密扩军转向公开扩军。1934年，德国正规军已有29万人，冲锋队、党卫军等半军事化组织达140余万人。接着，希特勒公开撕毁《凡尔赛和约》，一步步走向战争。

帝国主义者出门扛着国联的大旗，将“和平”、“裁军”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回家却又急忙趴在办公桌上绘制作战图，并把口袋里仅有的几个硬币全投进军备生产那张开的大口。面对这种双簧戏，他们居然还能演得一本正经、有板有眼、脸不红、心不跳，这种表演天才，恐怕即使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表演家也要自愧弗如、叹为观止了。然而，他们的这种拙劣把戏，岂不正

是对国联裁军会议的一个绝妙讽刺么?

道威斯计划和洛迦诺会议后，法国在欧洲的地位一落千丈，处于英、德夹击的不利态势，法国于是试图从欧洲以外寻找盟友。

1927年4月6日，是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0周年纪念日，法国邀请了几千名参加过欧战的前美国志愿军访问巴黎。法国外长白里安利用这个机会竭力讨好美国。他在盛大的欢迎仪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声称法、美的友谊“不可磨灭”，法国政府愿意和华盛顿缔结友好条约。6月20日，白里安正式照会美国驻法大使，提议美、法两国缔结“永恒的友好条约”。法国的用意在于通过双边条约，获得美国的财政援助，并利用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加强自己在欧洲的威望和地位，以便与英、德抗衡。

美国深知法国的目的和用意，但是，单独加强法、美关系，对美国并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但美国如果断然拒绝这个“和平”建议则会陷入被动，因此决定将法国的建议拔高，用更高的反战调门提出来。所以，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在1927年12月28日给法国的复照中说，放弃以战争作为执行国家政策工具的条约，不仅应由两国

缔结，而且应由各国缔结。美国想把白里安建议的双边公约，变成一个多边的国际公约。这不仅可以树立美国“爱好和平”的形象，而且可以通过普遍公约的形式来取代英、法控制下的国联，以提高美国的国际地位。

本来，法国原来是想将美国当枪使，为自己撑腰壮胆，至于打出“和平”的旗号，则纯粹是叶公好龙、掩人耳目，因为战后法国的外交基点都是用战争防止德国的再起，怎么可以设想要它与德国一起来承担非战的义务呢？但美国的反建议同样冠冕堂皇，令人无法公开拒绝。法国在骑虎难下的形势下，先是对多边公约提出4项保留条件，继则在与美国的谈判中磨磨蹭蹭、拖拖拉拉，妄图用拖延战术将此事拖黄。

美国识破了法国的这一伎俩，乘机反攻倒算。它中断了同法国的谈判，并于1928年4月13日单方面令其驻德、意、日的大使，将美、法的提议原件和历次谈判的换文送交各驻在国政府，请它们对美法双方的争执表示意见。

德国在4月下旬首先做出答复。德国非常庆幸针对德国的法、美协定的流产，自然拥护美国的主张，并希望能借此获得“热爱和平”的名

声，以掩盖其加紧进行的扩军备战。英国在海外有大量的殖民利益，这是维护大英帝国的生命线。很难设想，它能同意放弃对殖民地的武装侵略和军事镇压。但英国同样害怕落个“不愿和平”的罪名，它在提出了保留条件后，还是同意了美国的建议。日本原则上同意，但也声明保留所谓“自卫”权，宣称“满洲对它自卫的重要性，并不下于苏伊士运河对英国和巴拿马运河对美国的重要性”。法国政府见美国即已将此事抖露出来，如此时法国反悔，岂不是证明自己原来的和平口号纯系伪装？还有，既然上述三国都已同意，如法国拒绝，法国势必冒天下之大不韪而陷于众矢之的、更加孤立的地位。因而法国除了暗骂美国的阴险毒辣外，毫无办法，只好也在提出保留条件后，无可奈何地承认了美国的草案。

1928年6月23日，经过修改后的多边公约的条文，送达《洛迦诺公约》各签字国及英国各自治领。8月27日，这项多边公约在巴黎举行签字仪式，美、法、英、德、日、意等15个国家参加了签字。这就是所谓的《非战公约》，也叫《巴黎公约》或《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公约签订的当天，还由美国政府出面发出照会邀

请中国等33个国家参加。因此后来在公约上签字的共有48个国家，至1933年，加入该公约的总计有63国。

公约的全部内容共3条：第一条声明各缔约国放弃以战争作为执行国家政策的工具，谴责用战争来解决国际纠纷的行为；第二条规定缔约国之间可能发生的一切事端与冲突，不论其性质或起因如何，只能用和平方法加以处理或解决；第三条规定各缔约国对于本公约应以各国宪法规定的手续批准，并规定了其他国家加入本公约的手续。

《非战公约》的发起国，起初并未邀请苏联参加，苏联政府对此提出强烈抗议，美、英、法十分不安，不得不邀请苏联加入公约。9月6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决定加入《非战公约》，但宣布不承认其它签字国对该公约所提的任何保留条件。

《非战公约》签订后，在国际上又引起了一阵铺天盖地的和平喧嚣。白里安洋洋得意地说，1928年8月27日是"人类历史新纪元的第一天。"自此以后，自私的和故意的战争，都将被全世界一切有正义感和良知的人们视为非法的

了。凯洛格也踌躇满志地宣称，公约“将是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实际保证，这件事本身就是对人类的一个巨大的功绩。”但是，我们冷眼观察便可发现，面对当时激烈的军备竞赛，公约却对裁军问题避而不谈，只字未提，在这个实质性的问题面前绕着走。对于违反公约的国家，也只是在那里空叫制裁啦、谴责啦，但拿什么去制裁呢？又怎样制裁呢？对于厚颜无耻的侵略者和疯狂的战争分子，仅张着嘴讲信义和平或者口诛笔伐，这岂不是跟拿着滴血的屠刀的强盗讲《圣经》吗？而且，帝国主义国家还对公约提出了各种保留条件，它们仍然可以在“自卫”的幌子下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既然每个签字国都是自己自卫行动的唯一判断者，既然它们当中的两个最大的国家（指英美）对这个字眼作了广泛的解释，那么就公约而言，采取军事行动的大门岂不还是敞开着的吗？

20世纪20年代的10年时间里，尽管一战的阴影尚未在人们心中完全散去，然而帝国主义国家立即扩军备战，霍霍磨刀。既然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已日益土崩瓦解了，那么阻止帝国主义争霸，防止新战争的第一道防线就不存在

了。接下来的裁军活动虽延续了 13 年之久，但最后也落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结局，这又表明支撑和平大厦的唯一一根大梁的腐朽断裂。最后，以世界和平守护神面目出现的《非战公约》又徒有其名，虚有其表，那么试问，在制止和延缓战争这个魔鬼那急速的步伐面前，还有什么防线和机会呢？更令人担心的是，德国反动派军人的心又跳动起来了，德国资产阶级又蠢蠢欲动了，既然他们今天即已怀恨在心、杀气腾腾，那么谁又敢保证他们明天不会大开杀戒，再来一次可怕的血腥冒险呢？

第五章　款款走上历史舞台的凶神

蜗居于弹丸小岛上的东方小国日本，向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打响了第一枪，一个新的世界战争策源地在东方形成了

日本是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自从明治维新以来，它的侵略野心日益膨胀，总想靠发动侵略战争来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它的扩张目标，首先是吞并中国，将其变为日本的战争后方基地和大本营，然后再横扫亚洲并进而称霸世界。

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九国公约》，使日本对中国的扩张受到限制，这是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国主义绝对不能容忍的，因而它此后一直心怀不满，时刻寻找着卷土重来的机会。

1927年4月，日本著名的军国主义分子田中义一大将登上了日本的权力宝座，出任首相兼外相。这个劣迹斑斑的好战分子，刚一上台即露出了屠夫般的凶神恶煞相。他一方面埋怨前任内阁太懦弱无能，屈从华盛顿会议的决议，宣布要对中国实行“铁血”政策。另一方面，他认为以前长期主宰日本对外方针的币原和平外交政策实在碍手碍脚，因而干脆一脚踏开了这个资产阶级民主和平外交的假道具而将最激进的军部势力推上前台，建立起以积极侵略中国为目标的军部田中外交。

在战争的拥护者和鼓动者已准备好了之后，日本立即制定了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总纲领。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内阁召开了东方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外务省、陆军省和海军省之外，还有驻外军队首脑及日本驻华代表。会议讨论了日本对华政策，并炮制了《东方会议宣言书》。这是日本侵略扩张，妄图称霸世界的总纲领。

会后，田中向天皇呈递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奏折说：“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满蒙

权利真果归我所有，那么，就可以用‘满蒙’作基地，假借贸易来征服中国400余州，就可以利用‘满蒙’的权利来攫取中国富源，再利用中国的富源，征服印度及南洋群岛，并进而征服中小亚细亚以及欧洲。”东方会议认为，日本侵略中国的主要障碍是美国和英国，特别是美国。因此，“必须采取铁血主义”，首先打倒美国，而且“应该以防止赤俄南下为尺度”。为了实现这一狂妄野心，日本甚至不惜冒同其它帝国主义进行世界大战的风险。因此，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一向田中问：“只要把这一方针付诸实行，必须认识到将会因此而引起世界大战……在引起世界大战的情况下，怎么办？你有这样的决心和准备吗？”田中当即回答：“我有决心。”武藤说：“只要政府有这样的决心和准备，就没有什么可说的。无论何时，只要命令一下，我们就执行这一政策。”

中国东北资源丰富，地广人稀，而且那里山河易守难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日本看来，占领东北不仅可以作为南侵整个中国大陆的跳板，而且可以作为北进苏联的桥头堡。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在1931年的一次讲演中说：

“在对俄作战中，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线。因而，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大关系。”因此，吞并东北是实现《田中奏折》侵略计划的关键性步骤。

“确保满蒙”，一直是日本对外政策的基本战略目标。然而令日本人头痛的是，统治中国东北的土皇帝张作霖已越来越难以控制了，大有同日本分庭抗礼之势。日本在气急败坏之下，干脆将其秘密炸死。然而，继任的张学良比他老头子走得更远，干脆公开宣布东北易帜，接受亲英、美的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这对多年控制并经营东北的日本，无疑是当头一棒。面对这种情况，日本觉得有必要武装占领东北了，并且越快越有利。

1929 年，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大危机爆发了，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扩展到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日本国内市场狭小、资源缺乏，经济发展依靠外贸，尤其是依赖美国，因而日本不仅较早地受到经济危机的打击，而且由于先天不足，家底不厚而倍感痛苦万分。一时生产下降，外贸锐减，罢工运动此伏彼起，国内怨声载道。国外，朝鲜和台湾高山族人民又乘机掀

起了反日大起义。面对国内外日益尖锐的复杂矛盾，日本大有穷途末路的感觉，怎么办？日本统治集团决定铤而走险，对内加紧法西斯武力统治，以国民经济军事化来刺激生产的恢复和镇压人民的反抗，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抢占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

为了实现对中国的侵略，日本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精心策划和准备。在舆论方面，日本报刊掀起了歇斯底里的军国主义宣传，叫嚷日本人不应“站在旁边而让南满铁路垮台”，必须动用武力执行“满洲是日本生命线”的政策，鼓吹早日采取行动。在军事方面，日本政府紧锣密鼓地进行布署，调适应寒冷地区作战的第二师团到东北，任命本庄繁为关东军司令。1931年6月，日本制定了《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7月，陆军省把这份大纲作为指令传达给关东军司令，从而确定了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行动方针。为了掩盖自己的强盗行径，日本还大肆制造反苏反共的阴幕，无耻地胡说什么日本负有“解除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保卫亚洲的文明和秩序”的使命。

日本虽有那贼胆，但毕竟投鼠忌器，因而它

便仔细观察当时的国际形势，以决定行动的时间。然而上天不睁眼，此时的世界形势却给这个宵小之徒以可乘之机。及至1931年，世界正处于经济危机的最痛苦的痉挛阶段，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帝国主义国家都焦头烂额，自顾不暇。美国正深陷这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并忙于对付后院中南美洲势若燎原的反美斗争；英国正为本身的金融危机和最主要的属地印度的独立运动而疲于奔命；帝国主义之间，特别是英、美两国的关税战、货币战、市场战正打得难解难分，根本不可能联合起来对付日本，而国联又徒具虚名，无力进行干涉；在中国，蒋介石正忙于内战，倾全力在围剿红军；另一方面，各帝国主义还指望利用日本来牵制苏联。日本侵略者认为这是天赐良机，便先后发动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作为试探之后，它便准备大干一场了。

1931年9月18日晚10点，日本关东军将沈阳北郊柳条湖地区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自行炸毁，反诬是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20分钟后日军便用240毫米重炮向沈阳北大营猛烈攻击。19日凌晨，日军攻占了东北军司令部北

大营和沈阳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接到报告后下令全线出击，并向驻朝日军求援。这样，日军蓄意制造的、公开武装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面前，南京国民党政府为了集中全力消灭红军，竟不惜出卖民族利益，采取绝对不抵抗主义。这样，日军更是毫无顾虑，因而乘机四面出击，在18个小时内占领了沈阳、长春以及南满铁路沿线所有一切重要据点。9月22日占领吉林，控制了吉林省。次年1月攻陷锦州，2月北犯黑龙江。短短4个月，日军就占领了东北全境。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公开使用武力重新瓜分世界的第一个重大行动。它严重地破坏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所奠定的国际“新秩序”，打破了帝国主义各国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均势；同时，它也是对国际联盟盟约和《非战公约》的公开挑战。

但是，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不但不予制止，反而姑息养奸，采取纵容和妥协的政策。这是因为：英、美、法的在华利益主要集中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在东北

的利益远没有在关内那么大。同时，日本侵略东北是打着“防共”、“反苏”的旗号进行的，而英、美、法等帝国主义乐于借日本之手镇压中国的革命运动，更想推动日本向北扩张，侵犯苏联，使日、苏两败俱伤，以坐收渔人之利。

“九·一八”事变后，美国对日本的侵略行为仅仅停留在“惊讶”和“遗憾”上。直到1931年10月5日，日军占领锦州，大有向关内推进之势，美国才对日本提出警告。1932年1月7日，史汀生国务卿向中、日两国发出照会，宣称“美国政府不能允许任何事实上的情势的合法性，也不拟承认中、日政府或其代理人间所缔订的有损于美国或其在华国民权利的条约——包括关于中华民国的主权、独立或领土及行政完整，或关于通称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对华国际政策在内的任何条约或协定；也不拟承认用违反1928年8月27日中、日、美均为缔约国的巴黎公约之条款与义务的方法而获致的任何局势、条约或协定。”这就是所谓的“不承认主义”或“史汀生主义”，它被吹嘘为树立了“制止军事征服的正式障碍物”，是“建立国际阵线以保护中国，反对日本侵略的尝试”。其实，这纯属欺人

之谈。说开了，美国的意思就是，日本在东北愿怎么干就怎么干，我们管不了，也不想管，只要不把手伸到了关内我们的地盘上就行了。

2月16日，国联理事会表示支持“不承认主义”，并要求日本履行《九国公约》中所应承担的义务。但日本看透了西方国家的软弱态度，根本不予理睬。对此，美国居然不做任何表示，英、法两国也一声不吭。美、英、法对日本的姑息态度，更加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代表施肇基在国联理事会上揭露了日本侵略的真象。9月22日，国联理事会通过了要求中、日双方撤军的决议。9月30日、10月23日，国联又两次做出决议，限定日本的撤军时间，日本仍置之不理。在中国代表一再要求下，11月21日，国联大会通过了组织调查团到中国东北进行实地考察的决议。

1932年1月21日，负责调查中日关系问题的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了，它的成员选自英、美、德、法、意5国，英国驻国联代表李顿任团长，史称“李顿调查团”。当时，日军正如狼似虎地在东北到处横行骚扰，中国东北数千万人民正惨遭日军铁蹄的蹂躏，正处于水深火热、度

日如年的惨境。然而调查团成立后，却行动迟缓，拖拖拉拉，直到2月3日才从欧洲出发前往远东。更令人不理解的是，它不取道西伯利亚这条通往中国东北的捷径，而是舍近求远，绕道西行，先去巴黎、伦敦、华盛顿，会见各国政要，然后又横渡太平洋到日本东京，会见日本天皇和政府官员，就是迟迟不到“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现场中国东北。

国联调查团的这种牛步战术又给了日本以可乘之机。早在1931年4月，日本就曾讨论在中国东北进行殖民统治的方式。“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日本决定在中国东北建立脱离中国的独立的亲日政权，开始策划建立伪“满洲国”。此时日本帝国主义见调查团一时不会到达中国，便乘机加快了策划成立伪“满洲国”的步伐。1932年2月16日，在日本关东军“自治指挥部”的导演下，成立了伪“东北最高行政委员会”。2月18日，该委员会宣布东北脱离中国而“独立”。3月1日，伪“满洲国”在长春宣告成立。清朝废帝溥仪被抬出来任“执政”（后称皇帝），原满清官员郑孝胥、地方军阀张景惠等也粉墨登场，出任内阁大员。这样，日本就给东北

的被占领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它振振有词地说，这明明是中国地方政府自愿脱离中央而独立自治；且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哪里是日本侵略造成的呢？它既能蒙骗世界舆论，又可应付国联的调查。

在伪“满洲国”成立后，国联调查团的老爷们总算姗姗来到了中国，于3月14日抵达上海。然而，它又在那里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调查中国的“一般形势”，直到4月20日才到达东北。

经过半年的调查，调查团于9月4日写出调查报告书，10月1日在日内瓦由国联发表。报告书混淆侵略与被侵略的界限，硬说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是“中、日冲突的重要原因”，而“从苏联来的共产主义目前的传播”是研究东北问题“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因素”，中国革命运动“使日本受害较其他国家为大”。但报告书也不得不承认“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认为日本的军事行动不是“合法的自卫手段”，而是“以强力侵吞并占领了确属中国领土的广大地区”，是违反国联盟约、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的。关于伪“满洲国”，报告书的结论说：如果没有日军的驻扎和日本官员的活动，这个“新国家”是不

3

能够成立的；它没有得到普通中国人的支持，它不能被认为是出于真正的和自发的独立运动的产物。报告书提出的解决东北问题的办法是：既不应该维持“满洲国”的现状，也不应恢复“九·一八”事变以前的形势。鼓吹在东北实行所谓“高度自治”，成立“自治政府”，聘请外国顾问，中、日一切武装力量都从东北撤退，另组织特别宪警作为东北唯一武装力量。报告书表明，西方帝国主义既要对日本妥协，又想分沾利益。它们不甘心让日本独占东北，而是企图把它变为列强共管的殖民地。

1933 年 2 月 24 日，国际大会通过决议，基本上接受了调查报告，并声明对伪“满洲国”不给予事实上或法律上的承认。日本顽固地坚持独占中国东北的方针，岂肯把已到嘴的肉吐出来，再与他人分享？因而日本断然拒绝了国联共管东北的主张。决议通过后，日本代表松冈洋右立即退出了国联大会会议厅。3 月 27 日，日本宣布退出国联。

日本蔑视国联决议，率先退出国联，是对国际联盟的一次沉重打击。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和退出国联，撕毁了战后所缔结的一系列国际协

定，打破了远东国际关系的格局。这清楚地表明，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进一步激化了。

在发动侵华战争的同时，日本国内的法西斯分子掀起了一股支持侵略的狂热。但是，一部分极端军国主义分子感到日本的政党政治还是太温和与保守，不能从根本上按照他们的激进原则行事，因而他们极力制造事端，力图壮大军部的实力，将强硬的法西斯铁血军人推上政治舞台，而完全踢开带有民主色彩的政党政治内阁，以便最大限度地满足其侵略愿望。法西斯分子桥本欣五郎说：

"在满洲惹起事变后，政府不追随其后，军部若断然实行'政变'，满洲问题就易于贯彻到底。"

1931 年 8 月 1 日，全日本爱国者协同斗争协议会机关报《兴民新闻》提出：

"把满洲问题的激化，变为国内改造的动力！"

石原莞尔于 1931 年 5 月在《满蒙问题之我见》中写道：

"特别是战争初期，军事的成功，使民心沸

腾团结，乃历史所示。……我国国情，毋宁速驱使国家向外突进，根据途中状况，断行国内改造，较为适当。”

1932年，“五·一五事件”爆发，海军少壮派军官刺杀了首相犬养毅。随后，由于大选中获得多数议席的政友会未能组阁，极端军国主义分子见废除政党政治的机会终于来了，便胁迫元老们推荐海军大将斋藤实出任首相，组成所谓“举国一致的内阁”。这样，政党政治终于寿终正寝了。法西斯军人既已大权在握，因而他们不必通过发动政变便已能实现军部的专制统治了。但他们在如何实现政治上的变革问题上，又立即发生了争吵，出现了“皇道派”和“统制派”的对立。

“皇道派”主张采取激进路线，急于通过政变去改变现状，认为“属于统治阶级的现有政党、财阀及一部分特权阶级都已腐化坠落，狼狈为奸，”“都必须统统打倒，回返到天皇直接统治，”“以皇道大义统一人心的归回。”

“统制派”认为应该通过合法途径去改变现有政权结构，在“容纳财阀”和容许现有各种政治势力存在的条件下树立军部的支配力量，建

立天皇制下的法西斯专政。

两派互相指责、谩骂，终于酿成1936年的“二·二六兵变”。以皇道派为主体的少壮派军官企图推翻政府，完全建立军人的直接独裁统治，但很快被镇压下去了。但是，“二·二六”事件却仍然成了日本政治、历史乃至整个国家和民族命运的转折点，因为此后组阁的广田弘毅是一个法西斯分子和军部的忠实走狗，他从组阁到施政方针，完全按照军部的旨意而决定，军部已完全控制了内阁，日本终于建立起军部法西斯专政，完成了从滨口到广田的转变。从此，军人成了日本政治中的决定力量，主宰国家命运的是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为主的内阁，军部和大本营则成了他们执行侵略扩张政策的工具，整个日本成了一座大兵营，一切都是由军人说了算，有时连天皇也要让他们三分。这样，日本法西斯更加疯狂地扩军备战，远东战争策源地最终形成了。

1937年7月起，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从此，日本便成了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纵火犯和战争狂人。

1933年，在德国，一个昔日维也纳街头的流浪汉和一战时的下士，竟然当上了总理、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的总司令。不仅德国掀开了历史上最沉重的一页，而且欧洲以至整个世界的悲剧命运也从此开始了

在巴黎和会上，战胜国帝国主义者对德国进行了空前的掠夺和奴役，然而就在胜利的呼声中他们却干了一件天大的蠢事。凡尔赛体系的建立，并没有给欧洲带来“持久的和平”。在巴黎和会上，德国被作为战败的罪犯来处理，然而德国既不是唯一的战争罪犯，也不是真正的失败者。4年的大战始终是在德国的境外打的，德国的社会结构基本上未受损伤，军国主义传统依然存在，就连它的军队也是完整地从别国领土上撤回来的。《凡尔赛和约》对德国进行了百般的限制和掠夺，简直苛刻到了极点，而协约国集团却又野心大、实力弱，其保障体系又十分脆弱。这就像把一只捕获的老虎装入囚笼以待慢慢吃它的肉、剥它的皮，但囚笼的却是用木条

订成的并且还被虫子早就蛀坏了。因此，丘吉尔称之为“胜利者所做的蠢事”。

就在战胜国在巴黎对德国百般凌辱时，在德国诞生了一个只有6人的小党。然而，就是这个极不起眼的小党在以后主宰了德国的命运，并向协约国展开了全面清算，直打得它们丢盔弃甲、叫苦连天。1919年9月，一个衣衫褴褛、穷困潦倒，正靠给慕尼黑军队当三流密探糊口的男人，加入了那个小党——“德国工人党”，并成为该党的第七名委员，他就是后来令世界发抖的盗世奸雄阿道夫·希特勒。

不久以后，这个小党将旧招牌拿下，改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缩写音译为“纳粹党”)，希特勒成了它的头子。当时谁也没有料到，这个奥地利出生的一个妓女和一个泥瓦匠的私生子、一个经常在维也纳街头晃来荡去的流浪汉、一个一战时的下士和一个被维也纳美术学院拒于站门的落榜者，10年后竟然成了德国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并使得欧洲和世界血肉横飞、硝烟弥漫、陷入了长久的痛苦之中。这一现象看来太令人不可思议了。难道是这么一个天生愚劣的家伙，得到了神的资助而脱胎换骨，

变得手眼通天、法力无边了吗?还是上帝因为维也纳美院顽固的院长拒绝了一个在绘画方面天资不错的求学者而使人类绘画史上又少了一名杰出的画家而特意要给人类一点惩罚呢? 答案远没有这么神秘玄妙,它只有一个且很简单:在德国本身。

尽管凡尔赛体系将德国割得皮开肉绽,肢解得体无完肤,然而它却遗漏了这个囚犯身上最重要的一个器官——发动战争的顽强跳动的心脏。德国的垄断资本在战争中并没有受到多少损伤,工业生产能力仍超过英、法而居于欧洲国家之首。虽然割让了一些领土,但德国的人口仍比英、法、意任何一个西欧国家都多。德国国防军人数虽被限为10万,但精锐的军官团却保留了下来,可以随时为百万大军提供各级军事指挥干将。苛刻的条款没有长久限制德国的复兴,却招来了全体德国人民的不满和仇恨,从而为民族沙文主义和民族复仇主义提供了沃土和温床。帝制虽然被打翻在地,资产阶级共和制却没有扎下根。魏玛共和国是在镇压十一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它不仅从一成立就先天不足,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且还处处不讨好,成为受气

筒。它成立之初就代人受过，在战败的和约上签了字，成了屈辱的象征，所以工农群众憎恨它，垄断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等保守势力却又嫌它对人民过于宽大、统治不力；军队成了国中之国，却并不忠于政府，像游魂一样荡来荡去，一旦鬼迷心窍、心血来潮时便要张牙舞爪，犯点事。就是在这种乱成一团的局面下，纳粹党趁机像一株爬山虎一样，死死地缠住了陆军这棵大树，并在其荫庇之下而成了一株疯长的毒草。

1920 年，希特勒抛出《二十五条纲领》，以通过欺骗宣传收买人心，扩大纳粹党的影响。纲领宣布要建立一个包括所有日耳曼人的中央集权的大德意志国家，“要求土地和殖民地”，“彻底打击马克思主义”，“彻底消灭犹太人”。向工农大众提出了“取消不劳而获的收入”、“将托拉斯收归国有”、“分享大工业的利润”、“取消地租”等种种许诺。这些狂热的鼓动宣传顿时像一阵强大的旋风，在德国那本来就不甚平静的政治生活的海面上，激起了层层大浪。濒临破产的小资产阶级和城市下层居民像注射了兴奋剂一样，立即从那冬眠般的慵懒困倦中苏醒过来而变得精神抖擞、跃跃欲试了，他们趋之若鹜地投

到纳粹党的门下而宣誓效忠，表示愿在党旗的指引下而奋勇向前；流氓无产者和退伍军人更是领先一步，他们组织了冲锋队，甘当打手，声称愿为前驱；一些反动的垄断资本家也纷纷解囊相助，一时间，成堆的马克像流水般地涌进了纳粹党那大大小小的党费箱。这样，纳粹党就像一个缺乏兴奋剂已久而在一夜之间又获得了成堆海洛因的吸毒犯一样，比任何时候都狂热了，在以慕尼黑为中心的北德地区迅速发展了起来。1923 年 11 月的一个寒气袭人的夜晚，在慕尼黑最大的一家酒吧间，一大群纳粹党徒高举着成桶的啤酒而喝得东摇西晃，迷迷糊糊。也许是过量酒精的刺激所致，半夜时分，这帮酒气熏天的醉鬼却突然操起了随时所带的短棒、铁棒、扳手等，像一群疯子似的扑向警察局、电报大楼、市政府办公大楼等单位，见人就打，见东西就砸，一时搞得乌烟瘴气、人心惶惶，这就是所谓的"啤酒馆暴动"。共和国政府立即出动大批宪兵和警察进行镇压。等到这帮家伙那发昏的脑袋被警察手中的大棒敲醒了后，他们才沮丧地发现，他们的头子希特勒却不见踪影了。

啤酒馆暴动失败后，希特勒被捕入狱。然而

这个戴着镣铐的囚徒，不仅没有丝毫知错悔改的意思，不仅没有低下他那高傲的头，而且更多的是在脸上表现出一种殉道般的慷慨激昂的神情。他背着双手，站在监狱那狭小的窗户面前，透过铁栏杆而远望遥远的天际，一字一句地口授他的行动纲领、德国未来的生存指南——《我的奋斗》一书。他咬牙切齿地宣称，除日耳曼民族外的其他种族都是劣等民族，都应在日耳曼民族的控制之下，这是上帝的旨意，神圣而不能违抗。接着，他又愤愤不平地发誓，德国以其辉煌的过去和在世界上的显赫地位而言，岂有被束缚在今日这过于狭小的版图内而不去争取生存空间的道理？我们要向东方突进，把俄国从欧洲国家的名单上永久地划掉！

1924年底，希特勒被释放出狱后，发现处境困难，其时的纳粹党已被取缔而作鸟兽散，原来的一些小头目不是亡命他乡便是发生内讧。他的政治活动也大受限制。德国的状况似乎变好了一些，面包又多起来了，机器又转起来了，人们好像对纳粹党的狂热已大为减退而甘愿流连于昔日那死水般的平静生活，又慵懒疲倦如前了。希特勒顿时感到有一丝酸楚涌上心头，暗

中叹息党国的不幸和国民的愚钝麻木。然而，希特勒毕竟是一个能审时度势、当机立断的政治巨枭。他认为，与其再明火执仗地大叫大嚷而遭到杀身之祸且不为国民所支持，不如改弦更张、另谋他途。因此，主意既定，希特勒决定另起炉灶，一改前策，走争取多数选票，通过议会取得政权的道路。这样，虽憋气一时，但在和平的面纱下也许更能得寸进尺。况且，这也并非下策，而是一种以退为进、打进去拉出来的弹性战略，以后一旦纳粹党羽翼丰满，不是就可以纵横天下了吗?想到这里，希特勒脸上掠过了一丝不易为人觉察的奸笑，他又开始重建纳粹党，加强对党内的思想和组织的控制，使该党更加符合垄断资本家的利益。同时，他又施展浑身解数，鞍前马后地向德国各权势集团，首先是重工业垄断资本家游说许诺、献媚讨好，以博取这些财神大款对纳粹党的好感和支持。1924～1929年，德国处于风调雨顺的相对稳定时期，社会上又出现了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然而，就是在这种和平氛围中，纳粹党却不喊不叫、不急不躁地壮大起来了。它不仅争取到了相当一部分垄断资本的资助，而且将其支部像神经网络图一样延伸

到了全德国的各个角落，使一个昔日巴伐利亚地方的小团体在不知不觉间扩展成了全国性的政党。

1929 年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对德国的打击特别沉重。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既不能效法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把部分危机转嫁到殖民地、附属国人民头上，就只有加强对国内的劳动人民和其他低收入者的压榨和剥削。但这又使国内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全国工农运动此伏彼起，一浪高过一浪。1930 年，全国工人大罢工 360 次，1931 年增至 500 次，而 1932 年 9～12 月就达 1100 次。仅 1931 年就有 250 多个庄园的农业工人向庄园主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在沉重的经济危机和汹涌的革命浪潮冲击下，德国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发生动摇。他们感到，再也不能用国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旧方法来实行统治了，决心采用恐怖的法西斯专政，企图通过残酷地镇压国内革命和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来摆脱危机。这样，就形成了法西斯头子上台的最合适的政治气候。

当然，希特勒也精明过人，自然不会放过这天赐良机。他凭借垄断资本家提供的大量金钱，

趁机对陷于困境的千百万群众开展了蛊惑人心的煽动和宣传，并收买大批的打手。也许，你从相片上看，这个身材瘦长、留着一撮小胡子、随时将油光闪亮的头发梳成一边倒的希特勒，似乎并没有什么过人之才。然而，他绝对是一个一流的演说家和雄辩家。他在演说时，将国家、民族利益等漂亮词句可以信手拈来，随口而出。从德国的前途到世界形势，从纳粹党的党义到日耳曼民族的历史，他不仅背得滚瓜烂熟，滔滔不绝，而且在演说时他除了侃侃而谈、大有翻江倒海的气势而外，给人印象最深似乎他还是一位十分资深的国际问题权威，随时都能高瞻远瞩、明察秋毫，而且大有天下大任舍我其谁的豪迈气慨，往往让观者动心，听者着迷。结果，许多小资产阶级、白领工人、工人阶级的落后阶层中形形色色的落后分子和小农成了他的宣传的俘虏，蜂拥而至，因而纳粹党顿时门庭若市、人才济济。党员从 1925 年的 2.7 万人激增到 1930 年的 38 万人，冲锋队员增至 30 万人。1930 年 9 月 14 日国会选举时，纳粹党得到 640 万张选票，比 1928 年增加 37 倍。在国会中的议席也从 19 个增至 107 个，从位居第九的小党一跃而为

第二大党。

纳粹党在选举中的胜利，使垄断资产阶级对它更是刮目相看、恩宠有加。1931年10月11日，德国的垄断巨头、大地主、国防军的代表与希特勒等纳粹党头目在哈尔兹堡举行会谈。会议决定，法西斯组织和其它右翼党派要实行联合，共同支持希特勒上台，从而结成了所谓“哈尔兹堡阵线”，阴谋在15个月后建立法西斯专政。会议决议说：“为了决心保卫我们国家不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骚扰，坚决通过有效的自助把我们的政策从经济破产的漩涡中挽救出来……我们要求恢复德国的防御主权和军事均势……任命真正的民族政府。”

1932年1月27日，300多名大腹便便、肠腹脑满的德国垄断资本家大财主又云集杜塞尔多夫，召开会议。会上，希特勒更是不放过任何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　特别是显示他那巧舌如簧的才能。尽管他的演说十分冗长，但与会者却精神饱满、神情专注，毫无困倦之色。因为，他不仅和盘托出了法西斯的反动政纲，而且提出了一大堆吊人胃口的诺言。他板着面孔、高举右臂地保证，一旦执政就决不能再听任工人那样

“胡作非为”，“要根除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并“用刀剑之力创造民族振兴的前提”，以夺取“新的生存空间”。希特勒的讲话博得了到会资本家的热烈喝采，掌声、呼叫声经久不绝，声震屋瓦，垄断巨头蒂森竟当场振臂高呼：“希特勒万岁！”

正当希特勒在国内如鱼得水之际，英、美等国也趁机对他暗送秋波、大加赞赏。这是因为英、美面对德国的革命危机以及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也急需希特勒这样的人物出来执掌政权。英、美的一些大垄断巨头毫无迟疑地掏出大把金币投进纳粹党的钱箱。1930年，摩根、洛克菲勒和杜邦等人特别邀请德意志国家银行总裁、纳粹党的狂热支持者沙赫特访美，听取他对希特勒的主张和纳粹党活动情况的介绍，策划扶植希特勒上台。1931年6月1日，《纽约时报》毫不掩饰地说：

“假使任命阿道夫·希特勒继任，那就显然在华盛顿更孚众望了。”

1932年春天，德国成了全世界瞩目的焦点，上至外国元首、下至新闻记者，无不用眼睛在世界地图上将德国扫过去、瞄过来。德国的主要电台收听率直线上升，主要日报发行量空前陡涨。

这是因为德国即将举行总统选举，而选举结果，不仅将决定德国的命运，也将极大地左右世界的前途。

总统选举开始，右翼党派联合提名兴登堡元帅和希特勒为候选人。纳粹党为此进行了德国历史上前所未闻的竞选活动，张贴了100多万张宣传画，散发了1000多万份党刊和数百万本宣传册子。德国共产党倾全力反对希特勒上台并向社会民主党建议携手对敌，联合提出候选人。社会民主党不但拒绝了建议，而且不提候选人而要支持兴登堡。德国共产党尖锐而沉痛地指出："谁选举了兴登堡，就是选举了希特勒；谁选举了希特勒，就是选举了战争！"社会民主党却以"两害相权取其轻"、"取'小害'（兴登堡）而避'大害'（希特勒）"的理论来强词夺理地为他们的叛卖行为进行狡辩。结果，兴登堡当选为总统。这就为法西斯上台铺平了道路。

1932年夏秋，德国经济危机达到顶点，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纳粹党活动猖獗。在1932年7月举行的国会选举中，中间势力向两极分化。结果，纳粹党获得1370万张选票，330个议席，第一大党的宝座终于归在了它的名下。

1932年11月19日，德国最大的钢铁、煤炭康采恩，化学、电力工业康采恩，轮船公司老板、金融家和大地主的代表沙赫特、蒂森、施罗德、伏格勒、西门子、克虏伯、莱因哈特等人，联名向兴登堡总统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尽快任命希特勒为德国总理。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登上了总理宝座，从此，反动容克地主，康采恩大王和纳粹党头目开始麇集于总理府，把持了国家的大政方针。这样，从这时起，德国历史揭开了最黑暗沉重的篇章。

希特勒夺取政权后，立即着手在各个方面推行法西斯专政。这个专政的基本特征是：公开抛弃以国会制度为核心内容的资产阶级民主制，采用极端的暴力手段，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全面实行恐怖专政。它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残暴、最黑暗、最野蛮的一种典型统治形式。

希特勒见德国社会政党林立，不利于纳粹党的一统天下，因而决定首先消灭民主党派，以建立纳粹党一党专政的党天下。他首先把矛头指向德国共产党。1933年2月27日，纳粹党的第二号头目戈林一手策划了“国会纵火案”并嫁

祸于德共。第二天，由兴登堡签署《帝国总统保护人民和国家的法令》，规定暂时停止行使《魏玛宪法》中的民主自由条款。接着在全国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大约有1.8万名共产党员落入了纳粹的虎口，连著名的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和德共中央主席台尔曼也被他们投入了监狱。

希特勒政府为了使镇压共产党和一切民主进步势力“合法化”，企图通过一项“授权法”，以期授予政府全部立法权。1933年3月，希特勒趁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议员缺席的机会，在国会制造2/3的多数，通过修改宪法的议案。3月24日，在希特勒的威逼之下，国会通过了“授权法”。该法规定，政府有权不通过国会而制定和颁布法律，并且不受宪法的限制，还可以不经任何立法机关的同意而与外国缔结条约。这样，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两大支柱——宪法和国会，被希特勒同时摧毁了，德国政权的民主性从此荡然无存、烟消云散了。

1933年5月，纳粹党解散一切工会，强迫工人加入由纳粹党领导的“德国劳工阵线”。6月，社会民主党被命令禁止活动。紧接着，德国

民族阵线、德国国家党、德国人民党和中央党都相继"自动解散"。7月14日，纳粹政府颁布法律，规定纳粹党为"德国的唯一政党"，任何组织新党的人都得判刑。12月1日，希特勒又颁布了《党和国家统一法》，规定纳粹党是国家的思想支柱，二者不可分离。至此，德国便成了纳粹党的德国，国家政府只不过是执行纳粹党政策的工具和它的附庸而已。

为了加强法西斯统治，希特勒又建立了秘密警察（德语缩写音译为"盖世太保"），由特务头子希姆莱指挥，从而与"冲锋队"、"党卫军"形成了三位一体的严密特务网。这些武装的法西斯匪徒到处横行，像疯狗一样地随意捕人、杀人。他们对革命者和反法西斯战士更是怀着刻骨仇恨，像警犬闻到猎物一样，随时都准备扑向一切目标，结果成千上万的人被投进了集中营，甚至连普通老百姓只要一听到军人那沉重的皮靴行走声和敲门声，也会心惊肉跳。这样，德国简直成了一座白色恐怖的鬼狱，大多数人一天24小时都是提心吊胆、朝不保夕地生活。当时美国驻德大使威廉·多德曾对这种残酷的政治现实做了这样的描述：

“动物——这是我在此间遇到的仅有的幸福者。……当成千上万的人既未经法院审判，也没有任何罪证而惨遭杀害的时候，当居民恐怖得发抖的时候，动物享有着人类连幻想也不敢幻想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由得想变成一匹马！”

更加令人愤慨的是，希特勒政府竟然把残酷迫害犹太人定为第三帝国的正式“国策”。他们竟胡说犹太人要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遭受的困难“负有很大的责任”，在全国开始了有组织、有预谋的对犹太人的迫害，甚至要将整个犹太民族从肉体上消灭掉。从此，犹太人被剥夺了公民权、受教育权等一切权利，财产被充公，公职被剥夺，总之，被剥夺得一干二净。而且大批犹太人还被驱逐出境或惨遭杀害或被投入集中营。更有一部分丧心病狂的纳粹分子，竟然专门挑选皮肤白皙细嫩的犹太姑娘和孩童，然后活剥他们，用人皮做成灯笼罩，当做赏玩物品和工艺品出售！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当血雨腥风弥漫德国大地时，甚至连一些基督教徒也未能幸免。大量的天主教徒被杀害，教士被绑架。教堂中《圣经》被撕毁和烧掉而代之以《我的奋

斗》，圣像前再也不能供奉十字架，只能供奉纳粹党旗。谁要稍微有所不满，便会立即招致杀身之祸。

在文化教育领域，希特勒政府疯狂地摧残进步文化，迫害知识分子，实行法西斯教育。希特勒以“知识会败坏我的青年”为信条，大量焚烧革命和科学书刊。1933年5月10日，在纳粹党头目、宣传部长戈培尔的导演下，在柏林和其它城市，成千上万名学生举行火炬游行，然而当众焚烧马克思、恩格斯、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和海涅、高尔基、爱因斯坦以及另外一些伟大作家和科学家的著作。同时，根据所谓消除学校“超编”的法令，把一些有自由思想和进步思想的科学家和教授全部赶出校门。德国的学校，从小学一直到大学都纳粹化了，教科书全按照希特勒的观点重新编写，学校把沙文主义、民族复仇主义、反犹太主义等作为教育的主要课程，希特勒的著作《我的奋斗》被列为首要的必读书和必修课。希特勒鼓吹：“充分自由的教育就是优胜劣败原则”，他要求把青年培养成“使全世界都望而生畏的青年”，从而把学校变为法西斯战争的军事训练所。

为了把德国的每一个金币都尽量投到大炮的生产中去，1933 年 7 月 15 日，希特勒政府任命 12 个大垄断资本家和 5 个纳粹分子组成“德国经济总委员会”，作为当时德国的最高经济权力机关，负责统筹和指导国家经济政策，以便将国民经济纳入战争轨道，对经济实行全面的军事化的干预和调节，把全部经济力量转向为战争服务。

尽管纳粹党已猖狂至极，不可一世，但希特勒仍感到底气不足，手中尚缺一张重要的牌，那就是德国国防军的支持。尽管在纳粹夺权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准军事组织冲锋队这时人数已达 200 万，此外还有党卫军和秘密警察为他撑腰壮胆，但希特勒深知，这些人多为地痞流氓出身的乌合之众，不仅纪律散漫，难于控制，而且未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和久经战争的锻炼，一旦打起仗来，其战斗力是值得怀疑的。还有，作为德国国防军灵魂的，在普鲁士封建贵族背景上形成的军官团，在年已 87 岁的兴登堡总统死后，可能会联合其他保守势力拥戴霍亨索伦王朝复辟。希特勒鉴于这些顾虑，而德国国防军又是一支有着旧普鲁士军队的光荣传统和勇

敢善战精神的精锐劲旅，是必须争取过来的。因而希特勒便用保证不将国防军用于国内战争和决心打破凡尔赛和约束缚，放手扩军备战，重建德国海军的方针，换取了军官团的支持。

这时，冲锋队参谋长罗姆的野心日益膨胀，他企图以冲锋队代替国防军，把二者合二为一，由他统一指挥。这就引起了国防军旧军官团的严重不满。

其他纳粹首领，早就对冲锋队头目的飞扬跋扈十分不满，怀恨在心。希特勒权衡利弊，决定丢车保帅，牺牲掉他这位小兄弟。1934 年 6 月 30 日，以罗姆企图发动军事暴动为名，希特勒亲自率领党卫军逮捕了罗姆，未经法庭审讯立即处死。同时约有 1000 名冲锋队大小头目被杀。这就是所谓的“血洗冲锋队”事件。通过这次屠杀，希特勒赢得了国防军的支持，牢牢地掌握了对军队的控制权。

1934 年 8 月 2 日，87 岁高龄的兴登堡总统病逝，希特勒顺利地接管了总统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权力。接着，希特勒干脆取消了总统职位，自封为国家元首兼任政府总理，把所有大权集于一身，成为握有德国无限权力的大独裁者，

完成了夺取和巩固政权的全过程。

在很久以前，希特勒为了蛊惑人心，为他的法西斯专政和对外侵略扩张鸣锣开道，就编造了一整套极端荒谬反动的理论。这套法西斯理论，融沙文主义、复仇主义、种族主义思想于一炉，较完整地见诸于他所著的《我的奋斗》一书。这套理论有两个主要支柱：一是“种族优越论”；二是“生存空间论”。

“种族优越论”是希特勒这套理论的核心。他以种族的先天品质为基础，把人类分为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认为优等民族理应繁衍发展，劣等民族则应被淘汰消灭。他宣称，古雅利安人是优秀的人种，而当代的日耳曼民族则是最纯粹的雅利安人的后裔，理所当然应繁荣壮大，统治和主宰整个世界。斯拉夫人、高卢人则是次等民族，必须减少，并听从雅利安人的役使。犹太人是最劣等的民族和一切灾难的根源，必须予以彻底消灭。

“生存空间论”是希特勒鼓吹向外扩张的理论根据。他宣称，既然德意志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而德国人却大量失业、贫穷弱小，人口过剩，这显然不是德国自身的过错，而是因为缺乏“生

存空间”。在国内，是“犹太人侵占了日耳曼人的土地和面包”；在国外，“斯拉夫人占有大片大地，高卢人对日耳曼人进行压制和威胁”。如不解决“生存空间”问题，“这个伟大民族只好沦于死亡”。希特勒愤愤不平地说，“一想到这些，我就怒火万丈，忧心如焚，我们这些日耳曼武士的后代，还有什么理由不使德国在太阳底下比以前占有更伟大的地位呢？”

在现代化的战争中，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成打的支票代替不了一只滑膛枪，成堆的金币也不如一门大炮管用。一战后，德国既被解除了武装，还遭到经济掠夺。这时的德国，虽然钞票多了起来，但枪炮仍然少得可怜。怎样才能将经济优势转化成武装优势呢？在“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口号下，希特勒将国民经济完全绑在了战车上，大搞国民经济军事化。从希特勒上台的1933年到德军进攻波兰的1939年秋，德国军费总支出达700亿马克，占同期国家预算总支出的3/5，国民收入的1/4。由于把原料、劳动力、资金、设备等优先供给军需部门，重工业，特别是军火工业迅速增长。1933～1939年，军需工业扩大了11.5倍。全国有24万家工厂为军工

服务。1939年，德国的军火产量比美、英的总和还多2倍，为发动世界大战准备了物质条件。纳粹党通过国民经济军事化刺激了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使德国暂时摆脱了经济危机。德国工业发展的速度超过了英、法、美诸国。

在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同时，希特勒加紧了扩军备战。

1933年4月4日，希特勒刚上台两个月，就成立了"国防会议"，它的任务是秘密集中一切人力、物力，准备战争。10月14日，希特勒以裁军会议不满足德国"军备平等"的要求而大国又不裁军为借口，宣布德国退出日内瓦国际裁军会议。10月19日，又退出国际联盟。此后，德国开始着手秘密建造《凡尔赛和约》所禁止的潜水艇、大型军舰和军用飞机。1934年底，德国正规军人数已达29万，大大超过了《凡尔赛和约》的限额。

1935年3月16日，法西斯德国公布《重整军备宣言》。宣言公开宣称："凡尔赛和约待遇不公，难使人类亲密，世界和好，只能维持不共戴天之仇。为了保障德国的尊严与安全，从1935年3月16日起，实施国防军法，实行普遍义务

兵役制。”宣言规定和平时期建立12个军36个师，约50万人，服役期限1年。而在1932年仅10个师。这对一公然撕毁凡尔赛条约的行为，西方国家仅仅提出警告，没有采取有效的制裁行动。

5月21日，德国秘密颁布《国防法》，规定一年内将武装力量扩充到70万人，配备2000架飞机，3500门大炮，3000辆坦克。

6月18日，英、德在伦敦签署了《英德海军协定》，德国迫使英国做了很大的让步。规定英、德海军比例为5：1.75，德国可拥有与法国同等的海军。协定还规定德国可以建造相当于英国潜艇总吨位45%的潜水艇。据此，德国可以把现有海军吨位增加3倍多。这样，英国就在实际上为希特勒扩充海军大开了方便之门，使德国违反《凡尔赛和约》的行为合法化了。

为了加快扩军备战的步伐，戈林提出“宁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口号。他在1936年即宣称：“我们从1933年以来就已竭尽全力扩充军备。不错，我们承认，如果我们把裤腰带勒紧，那是因为我们只为我们的军备进口原料，这是比吃饭更重要的事。”

就在德国和日本两个法西斯魔头气势汹汹的要称霸世界时，在南欧的亚平宁半岛上，早就有一个小鬼伸腿踢脚地干开了，这就是意大利。这个见风使舵的家伙，在一战中脚踏几只船，迟疑观望，既无战功，又缺实力，因而虽然作为战胜国在凡尔赛条约上签了字，但谁也不把它放在眼里，即使是分给它的那一点可怜的残汤剩水也还是为了照顾它的情绪。这对野心勃勃的意大利来说，无疑是兜头一脸冷水。因此，意大利几乎在刚签了字即马上反悔，作为战胜国中的第一个要求修约。为了达到目的，在1922年10月，它即把狂热好战的法西斯分子墨索里尼推上国家权力的宝座。这个身穿黑衫的法西斯魔头，刚一上台，即发出战争叫嚷，公开声称：他的外交活动目标是建立一个"伟大的意大利"，以"恢复罗马帝国的光荣"。他咬牙切齿地发誓："要么扩张，要么完蛋。要么流芳千古，要么遗臭万年！"

墨索里尼到处兜售他的扩张计划：意大利应该成为地中海的天然霸主，要让亚平宁这只靴子的靴尖给一切意大利的敌手以致命的一踢，巴尔干地区是意大利领土的自然延伸部分，

当然要纳入意大利的版图。委任统治权必须重新分配，为了公正起见，意大利和法国的北非殖民地的边界没有任何理由不做重新改划。简要言之，地中海是意大利的生命之源，它应该成为意大利的内湖。墨索里尼强调指出，意大利要么成为地中海的统治者，要么成为地中海的俘虏。

但是，意大利毕竟已在凡尔赛条约上签了字，这就给它自己套上了绞索。还有，英、法都是凡尔赛条约的受益者，意大利要争夺地中海和北非的霸权必然要冲破凡尔赛条约的束缚，英、法两个欧洲霸主岂会坐视不动和拱手相让？也许，在旁人看来这是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嘴里拔牙的冒险赌博，简直是想都不应想的事。可是墨索里尼却一脸轻松，毫不在意，他轻描淡写地宣称：条约并不是永远不变的。条约的永恒性意味着，到了某一特定的时刻，人类将由于某种骇人听闻的奇迹而木乃伊化，换一句话说，也就是人类的死亡。条约不是神圣正义的产物，而是虚幻的势力的产物。最后，他面色一寒，话中有话地威胁说，在1935年到1940年间，欧洲将进入一个难分难解的历史时期。要避免这种难分难解的局面，就必须修改条约。

结果，德、意两个法西斯国家果真在30年代在欧洲到处肇事，向凡尔赛体系形成以来的欧洲新秩序展开了全线进攻，从而使欧洲新秩序面目全非，凡尔赛体系全面崩溃，荡然无存：1935年10月，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1936年3月，德军武装占领莱茵非军事区；7月，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10月，德、意法西斯签订秘密协定，形成了柏林—罗马轴心；1938年3月，德国入侵奥地利并将之吞并；9月，德国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1939年3月，德国侵占整个捷克；4月，意大利吞并了阿尔巴尼亚；5月，德、意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

与此同时，德、意法西斯又将他们的魔手伸过欧亚大陆而与它们东方的小兄弟日本勾上了。1936年11月，德、日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1937年11月，意大利宣布加入。这样，正式形成了德、意、日法西斯集团争霸世界的柏林—罗马—东京轴心，一个新的战争集团和动乱源—轴心国集团正式诞生了。从此以后，三个法西斯魔王一呼一应、一唱一和，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东边打一枪，西边放一炮，在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从东北亚到南部非洲、南洋群岛的全球

范围内兴风作浪。这样，从一战以后形成的世界范围内的短暂和平完全不存在了，血雨腥风的惨淡愁云开始逐渐笼罩了整个世界，新的世界大战已经呼之欲出了。

然而，在德、意、日法西斯的步步进逼、猖狂进攻面前，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大国却优柔寡断，不断让步，处处妥协。它们一方面与法西斯侵略者讨价还价，另一方面却以邻为壑，企图祸水东引，用牺牲社会主义苏联和其他中小国家利益的办法来满足侵略者的贪欲，使它们尽量不危及到自身的利益，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大拍卖"。然而，对于一心要征服全世界，统治全人类的法西斯侵略集团来说，英、法、美的这种行为无意于投狼以骨，除了更加激起侵略者的贪欲外，还能有别的什么好结果呢？它们这种损人利己、各自为战的自私卑劣伎俩，除了更加助长德、意、日的侵略野心和嚣张气焰外，对建立世界范围内的制止侵略、维护和平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来说，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妥协、退让、绥靖、拖延，这就是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大国在法西斯面前的主要招术和

应变之策！结果，当1939年9月二战的炮声正式震醒了它们那悠长的和平迷梦时，当纳粹的炸弹从天而降，最后敲醒他们那迷糊的头脑时，他们才猝然猛醒、仓惶应战。然而，尾大不掉、痈疽已成，在蓄谋已久、准备充分的法西斯侵略者面前，不要说它们这些凡夫俗子应变乏力、回天无术，即便是宇宙之主宙斯出马，又能怎样呢？